



美國司法體系概述

(2004 年 12 月發佈)

目錄

- [引言 美國司法體系](#)
- 第一章:[聯邦司法體系的歷史與組織](#)
- 第二章:[州司法體系的歷史與組織](#)
- 第三章:[司法管轄權與決策之界限](#)
- 第四章:[司法程序中的律師、訴訟當事人以及利益團體](#)
- 第五章:[刑事法院程序](#)
- 第六章:[民事法院程序](#)
- 第七章:[聯邦法官](#)
- 第八章:[司法政策的實施與影響](#)
- [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
- [名詞解釋](#)
- [參考書目](#)

ACKNOWLEDGEMENT

Chapters 1 through 8 are adapted with permission from the book Judicial Process in America, 5th edition, by Robert A. Carp and Ronald Stidham, published by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Copyright © 2001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ecutive Editor—

George Clack

Managing Editors—

Rosalie Targonski,

Mildred Sola Neely

Art Director—

Min-Chih Yao

Cover Illustration—

Sally Vitsky

Photo Research—

Maggie Johnson Sliker

引言:美國司法體系



圖為畫家朱尼厄斯·司特恩司(Junius Brutus Stearns)1856 年的作品，描繪喬治·華盛頓(右立者)在制憲會議上發言的情景。該會議之成員於 1787 年 9 月 17 日起草並簽署美國憲法。憲法是美國主要法源。



憲法已賦予國會通過立法的權力。圖為小布什總統在 2001 年發表預算演說時召開的聯席會議。行政權依序委交總統。(© Michael Geissinger/The Image Works)



由 50 個州議會(例如上圖中正在進行表決的紐約州議會)所通過的法律只適用於該州公民或居住於該州或於該州經商的外地人。 (© *David M. Jennings/The Image Works*)



聯邦與州法院審理兩種糾紛：民事與刑事。圖中，在一樁民事訴訟中代表地主的律師向南達科塔州最高法院陳述論證。 (*AP/WWP*)



民法涵蓋了結婚與離婚相關之成文法。這對新人正由法官公證結婚。右，德州的一名法官。過去幾十年來，美國司法部門經發展已納入更多女性和少數民族。 (© Kent Meireis/The Image Works)

在每個工作日，全美各地法院做出判決，影響成千上萬的民眾。有些判決僅對當事人乃至特定法律訴訟產生影響，有些則裁定了權利、利益，以及法律原則，影響範圍廣及所有美國人民。許多人欣然接受判決但其它人卻不表贊同(有時反對人數眾多)的情況當然也有，但所有美國人民都承認法院判決的合憲性和法庭作為最終法律闡釋者的角色，充分證明了美國人對國家法治的信任和司法體系的信心。

以下概述美國司法體系，並說明美國法院的組織與運作方式。法院是美國司法體系的核心但非全部。每天，全美各地的聯邦、州，以及地方法院解釋法律，並依法仲裁糾紛，有時甚至宣佈法律違憲，侵犯了憲法賦予全國人民的基本保障。於此同時，數百萬美國人正處理著日常事務，他們雖未求助於法庭，卻也仰賴司法體系。購買第一棟房子的年輕夫婦、簽訂合約的商人、預立遺囑將財產留給後代的父母 — 所有人都需要法治所提供且受美國司法體系所保障的可預測性與可執行的共同準則。

本引言希望使讀者熟悉美國法律的基本架構與詞語，其後各章將進一步說明細節，並解釋美國司法體系如何因應一個成長中國家的需求以及日益複雜的經濟與社會現實，逐步發展成形。

聯邦司法體系：概述

美國司法體系有多個層級，可能比大部分國家更多。聯邦法與州法的區分是原因之一。要瞭解這一點，不妨回顧歷史。當年美國並非以國家形式建國，而是由**13**個宣佈脫離英國而獨立的殖民地所組成的聯盟，因此，獨立宣言(1776)言及了「各殖民地的善良人民」，但也宣稱「這些聯合殖民地皆為(按其權利也應是)自由而獨立的州。」一國國民分屬各州所造成的緊張關係始終是美國司法史的基調。如下所述，美國憲法(1787年通過、1788年批准)啟動了漸進且不時引發激烈爭議的權力暨法律權威轉移，從各州轉向聯邦政府。話雖如此，各州至今仍保有實質權威。任何研究美國司法體系的學生都必須瞭解聯邦政府與各州之間的權限如何分配。

憲法在聯邦法與州法之間劃定了相當多分界線，也透過政府的立法、行政、司法部門劃分聯邦權力(從而在各部門之間創造了『三權分立』並奉行『制約與平衡』制度，不讓任一部門權力過大)，各部門對司法體系有其獨特的貢獻。在這套體系下，憲法規定了國會可能通過的各種法案。

這樣已經夠複雜的了，美國法律竟然不僅是國會所通過的法令而已，在部份地區，國會授權行政當局採用在法規要求之外增加細節的法律，而這整套系統的依據，就是源自於英國普通法的傳統法律原則。即使憲法與成文法取代了普通法，法庭仍繼續採用不成文的普通法原則來補強憲法未言及而國會也未立法管制的部分。

聯邦法法源

美國憲法

聯邦法的至高優越性

在 1781 至 1788 年間，名為邦聯條例的協議主宰了 13 州之間的關係。該條例建立了一個虛弱的國會，將大部份的權力保留給各州。各州雖奉命對其他法庭的裁決表示尊重(以示『充分互信』)，但除海事法庭外，邦聯條例並無聯邦司法之相關規定。

憲法的起草與批准反映了一項逐漸成形的共識：必須強化聯邦政府。司法體系正是當時著手的領域之一，其中最重要的，是憲法第 6 條的「至高性條款」：「本憲法，與依據本憲法所制定之美國法律，以及依據美國權力所締定或將締定之條約，均為全國最高法律。因此，即使憲法與各州法律相牴觸，各州法官仍應加以遵守。」

這段話確立了美國法律的第一項原則：凡聯邦憲法有規定者，州法不能與之牴觸。至於這項禁令如何適用於聯邦政府本身，以及各州司法體繫在新憲法未言明的領域中扮演何種角色等問題，仍有待釐清。憲法修正案提供了部分答案，歷史則提供了更多解答，然而時至今日，美國人仍持續努力在聯邦與州的範疇之間做精確的劃分。

每個部門在司法體系中發揮作用

制憲者想強化聯邦政府，卻懼其權力過大。限制新政權的方法之一，是將政府劃分為數個部門。正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主義者文集：第 51 篇》中所解釋的，「將政府劃分為個別而獨立的部門以避免篡奪。」麥迪遜所指的每個「部門」— 立法、行政、司法 — 對司法體系都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立法

憲法賦予國會通過立法的權力。經由國會考慮的提議稱為法案。如果國會兩院多數 — 若總統否決，則為三分之二 — 表決通過一項法案，該法案即為正式法律。聯邦法是成文法。《美國聯邦法典》是聯邦成文法的「法典編纂」。《法典》本身並非法律，僅代表經邏輯方式編纂之成文法。例如第 20 條包含教育相關的各種成文法，第 22 條則涵蓋外交。

國會的立法權有限，更準確地說，立法權是美國人民透過憲法委託國會的，而憲法已言明國會可與不可立法的範圍。憲法第 1 條第 9 項禁止國會通過特定類型的法規，例如國會不能通過「追溯法令」(溯及既往或『事後的』法令)或徵收出口稅，第 1 條第 8 項則列出國會有權立法的範圍。部分憲法條文(如『設立郵局』)相當明確，部份條文則不然，其中又以「規範美國與外國，以及州際貿易」為最。顯然，解釋模糊授權的權力極其重要。早在立國之初，司法部門便擔任這個角色，因而在美國司法體系中取得了額外且至關重要的角色。

司法

和其它部門一樣，美國司法部門只擁有憲法交付的各項權力。憲法規定聯邦司法權僅限於某幾種爭議，列於第 3 條第 2 項。其中最重要的兩種案件為涉及聯邦法疑議(「基於本憲法與美國各種法律，及締結之條約...而發生之所有通行法及衡平法案件」)以及「跨州」案件，意即分屬兩州之公民間的爭端。跨州管轄權允許當事人雙方免於在對方所屬之州法院提起訴訟。

第二項司法權出現於立國之初。如第二章所述，美國最高法院在馬伯瑞訴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案中(1803 年)解釋其權力範圍包括裁定成文法是否違憲以及(若該法違憲)並宣佈該法無效。法律可能違憲的因素包括侵犯憲法保障人民的權利或憲法第一條未授權國會通過那類法規。

因此，解釋描述國會立法範圍的憲法條文的權力非常重要。傳統上，國會以規範「各州之間通商...」或言州際貿易之必須為理由合理化了許多成文法。這個概念有相當的伸縮彈性，不易精確描述。的確，只要是成文法，幾乎都可以在其目的和規範州際貿易之間創造出看似可信的關聯。有時，司法部門狹義地解釋「貿易條款」。舉例來說，在 1935 年，紐約一家屠宰場遵行聯邦法規定之工人的工時與工資經最高法院宣佈無效，因為該廠所處理過的雞肉全數銷售給紐約肉販與零售商，因而不屬於州際貿易的一部份。然而不久之後，最高法院開始給予羅斯福總統實施的「新政」更多自由。今日，聯邦法庭持續廣義地解釋通商權力，儘管廣義的程度不足以合理化國會可能通過的任何法案。

行政

憲法第 2 條將「行政權」委交美國總統。在華盛頓總統(1789-1801)任內，整個行政部門是由總統、副總統、國務院、財政部、國防部，以及司法部所構成。隨著國家的發展，行政部門也跟著成長，現有 15 個內閣層級的部門，各部門下轄數個局、署，以及其它機構，還有一些部分是不屬於這 15 個內閣層級部門的。行政部門各單位都行使總統委派之行政權，因此最終都必須對總統負責。

就某些領域而言，行政與其它兩部門之間的關係很明確。假設有一個或以上的人搶了銀行，國會已通過成文法將銀行搶劫定罪(《美國聯邦法典》，第 18 條，第 2113 項*)，(*:嚴格來說，成文法只適用於聯邦註冊或保證之銀行或美國聯邦準備制度之成員。美國境內的每一家銀行可能都符合上述標準，但不符上述標準且不被視為對州際貿易有影響之銀行，則不在聯邦法律管轄之內。聯邦法通常詳述一項司法依據：就上述案例而言，為聯邦註冊規定。)而隸屬於司法部的聯邦調查局(FBI)會調查這起犯罪事件。若逮捕到一名或以上的嫌犯，則聯邦檢察官(也屬於司法部)會試圖在聯邦地方法院的審理中證明嫌犯有罪。

銀行搶案是一個簡單例子。但隨著美國的現代化與發展，這三個部門在司法體系中的關係也逐漸演進，以因應工業與後工業社會中日益複雜的議題，其中又以行政部門的角色變化最大。就上述的銀行搶案而言，國會不需專業知識即可制訂成文法將銀行搶劫定罪。假定議員有意禁止「危險」藥物出現在市面上或限制空氣中「不健康的」污染物，那麼國會可以(若選擇這麼做的話)為這些名詞下精確的定義。有時國會會這麼做，但國會越來越傾向將部分權力委派給隸屬於行政部門的行政機構。於是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負責監督全國食品與藥物的衛生，而環境保護局(EPA)則規範產業對土地、空氣，以及水的影響。

雖然行政機構只擁有國會依成文法委派的權力，但這些權力都具有相當的實質性，足以頒布明確定義較籠統之法律用詞的規定。法令可能禁止大氣中「危險」污染物的含量，EPA 的規定則定義了污染物和每種污染物含量的危險值。有時，成文法會賦予行政機構調查違法情事、做出判決，甚至施行處罰的權力！

法院將會宣佈授與行政機構太多權力的成文法無效。一項名為「行政程序法」(《美國聯邦法典》，第 5 條，第 511 項，以及其下規定)的重要成文法說明了行政機

構在頒布規定、裁決違法行為，以及施行處罰時應遵循的程序，同時也提出了當事人如何尋求司法協助複審行政機構的裁決。

其它法源

美國法律最明顯的法源是國會通過的成文法，並有行政法規作為補充。有時，這些法規清楚劃分了合法與不法行為間的界線 — 再以上述銀行搶案為例 — 然而政府頒布的法令不可能應付得了每一種情況。幸運的是，還有另一套法律原則和基準可以因應這些灰色地帶，參見下述。

普通法

遇到成文法或憲法條文控制範圍外的情況時，聯邦與州法院通常仰賴普通法。普通法彙編了幾世紀前始於英國的司法判決、慣例，以及一般原則，至今仍繼續發展。在許多州，普通法在合約糾紛仲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州議會向來不贊成通過涵蓋所有可能的合約糾紛之成文法。

司法判例

法院依法判決涉嫌違法的行為與糾紛。在判決時，法官通常必須解釋法律，並認為應該遵循其它同級或上級法院過去對法律的解釋，此即「遵循先例」或判例原則，以確保一致性與可預測性。訴訟當事人在面臨不利於己的判例或案例時，會試著區別他們的案件與先例的不同處。

有時法院會對法律做不同的解釋。例如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有「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有罪」這項條款。有些案件會發生當事人因為其證詞可能使他遭到刑事起訴 — 不是在美國而是另一國 — 而拒絕接受傳訊或作證的情況。自我歸罪條款適用上述情況嗎？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判定適用，但第四以及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則主張不適用。* 這明顯意味著，法律因地而有異！(*：聯邦第二巡迴上訴法院是受理上訴的法院，審理來自紐約州、康乃狄克州，以及佛蒙特州的聯邦地方法院上訴案件。第四巡迴上訴法院則涵蓋馬里蘭州、北卡羅萊納州、南卡羅萊納州、維吉尼亞州，以及西維吉尼亞州；第十一巡迴上訴法院則為

亞拉巴馬州、喬治亞州，以及佛羅里達州。欲進一步瞭解聯邦法院組織，請見第一章。)

審級較高的法院試著消除這些不一致的情況。例如，美國最高法院經常選擇能夠消除巡迴法庭歧見的案件來審理。最高法院的判例將控制或適用於所有下級聯邦法院。在美國訴貝爾希斯(**United States v. Balsys**)**524 U.S. 666(1998)**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對外國起訴的恐懼凌駕自我歸罪條款的範圍。*(*) (**)：此句中的數字源自於貝爾希斯判決的傳票。數字分別代表法庭於**1998**年頒布判決，該判決出現於《美國最高法院判決彙編》的第**524**卷，始於第**666**頁。)

這項判決成為全國性的法律，包括第二巡迴上訴法院。其後，任何遇此議題的聯邦法院都必須遵循最高法院在貝爾希斯案中的裁決。巡迴法院的判決同樣對巡迴範圍內的所有地方法院具有約束力。「遵循先例」也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州法院系統。如此一來，判例在數量與解釋性方面皆有增長。

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救濟方式

有鑒於法律體系日益龐大，區分向法院提出的各類法律與訴訟以及法律為每種案件提供的救濟方式可收釐清之效。

民事/刑事

法院審理兩種糾紛：民事與刑事。民事訴訟涉及兩名或以上的私方當事人，至少一方涉嫌違反成文法或普通法的某項條款。先提出訴訟者稱為原告，另一方則是被告。被告可對原告提出反訴，或對共同被告提出交互訴訟，只要與原告的原始控訴有關即可。法庭偏好審理所有陳述皆因一起糾紛引起的單一訴訟。商業訴訟(例如違約)或侵權行為案件(當一方聲稱因另一人的疏忽或蓄意惡行而受到傷害)皆為民事案件。

大部分的民事訴訟發生於私方當事人之間，聯邦或州政府則一定是刑事案件的一方當事人。政府以人民之名義，起訴被指控做出例如傷害大眾福祉等違反法律的

某些行為的被告。兩家公司可以就違反合約提出民事訴訟，但只有政府能控告某人謀殺。

民事案件和刑事案件的舉證標準與可能刑罰也不同。刑事被告只能因「罪證確鑿、無合理疑點」而被判有罪。在民事案件中，被告只需提出「證據優勢」即可。證據優勢基本上只是一種說服力不足的陳述，意指「極有可能」。被判有罪的罪犯可能入獄，但是打輸民事訴訟的一方當事人只需負法律或衡平救濟之責，如下文所述。

法律與衡平救濟

美國司法體系提供廣泛但範圍並非無限制的各種救濟方式。刑事成文法通常列出某一特定犯行的罰金範圍或法庭可能施予的入獄時間，其它部分的刑事法規在某些權限內可能容許對慣犯加重刑罰。嚴重的罪行(又稱為重罪)的刑罰比輕罪更嚴厲。

在民事訴訟中，大部分美國法院都有選擇法律或衡平救濟的權力。和過去相比，今日兩者的區別不大，但仍值得瞭解。在 13 世紀的英國，「法院」只有判決金錢上救濟的權力。假如被告違反的合約價值是 50 英鎊，法院可命令被告全數支付給原告。在許多案例中，這樣的賠償金已經足夠，但在其它案例，例如稀有藝術品或是一塊土地的出售，則不然。13、14 世紀間，「衡平法院」形成，創造了例如實際履行的衡平救濟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義務，取代了以往強迫他們為不履行之行為所造成的損害支付賠償金的做法。到了 19 世紀，大部分美國法院皆已消除了法律與衡平救濟之間的區別。時至今日，除了極少數例外，美國法院皆可視情況需要裁定法律或衡平救濟。

以下這個轟動一時的案例說明了民事與刑事法的差異及各自提供的救濟方式有何不同。加州指控前足球明星辛普森(O.J.Simpson)犯下謀殺罪。要是他被判有罪，就得坐牢。但是他沒被判罪，因為陪審團裁定檢方無法證明辛普森罪證確鑿、無合理疑點。後來，辛普森太太的家人以非法致死為由控告辛普森，這是一樁民事訴訟。此案中，陪審團以證據優勢為由判定辛普森必須為其妻之死負責，並下令辛普森支付賠償金— 法律救濟 — 給原告。

州法在聯邦體系中的角色

憲法明確禁止各州採行某些法律(與外國簽訂條約、鑄造錢幣)，憲法第 6 條的「至高性條款」也排除任何牴觸憲法或聯邦法的州法。即使如此，司法體系大體上仍由州所控制。憲法已明確規定國會制定法律的範圍。**1791** 年的憲法第十修正案言明：「凡憲法未授予美國也未禁止各州的權力皆保留給各州和人民。」

當時聯邦與州政府間仍存在相當程度的緊張關係 — 起因包括了奴隸制度以及最終各州是否有權脫離聯邦。**1861** 至 **1865** 年的南北戰爭一併解決了這兩項爭論，州在司法體系內的角色也被加上了新限制：根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1868** 年)的規定，「未經正當法律程序...任一州不得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在管轄範圍內不得拒絕給予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護。」此修正案大幅擴張了聯邦法院宣佈州法無效的能力。布朗訴教育局(**Brownv. Board of Education**)案(**1954** 年)禁止阿肯色州的州立學校體系實施種族隔離的依據就是這項「平等保護條款」。

自 20 世紀中葉起，上述各趨勢 — 行政國興起、對正當程序與平等保護的司法解釋變得更有說服力且廣泛適用、國會規範貿易的權力也出現類似擴張 — 聯合併強化了聯邦在司法體系中的角色。即使如此，司法體系大體上仍受州的管轄。各州不得拒絕給予聯邦憲法保障公民的任何權利，許多州甚至在解釋州憲法時授與更多權利與特權。實施州法的州持續裁定大多數的合約糾紛，多數刑事案件與民事侵權訴訟也由州來裁定。家庭法，包括結婚與離婚，幾乎是專屬於州的事務。大半時間對大多數美國人而言，司法體系代表的是警官與自己所屬的州法院或該州的各類政府機關和其它政治分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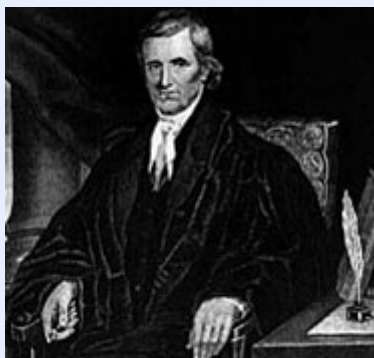
本引言僅概述司法體系，以下各章將提供更多細節、特色，以及說明。第一章與第二章分述聯邦與州法院體系的組織，第三章詳述司法管轄權的複雜性，描述聯邦與州法院之界線，也探究誰可以提出訴訟和法院受理的案件類型。第四章把重點從法院擴大到出庭的團體、研究美國法律的運作方式，並描述典型的訴訟當事人。此章也解釋了利益團體的角色，說明他們如何促成特定案子的進行以推動其社會與政治議程。第五章詳細說明法庭如何處理刑事案件，第六章的焦點則為民事訴訟。第七章說明聯邦法官的甄選過程，最後一章則探討特定司法判決 — 特

別是最高法院之判決 — 何以等同於一種決策形式，從而使司法制度和立法與行政部門緊密結合在一套複雜的關係之中。

—麥可佛萊德曼(*Michael Jay Friedman*)*

* 麥可佛萊德曼(*Michael Jay Friedman*)是美國國務院國際信息局的執行長。他擁有賓州大學美國歷史博士學位以及喬治城大學法學中心法律博士學位。

第一章 聯邦司法體系的歷史與組織



這幅由阿隆佐·查培爾(Alonzo Chappel)描繪的肖像為 1801 至 1835 年執掌美國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約翰·馬歇爾(John Marshall)。他憑藉著主導權實施重大改革，包括採取統一法官意見再加以宣佈的做法。(AP/WWP)



美國最高法院大樓，入口處上方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字樣。 (AP/WWP)



現任的九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由左到右坐者：安東尼．史格裡亞(Antonin Scalia)與約翰．史蒂文斯(John Paul Stevens)；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大法官珊卓．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與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由左到右立者：大法官魯絲．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戴維．蘇特(David Souter)、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以及史蒂芬．布萊爾(Stephen Brayer)。

. (Courtesy U.S. Supreme Court)



上訴法院複審來自聯邦地方法院的上訴案件。上圖，(左)美國第二巡迴上訴法院首席法官約翰．沃克二世(John M. Walker, Jr.)主持同一法院中的法官(右)巴靈頓．帕克二世(Barrington D. Parker, Jr.)的宣誓就職儀式。 (AP/WWP)



美國法院 — 在上訴法院和最高法院(在部分案件)審級皆然 — 經常處理例如高等教育的反歧視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等備受爭議的議題。 (AP/WWP)

美國司法制度中，最為重要、有趣，可能也是最令人困惑的特點之一，要屬雙軌制的法院系統，也就是政府各層級(州與國家)擁有各自的法院系統。因此，各州擁有兩種不同法院體制，一者屬於哥倫比亞特區，另一則屬於聯邦政府。有些法律問題完全在州法院解決，有些則在聯邦法庭解決，還有一些問題受到雙邊法庭的注意，有時因此而造成摩擦。本章針對聯邦法院進行討論，州法院的部分則於第二章探討。

歷史背景

美國在實施憲法之前是由邦聯條例所統治。根據邦聯條例，幾乎國家政府的所有功能都委交給名為國會的立法機構，當時行政與立法權不分。

邦聯條例的一大缺點是國家司法制度付之闕如。後來，會議代表於 1787 年參加費城制憲會議，對於制訂國家司法制度大表贊同。然而，對於司法部門應該採取的形式卻莫衷一是。

制憲會議與憲法第 3 條

制憲會議上的第一個提案是「維吉尼亞憲草」，主張建立最高法院和下級聯邦法院，反對者則提出「紐澤西憲草」作為響應，呼籲建立單一最高聯邦法院。「紐澤西憲草」的支持者特別不滿下級聯邦法院的構想。他們主張，所有案件皆應先由州法院審理，向最高法院上訴的權利已足以保護國家權利和提供全國一致的審判。

州權利擁護者與國家主義者間的衝突因制憲會議上諸多妥協方案之一而得到解決。妥協方案就寫在憲法第 3 條，這個條文一開頭是這麼寫的：「美國之司法權授權一最高法院以及國會日後可能制定與設立之下級法院」。

1789 年的司法條例

憲法批准後，討論聯邦司法制度的行動接踵而至。新國會於 1789 年召開時即以司法組織為第一要務，而參與參議院第 1 號法案的人員和相關主張都與制憲會議上對司法制度之辯論如出一轍，也就是再次面臨應否建立下級聯邦法院或應將所有案件先交由州法院審理的問題。解決這項爭議的努力使得國會分裂成兩個不同的團體。

有個團體主張州法院應先依據聯邦法做出裁決，若上訴再交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因為他們憂心新政府可能會消滅各州權利。另一群國會議員則懷疑州法院有地方偏見，唯恐來自他州與他國的訴訟當事人遭受不公正的對待。他們自然希望在司法體系中建立下級聯邦法院。由這項爭議所衍生的法案— 1789 年司法條例—建立了一套司法體系，包括由一位首席大法官與五名大法官所組成的一各最高法院、三個各由兩位最高法院大法官與一名地方法官所組成的巡迴法院，以及 13 個各由一名地方法官所主持的地方法院，而建立下級聯邦法院的權力也隨即被行使。國會創造了兩套而非一套下級法院體系。

美國最高法院(The U.S. Supreme Court)

最最高法院大法官查爾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於《美國的最高法院》(1966)中寫道，法院「在概念與功能上都充分表達了美國的特色，和先前的司法制度並無關聯。」欲瞭解制憲者對法院的構想，就必須思考另一項美式概念：聯

邦形式的政府。開國元老們為國家政府與州政府預做了準備；州法院應依照聯邦法行事，但聯邦法的最終解釋不可交由州法院為之，當然也不能委託可能做出不一致判決的多個州法院。因此，最高法院必須解釋聯邦法規。開國元老們的另一目的，是讓聯邦政府能直接對各州和個別公民採取行動。

有鑒於美國最高法院對美國政府體制的重要性，引發重大爭議或許是在所難免的。一位研究最高法院的重量級學者查爾斯·華倫(Charles Warren)在《美國歷史上的最高法院》(The Supreme Court in United States History)中寫道，「在法院的歷史上，沒有什麼情形比這更引人注目，那就是，雖然最高法院在聯邦形式政府中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向來為智者與愛國人士所承認，然而，沒有任何一個政府部門或依照憲法所設立的機構曾像最高法院這樣遭到持續的攻擊，或在歷經激烈反對後達到目前的地位。」

美國最高法院的第一個十年

美國第一任總統喬治·華盛頓指派第一批最高法院大法官時建立了兩項傳統。第一，他開創了提名與他政治理念一致的大法官的慣例。華盛頓是有史以來唯一有機會指派整個司法體系的總統。他指派了聯邦黨的忠誠黨員擔任所有法官職位。第二，華盛頓所任命的法官大致符合聯邦法院的地理代表性。他所指派的第一批最高法院大法官包括了三名北方人與三名南方人。

在華盛頓指派的職位中，首席大法官是最重要的。華盛頓認為，掌管第一個最高法院的人應該是位出眾的律師、政治家、行政官員暨領導者。提交給華盛頓的人選很多，而且至少有一人正式提出了此職位的申請。最後，華盛頓選擇了紐約的約翰·傑伊(John Jay)。年僅 44 歲的傑伊已有律師、法官，以及外交官的經歷，而且還是該州第一部憲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

最高法院於 1790 年 2 月 1 日在位於紐約市華爾街地區的皇家交易所進行第一次開庭，庭期只有十天，期間挑選了一名書記員、一個封印，並承認了未來可於最高院執業的數名律師。當然，當時沒有需要裁定的案件；最高法院在最初三年沒有裁決任何案子。儘管第一次開庭無足輕重而且簡短，但查爾斯華倫寫道，「紐

約與費城的報紙對最高法院第一次開庭過程的報導比其它新政府相關活動更為完整；他們的報導也被其它每一州的主要報紙加以報導。」

在最初的十年，最高法院總共只裁決了大約 **50** 件案子。鑒於最高法院案件量之稀少，首席大法官傑伊的貢獻或可從他在巡迴法院的判決和司法表現來追溯。

然而，或許傑伊最重要的貢獻是他堅持最高法院不能以顧問形式提供行政部門法律意見。財政部長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曾要求傑伊針對維吉尼亞眾議院通過的一項決議案之合憲性發表看法，華盛頓總統也曾詢問傑伊有關他中立宣言(**Neutrality Proclamation**)的問題。在這兩個例子中，傑伊堅決不給予任何意見，因為憲法第 **3** 條規定法院只能裁定與實質爭議有關的案件。

首席大法官馬歇爾之影響

約翰·馬歇爾於 **1801** 至 **1835** 年間擔任首席大法官職務，其支配程度之高，其它法官實難望其項背。馬歇爾在最高法院的支配地位使他得以透過意見的表達方式開啟重大變革。在他上任之前，大法官們遇到重大案件時通常會書寫各自的意見(拉丁文為 **seriatim** 意見，意思是「逐一」)。在馬歇爾任內，最高法院採取了宣佈單一意見的做法。馬歇爾的目的在於將分歧的程度降至最低。他認為爭論會破壞最高法院的威信，於是試圖勸服大法官們私下解決異議，在大眾面前表現出統一的態度。馬歇爾也運用其職權使最高法院參與決策過程。例如在他上任初期的馬伯瑞訴麥迪遜(**Marbury v. Madison**)案(**1803** 年)中，最高法院堅稱有權宣佈國會法案違憲。

此案始於 **1800** 年的總統改選，由托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擊敗對手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然而，在 **1801** 年 **3** 月任期結束前，亞當斯及其競選連任失敗的聯邦黨員設立了數個新的聯邦法官職務。亞當斯提名忠心的聯邦黨員填補這些新職位，並獲得了參議院的批准。此外，亞當斯還任命即將離職的國務卿約翰·馬歇爾為最高法院新任的首席大法官。

身為國務卿的馬歇爾理當將委任狀交付給新任法官，然而，隨著時間過去，**17** 份委任狀皆未能在傑佛遜上任之前交付完成。新任總統命令其國務卿詹姆斯·麥

迪遜(**James Madison**)不要交付剩餘的委任狀。威廉·馬伯瑞(**William Marbury**)是其中一名感到不滿的被提名者。他與他的三名同僚(皆已證實為哥倫比亞特區的治安法官)要求最高法院強迫麥迪遜交付委任狀，他們的依據是 1789 年司法條例第 13 項對最高法院有權頒發執行令(**writ of mandamus**) — 要求公務員執行非裁決性公務的法院命令 — 的規定。

本案讓馬歇爾陷入困境。有人建議他取消自身資格，因為他先前曾擔任國務卿。另外還有法院權力的問題。如果馬歇爾批准執行令，麥迪遜(在傑佛遜的命令下)大概一定會拒絕交付委任狀，那麼最高法院也沒有能力執行命令。然而，如果馬歇爾拒絕批准執行狀，就等於讓傑佛遜不戰而勝。

馬歇爾在這個看來無解的困境中所做的決定證明他才智過人。他宣佈 1789 年司法條例第 13 項因為給予最高法院的初審管轄權超過憲法第 3 條的規定，所以違憲，從而建立了法院複查與決定國會法案合憲性的權力。世人公認這項決定是最高法院宣佈的最重要的決定之一。幾年後，最高法院也主張擁有對州議會法案進行司法複查的權力；在馬歇爾的任期中，最高法院根據憲法廢除了十多項州法。

最高法院的議題重點持續改變

一直到大約 1865 年左右，最高法院都以國家與州政府間的法律關係或聯邦主義相關案件為主要審理對象。約翰·馬歇爾秉持著對強大國家政府的信念，毫不猶豫地限制對之造成妨礙的州政策。以吉本斯訴歐格登(**Gibbons v. Ogden**)案(1824 年)為例，最高法院否決了州對於汽船運輸的壟斷，理由是妨礙國家對於州際貿易的控制。馬歇爾透過法院擴張聯邦政府權力的另一個例子，是麥卡洛克訴馬里蘭州(**McCulloch v. Maryland**)案(1819 年)。首席大法官於該案主張憲法准許國會建立國家銀行。馬歇爾去世後，法院對於強大國家政府的堅持並沒有明顯減少。1836 至 1864 年間，羅傑·坦尼(**Roger Taney**)接任馬歇爾的首席大法官職位。雖然這時期的最高法院並非總是有利於聯邦政府，但是坦尼領導下的最高法院並未逆轉馬歇爾時期最高法院的走向。

1865 到 1937 年間，最高法院主要處理的是經濟管制議題。由於愈來愈多的國家與州法律都以監控商業行為為目的，最高法院關注的焦點也從聯邦主義轉向經濟

管制。隨著這類法令增加，質疑其合憲性的案件也隨之增加。在這段期間之初，法院對於管制的立場並不一致，到了 **1920** 年代，法官對政府管控政策則轉為不友善。聯邦法規通常由於未得到憲法授予之國會權力的支持而遭到否決，而州法規被否決的主因則是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經濟權利。

自 **1937** 年起，最高法院開始關注公民自由的議題 — 特別是受到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和宗教自由。此外，處理刑事被告之程序權利的案子也日益增加。最後，法院了裁決大量有關於政府平等對待少數種族與弱勢族群的案件。

最高法院是決策者

最高法院的決策者角色源起於該院對法律的解釋。公共政策議題以必須獲得解決之法律糾紛的形式，請求最高法院審理。

或許在種族平等領域可以找到一個絕佳的例子。**1880** 年代末期，許多州頒布法令規定使用公共設施時，非裔美國人必須與白人隔離。例如，路易斯安那州於 **1890** 年頒布法令，規定非裔美國人和白人以平等但隔離的方式使用鐵路設施。此法於兩年後遭到質疑。一名有八分之一黑人血統的男子荷馬·普萊西 (**Homer Plessy**) 在搭乘火車從紐奧良至路易斯安那州卡溫頓市的路程中拒絕離開火車上白人車廂中的座位，以表示對此法的抗議。因而被捕並被控違法的普萊西堅稱該法違憲。在普萊西訴弗格森 (**Plessy v. Ferguson**) 一案 (**1896** 年) 中，最高法院贊成路易斯安那州的這項成文法，從而確立了「隔離但平等」的政策，該政策持續了大約 **60** 年。在這段期間，許多州規定不同種族必須坐在巴士、火車、車站與戲院中的不同區域；使用不同的廁所；飲用不同的水源。有時餐廳與公共圖書館也拒絕讓非裔美國人進入。或許最重要的影響是，非裔美國學生必須就讀次等學校。

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政策在著名的布朗訴教育局 (**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案 (**1954** 年) 遭到質疑。非裔美國學童的父母親聲稱，准許隔離政策的州法剝奪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之下的平等保護法律所賦予的保障。最高法院裁定，隔離教育設施在本質上即為不平等，因此，隔離等於否定了平等保護。最高法院在布朗案的裁決終止了「隔離但平等」政策，並確立了廢除公立學校種族隔離的政策。

法院平均每年裁定並簽署評判的案件數介於 **80** 到 **90** 之間，簡化處理的其它案子則有數千件。因此，最高法院完整審理的都是經過詳細挑選、與政策議題相關的案件，而這些案件的類型則隨著時代而有所不同。在一個民主國家，廣泛的公共政策事務應留給人民選出的代表，而非由總統所指派、終身任期的法官。因此，原則上美國法官不應該制訂政策。然而實際上，法官多少無可避免地幫忙制訂定了政策。

然而，最高法院不同於立法與行政決策者。一項特別重要的事實是，法院沒有自我啟動的機制。大法官必須等著別人請求他們處理問題；沒有訴訟，就沒有司法決策。總統與國會成員就沒有這種限制。此外，即使是最獨斷的最高法院都多少受限於其它決策者— 例如下級法院法官、國會，以及總統 — 的行動。最高法院也必須依靠他人來實施或執行其判決。

最高法院是最終的仲裁者

最高法院擁有初審與上訴兩種管轄權。初審管轄權的意思是最高法院有初次審理案件權力；上訴管轄權則代表上級法院有權複審原由下級法院裁定的案件。最高法院主要的功能是上訴法院，因為該院絕大部分的時間都用來複審下級法院的判決。它是全國最高上訴法院，因此擁有解釋憲法、立法組織的法案，以及條約的最終權力— 除非憲法修正案或(在部份情況下)國會法案變更了最高法院的判決。

自 **1925** 年起，一項名為「移審令」(**certiorari**)的策略讓最高法院可以自行斟酌重審哪些案件。根據此種方式，人們可以請求最高法院複審下級法院的判決，再由大法官決定是否批准這項請求。如果批准，則最高法院會頒布移審令，命令下級法院送交完整的案卷紀錄。當移審令遭否決時，下級法院的判決仍屬有效。

最高法院的運作

最高法院正式的開庭時間從 **10** 月的第一個週一開始，直到整個期間的事務結束為止，通常是隔年的六月底或七月。自 **1935** 年起，最高法院在華盛頓特區有自己的大樓。這棟五層樓大理石建築的外觀莊嚴，座落於美國國會大廈對面，入口處上方刻有「法律之下人人平等」(**Equal Justice Under Law**)字樣。最高法院在

一間可容納 300 人的大審判室正式審理案件。法庭前方為大法官席。開庭時，首席大法官領著八名大法官依照年資順序穿過法官席後方的紫色布幕入座。座位依照年資安排，首席大法官坐在中間，其右為資深大法官，其左為第二資深大法官，其餘按照此先右後左的方式依年資深淺就座。審判室附近有會議室供法官決定案件之用，另有法官與職員辦公室所在的內庭。

最高法院的開庭期約為每兩週一期，期間以公開方式集會並舉行內部會議，休庭時，法官針對案情進行秘密討論並書寫意見。最高法院於每次開庭期間完整審理的 80 到 90 樁案件都遵循相當一貫的模式。

口頭辯論。口頭辯論通常排在庭期的週一至週三。每天的開庭時間是早上 10 點到中午、下午 1 點到 3 點。此程序並非審判或案件的初審，因此沒有陪審團也不傳喚證人，而是由兩造律師向大法官陳述辯論。按照慣例，一方各有 30 分鐘，不過有時最高法院會視情況延長時間。最高法院一天通常審理四宗案件。提出口頭辯論的律師常被大法官的問題打斷。兩造律師和大法官皆認為口頭辯論非常重要，因為它是整個過程中唯一允許個人意見交流的階段。

開會討論。最高法院在為期兩周的庭期開始前的週五舉行會議；庭期間則於週三下午與週五整天開會。大法官於週三的會議討論週一辯論的案件，週五的會議則討論週二與週三的辯論案件和其它任何討論的事項，而其它討論事項中最重要，莫過於移審令申請書。

週五會議前，每名大法官都會拿到待議案件的清單。會議約從早上九點半或十點開始，直到下午五點半或六點結束。大法官進入會議室時會握手致意，接著圍繞著矩形長桌就坐。他們進行的是秘密會議，討論過程不做正式紀錄。會議由首席大法官主持，他先就每個案件發表看法，其它法官則按年資深淺依序發言。

裁決案件的法定最低人數是六人，達此人數通常不難。因為職位缺、告病，或考量可能發生利益衝突而不參與等因素，裁決案件的大法官人數有時會少於九人。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多數決，若票數相等則維持下級法院所做的判決。

書寫意見。在會議中達成暫時裁定後，下一步是將法院意見指派給一名大法官。如果首席大法官投的是多數票，則由他本人書寫意見或指派一名投多數票的大法官為之。當首席大法官投的是少數票時，則由多數票者中最資深之大法官進行指派。

會後，負責書寫意見的大法官開始起草意見書，其它法官可能會撰寫替代性的意見書。完整的意見書在投多數票與投少數票大法官之間傳閱。意見書作者希望說服原本投少數票的大法官改變心意，同時鞏固既有的多數票，協商過程於焉開始。意見書中的措辭可能會改動，好讓其它大法官滿意或取得他們的支持。發生極度意見分歧時，最高法院很難得出明確、一致的意見，甚至可能導致投票結果變盤，或出現另一名大法官的意見成為最高法院正式判決的情況。

一般而言，雖然大法官們很少全數通過一項裁決，但是多數大法官都能達成單一共識。不贊同最高法院意見的大法官被稱為異議。異議不需有附帶意見，但是近幾年的情況不同。只要有一位以上的大法官抱持異議，每位法官就可能會撰寫意見書，或是全體參與撰寫單一意見。

有時，大法官同意最高法院的判決，但得²結論的理由卻不一樣。這樣的法官可能會撰寫「協同意見書」。標示為「協同或異議」的意見書對最高法院的判決抱持部份贊同、部份反對的立場。最後，最高法院會發佈法庭共同決議(**percuriam opinion**)——一份未經署名的意見書，通常很簡短。這類意見通常於最高法院受理案件複查但不加以完整審理時使用。例如，最高法院可能裁決某案件不需口頭辯論，直接頒布一份法庭共同決議來說明對該案的處置。

美國上訴法院

雖然和最高法院相比，上訴法院獲得的媒體注意較少，但上訴法院對美國的司法體系很重要。由於最高法院每年完整審理的案件只有 **80 到 90** 件，上訴法院顯然是聯邦法院體系中大多數上訴的最後手段。

巡迴法院：**1789-1891**

1789 年司法條例創立了三個巡迴法院(上訴法院)，各由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一名地方法官組成。巡迴法院每年在區內各地有兩次庭期。巡迴法院的工作量主要由地區法官負責安排。兩名最高法院大法官隨後來到當地參與案件。這項作法旨在將巡迴法院的注意力集中在地方而非國家。

有些人從一開始就對巡迴法院體系感到不滿，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尤其反對強制性的四處巡迴。司法部長埃德蒙·倫道夫(Edmund Randolph)和華盛頓總統力主減輕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負擔。1793 年國會做了些許改變，更動了巡迴法院的組織，只剩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與一名地方法官。1801 年在約翰·亞當斯總統任期結束前，國會將最高法院大法官從巡迴審判中移除、批准了對 16 名新巡迴法官的任命，並且大幅擴展了下級法院的管轄權。

此舉遭到托馬斯·傑佛遜新政府的大力反對，國會於是將之撤銷。1802 年的巡迴法院法案恢復了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巡迴審判，並擴增了巡迴區的數目。不過，該法案允許單一地區法官主導巡迴法院。這改變看似微小，事實卻證明其重要性。漸漸地，地方法官開始承擔地區與巡迴法院雙邊的責任。因此，初審與上訴權實際上皆由地方法官所掌握。

直到 1869 年國會通過了任命九位新巡迴法官的授權措施並將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巡迴法院庭期改為每兩年一次，上訴法院才進入下一個重要的發展階段。儘管如此，因為向最高法院上訴之權力並無限制，最高法院仍湧進了大量案件。

上訴法院：1891 年迄今

1891 年 3 月 3 日，伊瓦茲法案(Evarts Act)簽署通過，設立了名為上訴巡迴法院的新法院。這些新的法庭旨在受理來自地方法院的大部分上訴。自 1789 年起存在的舊巡迴法院仍然保留。新的上訴巡迴法院是由一名巡迴法官、一名上訴巡迴法院法官、一名地方法官，以及一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所組成的。這些新法院的法定最低法官數是兩位。

伊瓦茲法案通過後，聯邦司法制共有兩種審判庭：地方法院和巡迴法院。同時也有兩種上訴庭：上訴巡迴法院和最高法院。法案也允許最高法院直接複審某些案

子，但大部分的裁決仍歸於上訴巡迴法院。簡言之，上訴巡迴法院的設立讓最高法院免於審理各類瑣碎的案子。雖然仍可上訴，但是最高法院現已較能控制其工作量。之前相當多的案件數因此也轉給了下兩個審級的聯邦法院。

上訴法院下一個階段的發展發生在 1911 年，當時國會通過立法廢除沒有上訴管轄權且經常與地方法院功能重迭的舊巡迴法院。

現今，中級上訴庭的正式名稱為上訴法院，但口頭上仍被稱為巡迴法院。現有 12 個地區上訴法院，配有 179 名經授權的上訴法院法官。在巡迴範圍內，上訴法院負責複審來自聯邦地方法院的上訴案件(以及一些行政機關的案子)。一個特殊的上訴法院於 1982 年誕生，當時國會建立了聯邦巡迴司法區(Federal Circuit)，一個司法而非地理上的巡迴法院。

上訴法院的複審功能

大上訴法院複審的案件大多來自聯邦地方法院。對下級法院判決不滿的訴訟者當事人可向聯邦地方法院所在地的巡迴上訴法院提出上訴。上訴法院也有權複審部分行政機構的決定。

上訴法院無權控制受理的案件是哪些，因此例行與極重要之事務都是他們處理的對象。光譜的一端是無關緊要或不可能成功的瑣碎上訴案件，光譜的另一端則是會挑起公共政策重大問題並引起強烈反對聲浪的案件。上訴法院對這類案件的判決很可能為整個社會樹立政策，而不只是為了特定訴訟當事人而已。公民自由、重新分配、宗教，以及教育案件這類糾紛，都可能影響所有公民。

上訴法院中的複審有兩個目的，一是錯誤修正，各巡迴法院的法官因應請求監督聯邦地方法院與聯邦機構的表現，並指導他們對全國性法規與州法的運用與解釋。上訴法院不必尋求新事證，只要檢驗下級法院的紀錄有無錯誤即可。在錯誤修正的同時，上訴法院平息了爭議和執行了國家法令。

第二項功能是挑出並發展值得最高法院複審的少數案件。巡迴法院法官比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早處理法律議題，可能也會針對他們認為值得複審的案件進行初步篩選。司法學者發現，上訴案件的第二次審理通常不同於第一次。

上訴法院作為決策者

最高法院的決策者角色來自於它解釋法律的事實，上訴法院的情況也是一樣的。由於上訴法院是絕大多數案件的最後解決方式，其作為決策者的角色更顯重要。

以下舉第五巡迴法院所做的裁決為例，說明巡迴法院法官的廣大影響力。有好幾年的時間，德州大學法學院(以及全美多所法學院)優先接受非裔與墨西哥裔美國人的入學申請，以提高少數民族學生的註冊人數。此項作法在聯邦地方法院遭到質疑，理由是造成對白人與其它少數民族申請人的差別待遇，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1996年3月18日，第五巡迴法院的法官小組在侯普伍德訴德州(Hopwood v. Texas)一案中裁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不允許學校採取此種差別待遇，下令法學院不可將種族列為入學申請之考慮因素。美國最高法院否決了該案移審令的請求，從而將這個案子留給第五巡迴法院所涵蓋的德州、路易斯安那州，以及密西西比州之法律去解決。就技術上來說，真正受到這項判決影響的只有第五巡迴法院轄內的學校，但是《國家律師期刊》(The National Law Journal)的社論另有看法。該社論指出，雖然有人「可能認為侯普伍德一案的影響範圍只限於南方的三個州...，事實上，全美法學院(與其它學院)的院長因為擔心發生類似訴訟，於是爭先恐後地提出了反歧視行動的替代方案。

上訴法院的運作

最高法院有權決定是否受理案件，但上訴法院沒有。儘管如此，巡迴法院的法官還是發展出一套方法盡可能有效利用時間。

篩選上訴法院的法官們在篩選階段決定是否完整複審上訴案件或以其它方式處理。受理的案件量可能因為類似的上訴被合併為單一案件而減少。上訴法院愈來愈需要法官助理與法院僱用的專職律師來決定哪些案件不需口頭辯論，這些法院

人員審閱申請書與摘要並向法官提交建議。因此，許多案件的處理皆未經過口頭辯論階段。

三人法官小組獲得完整處理的案件一般是由三人法官小組而非巡迴法院的全體法官來審理。這意謂著不同的三人法官小組可以同時，通常在巡迴區內的不同城市，開庭審理多個案件。

全院會審的訴訟程序有時，同一巡迴區不同的三人法官小組可能會對相似案件會做出相互矛盾的判決。為化解這類衝突並促進一致同意之達成，聯邦成文法規定了「**全院會審**」(**en banc**，古法文，意指法官席)程序，讓巡迴法院的所有法官齊聚一堂裁決案件。這項一般性規定唯獨不適用於大型的第九巡迴法院，因為該院的全院會審小組通常由 11 名法官所組成，召集所有法官過於麻煩。如案件涉及極重要議題時，也可以採用全院會審程序。審查階段，法官決定是否完整複審上訴或是以其它方式處理。訴訟記錄多少還是會由於部分上訴被合併為單一案件而減少。決定哪些案件不需口頭辯論時，上訴法院愈來愈需要法官助理與專職律師，這些法院職員研讀申請書與訴訟，並向法官提出建議。因此，許多案件處理時都沒有口頭辯論階段。

口頭辯論通過審查程序且訴訟各方尚未和解之案件將排入口頭辯論。雙方律師各有簡短的時間(只有十分鐘)討論書面陳述中的要點和回答法官問題。

判決口頭辯論後，法官可能會進行簡短協商，若意見一致則立即宣佈判決，否則法官將於進一步討論後再行宣判。會後，有些判決會以簡短命令或法庭共同決議意見的形式宣佈，少數判決會附帶篇幅較長且經過簽署的意見書，甚至還有協同意見和異議。雖然巡迴法院各自有不同作法，但是近幾年已較少公佈意見。

美國地方法院

美國地方法院代表聯邦司法體系的案件受理起點。即使有部分案件後來上呈至上訴法院甚或最高法院進行審理，多數的聯邦案件卻從未超越美國初審法院的審級。單就處理案件的數目而言，地方法院是聯邦司法體系中負擔最重的，然而其重要性卻不僅在於處理大量案件而已。

第一個地方法院

國會於 **1789** 年通過司法條例時決定設立全國性的聯邦初審法院體制。該條例第二項使當時美國的 **11** 個州各成一區，並將麻薩諸塞州與維吉尼亞州中的一部份劃分出來(後來變成了緬因州與肯塔基州)，從而建立了 **13** 個地方法院。這種組織化的結構樹立了尊崇各區州界的慣例，此慣例現今依然存在。

第一批地方法院法官

每個聯邦法院都由居住於當地的一位法官所執掌。此事一經公開，華盛頓總統隨即收到許多個人的來信，表示希望獲派擔任各區法官職務。許多人要求國會成員或副總統約翰·亞當斯將他們舉薦給華盛頓總統。私下的申請不一定能成功，也不是唯一獲得總統注意的途徑。例如，哈利·英尼斯(**Harry Innes**)並未申請肯塔基州的法官職務，卻在該州國會成員推薦下獲得職位。

當新的州加入美國時，地方法院也增加，再加上辭職的人數，給了華盛頓機會提供法官職位給 **33** 個人。他所任命的法官都是司法界的成員，除了其中七人，其它都有州或地方的法律經驗，包括法官、檢察官，或檢察總長的資歷。後來的總統也繼續指派有公共服務背景的律師擔任聯邦法官。

現今的地方法院組織

隨著國家發展，新的地方法院也隨之建立。最後，國會開始將部分的州分為不只一區。加州、紐約，以及德州最多，各有四區。除了對州界一貫的尊重之外，地區的組織似乎未依合理的計劃進行，各區的大小與人口差異甚大。多年來，哥倫比亞特區增加了一個法院，多個未正式成州的地區也設有地方法院。現在美國的 **50** 個州、哥倫比亞特區、關島、波多黎各、維京群島，以及北馬裡亞納群島都設有地方法院。

最初的地方法院一院指派一名法官。隨著人口與訴訟的增加，國會必須定期增加在大部分地區的法官名額。**1990** 年的聯邦法官法案設立了 **74** 個新的地方法院法官職位，使目前總數達到 **649**。現在各地區都有一名以上的法官；紐約南區(包

括曼哈頓與布朗克斯)目前有 **28** 名法官，人數居各區之冠。聯邦地方法院一般由一位法官執掌，因此一個地區在任何時候都可能有數個庭在開。

地方法院是初審法院

國會將地方法院設為聯邦司法體系的初審法院並給予幾乎所有案件的初審權。律師只能在聯邦法的地方法院詢問和交叉盤詰證人，事實的紀錄因而是在這個審級的法院建立的。對初審法院判決的後續上訴以修正錯誤而非重建事實為重點。

認定案件事實的任務通常交由陪審團負責。所謂的陪審團，是指來自同一社群、擔任公正的事實仲裁者，並將法律應用在事實上的一群公民。憲法第六修正案保障了陪審團審判刑事案件的權利，相同的權力在第七修正案則為民事案件。不過，這項權利是可以放棄的，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就成為案情疑點與法律事務的仲裁者。這樣的審判稱為法院自行裁定。

與聯邦地方法院有關的陪審團有兩種類型，大陪審團是被召集來認定是否有足夠罪嫌相信某人犯下被指控之聯邦罪行的一群男女。大陪審團員定期集會以聽取檢方提出的指控。小陪審團員以隨機方式選出，以聽取證據並決定被告在民事審判中是否需負責，以及在刑事審判中有罪抑或無罪。聯邦法規定刑事案件需要 **12** 名陪審員，但允許民事案件可以有較少的陪審員人數。聯邦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通常使用六人陪審團。

一般認為初審法院主要參與規範執行，而上訴法院有更多制定決策的機會。規範執行與司法實施密切相關，因為所有的國家皆會發展對於一個公正而井然有序的社會來說至關重要的標準。社會規範體現於成文法、行政法規、判例，以及社群傳統。例如，刑事成文法將可接受與不可接受之行為的概念納入法律。裁量涉嫌違反此法之案件的法官，等於正在落實規範的執行。由於法官在審理這類案件時通常無法脫離法律與程序規定的嚴格限制，因此很少有能制訂或發展新政策的機會。民事案件的情形也一樣，法官通常被局限於規範的執行，這是因為這類訴訟通常因私人糾紛而起，其結果只涉及訴訟當事人的利益。

然而，地方法院也扮演決策的角色。由於美國人的訴訟意識日益高漲，過去私下解決的事情現在很多都交由法院裁決。法院審理愈來愈多以往被認為屬於私人範疇的案件。這對聯邦地方法院而言，意謂著什麼？根據一項研究，「這些司法參與的新領域往往相當缺乏清楚、精確的上訴法庭與立法方針；因此，初審法院的法官有大好的機會可以寫下全新的一頁，也就是制定政策。」

憲立法院(Constitutional Court)與法立法院(Legislative Court)

1789 年的司法條例設立了今日既存的聯邦法院體系三層級。然而，國會依據憲法第 3 條和第 1 條，定期行使其權力設立其它聯邦法院。根據憲法第 3 條設置的法院稱為憲立法院；根據憲法第 1 條設置的法院則是法立法院。最高法院、上訴法院，以及聯邦地方法院都屬於憲立法院。法立法院則包含美國軍事上訴法院、美國稅務法院，以及美國退役軍人法院。

和憲立法院不同，法立法院除了司法職責之外，通常也擁有行政和准立法職責。另一不同之處，在於法立法院通常是為了執行特定的國會成文法此一明確目標而設立的，而憲立法院則是為了解決訴訟而設置的。

最後，憲立法院與法立法院脫離其它兩政府部門的獨立程度也有所差異。憲法第 3 條(憲立法院)規定法官一定期間內行為良好可繼續任職，相當於獲得終身任期。由於憲法第一條(法立法院)並沒有保障法官良好行為的任期，國會可以針對該職務設定一定的任期。總而言之，憲立法院獨立於其它兩政府部門的程度高於法立法院。

聯邦司法部的行政與幕僚後援

即使法官在司法體系中的角色最為鮮明，背後其實有著大批的後援團隊。法官不擅長、不適合，或根本無暇處理的業務，他們一手包辦，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這支後援團隊中的部份成員，例如法官助理，可能為特定的某位法官工作，部份成員——例如治安法官——則奉派至特定法院任職，其它的成員則可能受雇於整個司法體系服務的各個機構(例如美國法院行政管理局)。

美國治安法官

為協助聯邦地方法官處理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國會於 **1968** 年創設了一個治安法官制度，以因應各地方法院的特殊需求與情況。治安法官由地方法院法官任命，任期為八年，但可能基於「充分的理由」在期滿前遭到免職。各地方法院法官依據國會的方針訂定治安法官的職務與責任。法令准許治安法官在相關當事人同意下主持有陪審團或無陪審團的民事案件並判決案件，也准許他們在被告同意之下審問被控於該地區犯下輕罪(嚴重程度低於重罪的犯罪行為)的人。不過，是否將責任委派給治安法官是由地方法官定奪的，因此，治安法官在案件程序中的參與度可能低於成文法的規定。

法官助理

美國最早使用法官助理的法官一般認為是麻薩諸塞州的哈瑞斯·格雷(**Horace Gray**)。在 **1875** 年夏天，當時他擔任麻州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並自費僱用了優秀的哈佛法學院應屆畢業生。每年他都從哈佛僱用一名新法官助理。格雷於 **1882** 年奉派至美國最高法院時帶了一名法官助理赴任。

格雷大法官在最高法院的繼任者奧立佛·霍爾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也倣倣每年僱用一名哈佛法學院榮譽畢業生擔任助理的做法。前耶魯大學法律教授威廉·塔夫脫(**William Howard Taft**)擔任首席大法官時，每年都得到耶魯大學法學院院長推薦的一名助理。於 **1925** 年加入法院的前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哈倫·史東(**Harlan Fiske Stone**)也有每年僱用一名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生的慣例。

自此以後，聯邦法院使用法官助理漸成慣例。現在聯邦法官有兩千名以上的助理，擔任破產法官和治安法官助理者則超過六百人。除了個別法官僱用的助理之外，所有上訴法院與部分地方法院也僱用專職的法官助理，為整個法院工作。

法官助理的職責視其所共事之法官的偏好和法院類型而有差異。聯邦地方法官的助理通常主要擔任研究助理的工作，大多數的時間都在研究民事與刑事案件中的各請求領域。他們審查每件請求，注意其中的議題，以及相關當事人採取的立場，接著探究請求中提出的要點，並為法官準備備忘錄。他們參與訴訟過程的初期階

段，因此可能和律師與證人有相當多的接觸。這個層級的法官助理可以參與法官意見的初擬。

在上訴法院，法官助理透過對法律議題和上訴提出之事實的研究參與案件。上訴法院沒有最高法院接受或拒絕案件的選擇權，因此會使用某些篩選辦法來區別可快速解決的案件和需要更多時間和精力去處理的案件。法官助理即是這篩選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有些案件會排定口頭辯論，由法官助理協助法官作準備。在口頭辯論之前不一定能深入分析上一審級的法官紀錄。上訴法院的法官能做的，通常只是瀏覽助理預先從紀錄中整理出來的大部份重點。

上訴法院一旦做出判決，法官助理經常參與撰寫伴隨著判決而來的命令。助理一般會先依據法官的判決草擬初步意見或命令。法官可能也會要求助理編輯或確認法官意見所引用的判例(指涉法院意見書或辯論中的成文法、先例，或法律教科書)。

最高法院法官助理的工作大致上和其它上訴法院的助理類似。就大法官決定該審理哪些案件而言，從旁協助的法官助理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1972**年，依據大法官劉易斯·鮑威爾二世(Lewis F. Powell, Jr.)的建議，大多數國會成員開始參與「**certpool**」—由大法官召集助理、分派所有檔案，並請每位參與者傳閱個別助理的移審令備忘錄。這份備忘錄將案情、所提出的法律問題，以及建議的行動方案 — 也就是案件是否應經過完整審理、否決，或不受理 — 做一總結。

大法官們一旦投票決定審理，大法官助理就像上訴法院的法官助理一樣，會準備大法官在口頭辯論時可能用得上的法官備忘錄。最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助理也像上訴法院的助理一樣，會協助大法官草擬意見。

美國法院行政局

整個聯邦司法體系由美國法院行政局所管理。自 **1939** 年創立以來，從分配預算到與其它政府機構協商聯邦大樓的法院使用空間，以及維持法務人事紀錄與收集聯邦法院案件數據等事務，皆由該局處理。

行政局也替聯邦司法體系的中央行政決策組織「美國司法會議」服務。除了提供統計資料給該會議的各委員會之外，行政局也充當交予司法會議之數據和提議的接收處和數據交換處。行政局還擔任聯邦司法體系與司法會議的溝通者，也是司法部與國會、行政部門、專業團體，以及一般大眾往來的窗口。尤其重要的是，行政局(以及相關的法官)在國會扮演著代表性角色，負責提出司法預算案、請求額外的法官職務、建議改變法院規定，以及其它關鍵措施。

聯邦司法中心

聯邦司法中心於 **1967** 年成立，是負責進修教育與研究的聯邦法院機構。其職責大致分為三類：指導針對聯邦法院的研究、提出建議以提升聯邦法院的行政與管理，以及為司法部門的人員開發教育與訓練計劃。

自成立以來，聯邦司法中心所提供的訓練課程与其它教育計劃中便持續造福法官。近幾年，治安法官、破產法官，以及行政人員都上過教育課程。聯邦司法中心廣泛使用錄像節目或衛星科技，使大眾都能與之接觸。

聯邦法院工作量

聯邦司法共有三個審級的法院，包括美國地方法院、上訴法院，以及最高法院，工作量都非常重。

以 **2002** 年會計年度為例，聯邦地方法院處理的案件就超過 **34** 萬件。單就刑事訴訟而言，自 **1993** 年以來已增加了四成三。

以 **1995** 年為例，其中一個地區巡迴法院的上訴案件就有 **50,072** 件，而且數字逐年增加。到了 **2003** 年，已有 **60,847** 件。不過，上訴法院所終結的案件數也呈穩定增加，從 **1995** 年的 **49,805** 件到 **2002** 年的 **56,586** 件。

從歷史紀錄來看，最高法院的案件量很大；**2002** 年的開庭期紀錄上共有 **8,225** 個案件。不過，因為最高法院有權決定哪些案件值得該院全心關注，多年來在最高法院辯論的案件已呈現顯著下降。在 **2002** 年開庭期間，只有 **84** 宗案件開庭辯論，有 **79** 個案件以 **71** 個簽署意見方式解決。

第二章

州司法體系的歷史與組織



州法院處理的案件遠遠多過聯邦法院裁決的案件。此圖畫中描繪的是位於塔拉哈西的佛羅里達州最高法院大樓。 . *(Courtesy Florida Supreme Court Historical Society, Tallahassee)*



律師愛德華．克蘭西(Edward Clancy)在他所屬的州的終審法院(新罕布什爾州最高法院)辯論案件。 *(AP/WWP)*



華盛頓州最高法院和其它州的終審法院一樣遵循與美國最高法院相似的程序。

圖中，辯方律

師羅傑．亨可(Roger Hunko)在一樁謀殺案件審判的量刑階段作總結辯論。

(AP/WWP)



紐約州與馬里蘭州稱其最高法院為「上訴法院」。圖中由左到右分別為紐約州上訴法院法官喬治．史密斯(George Bundy Smith)、首席法官茱蒂絲．凱伊(Judith S. Kaye)，以及法官霍華．列文(Howard A. Levine)，他們正在聽取一樁死刑案的辯論。(AP/WWP)



州法院一年處理的案件有數百萬宗之多，有時案件是在像西維吉尼亞州馬丁堡的伯克利郡法院這樣的機構中審理的，有些人稱這樣的機構「富有歷史意義」或「迷人」，有些人則認為它「不完備」。(AP/WWP)

早在邦聯條例與 **1787** 年制訂憲法之前，作為主權實體的各殖民地即已制訂憲法。因此，州法院體制的發展可從殖民地時代追溯至今。

州法院的歷史發展

就法院組織而言，沒有兩個州是完全相同的。各州可自由採行屬意的任何組織結構、設置的法院數量、隨意決定法院名稱，並且建立該州認為合適的司法體系。

因此，州體制不一定近似於聯邦明確的三審級制。例如，聯邦體制的初審法院稱為地方法院，上訴法院則稱為巡迴法院，但卻有超過 **12** 州的巡迴法院是初審法院，在其它一些州，最高法院是指主要的初審法院。也許最為人不解的情形是在紐約 — 該地的初審法院被稱為最高法院 。

雖然州法院組織有諸多費解之處，其重要性卻無庸置疑。由於成文法在各州比在聯邦體系涵蓋的範圍更廣，從最基本的私人關係到最重要的州公共政策都涵蓋在內，因此州法院處理的案件類型極多，而每年向州法院提出的訴訟案件數遠高於聯邦法院所判決的案件數。

殖民時代

在殖民時代，政治權力集中在英王指派的總督手中，由總督履行行政、立法與司法功能，因此不需要嚴密的法院體系。

殖民地司法體系的最低層級由稱為治安法官的地方法官所構成，其人選則由殖民地總督指派。系統的再上一層級是郡法院，即殖民地的一般審判庭。對任何法院判決的上訴全部由最高層級 — 總督與其議事會 — 審理。大、小陪審團也在這時期出現，直到今日仍是州司法體系的重要特色。

18 世紀初，法律專業已開始改變。自英國律師學院結訓的律師愈來愈多，因此，殖民地法院程序慢慢被複雜的英國普通法所取代。

早期州法院

美國獨立革命(**1775-83**)之後，政府的各項權力不只由立法組織所接管，而且也大幅減少了。許多前殖民地居民基於對律師與普通法的不信任，因此不希望發展一個強大、獨立的司法體制。各州議會嚴密監督法院，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對於判決的不滿，還會撤換法官或廢除某些法院。

當法院宣佈立法行為違憲時，對法官的不信任也日益高漲。州議會與法官之間的衝突，通常是由利益不合所引起的，而且越演越烈。國會議員似乎偏向支持對債務人有利的政策，而法院通常反映了貸方的觀點。兩者之間的各項差異是很重要的，因為「由於立法機構與司法權之間的衝突...法院逐漸成為一個獨立的政治機構，」戴維·紐鮑爾(David W. Neubauer)在《美國法院與刑事司法制度》(America's Courts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如此寫道。

現代州法院

從南北戰爭(1861-65)到 20 世紀初，州法院為其它問題所擾。日益高昇的工業化程度和都市地區的快速成長催生了新型態的法律糾紛，法院案件也變得更費時、複雜。當初以處理鄉村、農業社會問題為方向所設計的州司法體系在努力調適的同時，也面臨了案件積壓的危機。

處理辦法之一是建立新的法院來應付增加的案件量。通常，法院是層層上迭的。另一個策略是增加對某地理區域有司法管轄權的新法院。還有一個辦法是設立特別法院來處理特定案件。例如小額賠償法院、少年法院，以及家事法院都明顯增加了。

為滿足特定需求，州與地方法院在泰半未經規劃的情況下擴張，導致了許多人口中所謂的分裂狀況(fragmentation)。然而，審判庭的多樣和重複性只是分裂的一個面向。許多法院的司法權限範圍狹小，而且各種法庭間的司法管轄權往往是重迭的。

20 世紀初，人們開始表達對州法院體系分裂的不滿。應運而生的改革計劃通常被稱為法院統一運動(court unification movement)。第一位表明支持法院統一的知名法律學者是哈佛法學院院長羅斯科·袍德(Roscoe Pound)。袍德等人呼籲將初審法院整並為一或兩套法院系統，由其中一個系統審理重要案件，另一個則處理次要案件。

法院整並也引起相當多反對聲浪。許多幾乎天天都進法院的訴訟律師因為已經習慣了既有的法院組織而反對改變。此外，法官與其它法院相關人士有時也反對改革。他們的反對通常是出於恐懼——怕被轉調到新法院、怕必須學習新程序，或怕必須裁決自己專業領域外的案件。於是，法院統一運動的成效不如許多人的預期，另一方面，倡議法院改革者則在某些州取得了勝利。

州法院組織

有些州已邁向統一法院系統之路，有些州則仍運作著司法權限重迭的複雜法院體系。州法院可分為四大類或審級：有限管轄權的初審法院、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中級上訴法院，以及終審法院。

有限管轄權的初審法院

司法權有限的初審法庭每年處理美國大部份的訴訟案件，所有法院中大約九成都屬這類法院。他們有各種名稱，以下列出較為常見者：治安法院法官、治安法院、市法院、郡法院、少年法院、家事法院，以及都會法院。

這些法院的權限只及於次要案件。例如，在刑事案件方面，州法院審理三種層級的違法行為：違法(最輕微)、輕罪(較嚴重)，以及重罪(最嚴重)。有限管轄權的初審法院處理違法與輕罪，可能只處以金額有限的罰鍰(通常不超過 1,000 美元)和入獄(通常不超過一年)。在民事案件中，這些法院通常限於某些金額以下(例如 500 元美金)的糾紛。此外，上述初審法院審理的案件類型也只限於交通違規、家事，或有少年涉入的案件等。

和一般審查權初審法院的另一項差異是，在許多情況中，管轄權受到限制的法院並非正式紀錄的法院。既然程序無紀錄，對這類法院判決的上訴通常都提交給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稱為重新審理(**denovo**，意即「新審判」)。有限管轄權的初審法院還有另一項特點——主持這類法院的法官通常不需經過任何正式的法律訓練。

這類法院往往缺乏資源，通常沒有固定的審判室，而是在雜貨店、餐廳，或是私人住所開會。由於法官助理人數不足，所以沒有詳細的會議紀錄，其結果則為非正式程序和以量為基礎的案件審理。完整審理的案件很少，而且處理的速度也很快。

最後，某些州利用有限管轄權的初審法院來預審重大刑案，包括進行傳訊、定保釋金、替貧窮的被告安排律師，以及進行預審等，再將案件轉給對於例如聽取抗辯、舉行審判，以及判決等事務擁有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

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

多數州都有審理較嚴重的刑事與民事案件的主要初審法院體系。此外，在許多州，特殊種類的案件 — 例如少年刑事犯罪、家事案件，以及遺囑認證 — 都交由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審理。

在大部分的州，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也有上訴功能，受理來自於有限管轄權初審法院的某些種類的上訴案件。這些上訴案件通常在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進行重新審理或審理。

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通常分為管轄區或巡迴區。各州的執行狀況不一，其通則是利用現行政治界線，例如一或數個郡，設置管轄區或巡迴區。在鄉村地區，法官可能依照固定時間表在一區的各個地點巡迴審判和開庭；在城市地區，法官則是全年都在規定的地點開庭。在較大的郡，法官們可能被分成不同的專門領域，有些法官只審理民事案件，有些則專門審理刑事案件。

這個審級的法院有各種名稱，最為普遍的是地方、巡迴，以及最高法院；法律規定，此審級的各州法官皆需擁有法律學位。這些法院是紀錄法院，所以設有書記方面的人手。

中級上訴法院

對於州司法領域來說，中級上訴法院算是較新的成員。**1911** 年，這類法院只有 **13** 個；到了 **1995** 年，已有 **39** 個州設置中級上訴法院。其基本目標是減輕州最高法院的工作量。

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法院被稱為上訴法院，不過偶爾也會使用其它名稱。大部分的州擁有一個管轄權遍及全州的上訴法院。各州中級上訴法院的規模不同，例如阿拉斯加的上訴法院只有三名法官，另一個極端的例子是德州，有 **80** 名上訴法院法官。在某些州，中級上訴法院採取全院法官會審(enbanc)，其它州則採取固定或輪流方式。

終審法院

每個州皆有一個終審法院。俄克拉何馬州與德州則有兩個最高法院，各自的管轄權分別限於民事上訴案件和刑事上訴案件。大部分的州將該州最高審級的法院稱為最高法院；其它名稱還有上訴法院(馬里蘭州與紐約州)、司法法院(緬因州與麻薩諸塞州)，以及最高上訴法院(西維吉尼亞州)。終審法院的法官(有些州稱為大法官)人數從三人到九人不等，通常於州首府(雖不必然如此)以全院聯席方式審案。

最高法院擁有州法相關事務的管轄權，也是這類事務當然的最後裁決者。在設有中級上訴法院的各州，最高法院的案件主要來自於該州的中級法院。在這種情況下，最高法院通常有權決定複審哪些案件，因此，很可能可以多花一些時間處理涉及該州重要政策的議題。在沒有中級上訴法院的各州，案件通常是以強制複審的方式交給州最高法院審理。

在多數情況下，州的終審法院類似於美國最高法院，因為兩者都有很大的裁量權，可自行斟酌要特別關注哪些案件。大部分的州最高法院遵循的程序和美國最高法院相似，也就是說，當一個案件獲得審理時，雙方當事人會提出訴訟書並於其後進行口頭辯論。接著，在作?判決後，法官會發佈意見書說明判決。

少年法院

美國人愈來愈重視涉及少年的案件的處置方式，各州響應這個問題的方式各異。有些州建立了遍及全州的法院網絡，專門處理少年相關事務。羅得島與南加州則設有家事法院，處理家庭事務和少年相關事務。

最普遍的方式是授權讓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有限管轄權法院或一般管轄權法院處理少年相關案件。以亞拉巴馬州為例，巡迴法院(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有權管轄少年事務，而在肯塔基州，只有有限管轄權的初審法院—地方法院 — 有權管轄少年事務。

最後，有些州會將少年管轄權分配給一個以上的法院。科羅拉多州在丹佛市設有少年法院，該州其它地區管轄少年事務的權力則交予地方法院(一般管轄權的初審法院)。

此外，關於管轄權何時屬於成人法院的議題，各州也有不同的看法。各州制訂了被告在成人法院受審的標準年齡。此外，許多州還規定若狀況特殊，更年輕的違法者要在成人法院接受審理。以伊利諾伊州為例，少年管轄權轉交給成人法院的標準年齡為 **17** 歲，然而，在一級謀殺罪、嚴重的刑事性侵害、武裝搶劫、持槍搶劫，以及在校園不法使用武器的情況，年齡限制則降至 **15** 歲。

州司法制度中的行政與幕僚支持

聯邦法院的每日運作需要許多人員與各組織的努力。州法院系統也是一樣。

地方法官

州地方法官，在某些州又稱為行政長官或仲裁人，通常處理民事與刑事案件過程中的初期工作。在這方面，他們和美國治安法官相似。在某些管轄區域裡，州地方法官舉行聯合審訊並主導刑事案件初步調查。他們在某些州也有權判決次要案件。

法官助理

州法院很可能有法官助理，如果有，也只限於中級上訴法院和終審法院而已。大部分的州初審法院都不用法官助理，有限管轄權的地方初審法院根本不曾出現這樣的人員編制。就像在全國性層級一樣，有些法官助理為個別法官服務，有些則是受雇為整個法院服務的專職律師。

法院行政管理局

各州都設有一個法院行政管理局或名稱類似的機構替州法院體系處理各類行政事務。行政管理局最常執行的業務包括預算編列、數據處理、設備管理、司法教育、公共信息、研究，以及人事管理。在少數幾個州，少年與成人的緩刑和替代性的爭議解決方案也是行政管理局的責任。

法官助理與法院行政人員

傳統上，法院助理負責處理法院每日例行事務，包括安排法院審判室、案件程序紀錄、準備法院訴訟的命令與判決、收取法院罰金與費用，以及支付司法款項等。在大多數的州，這些官員是經由選舉產生的，人們可能以其它頭銜稱呼他們。

在許多領域，傳統的法官助理皆已為法院行政人員所取代。現代的法院行政人員和傳統上管理特定法庭運作的法官助理不同，他們可能會協助審判長管理整棟法院大樓。

州法院的工作量

美國絕大多數的司法事務存在於州層級而非國家層級。聯邦法官一年判決幾十萬宗案件的事實令人折服；即使最重大的案件皆由聯邦審級處理，州法院一年處理數百萬宗案件的事實仍令人稱奇。州層級的治安和州地方法院處理的是相當次要的案件，部份最重大的民事案件則由一般的州初審法院陪審團進行判決。

州法院國家中心匯彙編了各州終審法院與中級上訴法院在 **1998** 年的承辦案件數。向州上訴法院提出的強制案件與自由裁量訴狀總計共有 **261,159**。在向州初審法院提出的案件數方面，就比較難取得可靠的數據。儘管如此，該中心仍然成功追蹤了州初審法院的數據。**1998** 年，在一般審判權法院和有限審判權法院提出的案件共計 **17,252,940** 宗。就像聯邦法院的情況一樣，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民事案件，不過受到最多報導的通常是刑事案件。

第三章

司法管轄權與決策之界限



自最高法院對貝克訴卡爾(Baker v.Carr)案(1962 年)的判決開始，最高法院在多宗案件中表明選區的人口數應該相等，而法院也應監督這項命令的執行。圖中，北卡羅萊納州最高法院大法官莎拉·帕克(Sarah Parker)在開庭處理選區重新分區(或言分配)時端詳著一份地圖。(AP/WWP)



美國紐約州羅切斯特最高法院之上訴法院的法官們聆聽聲請辯論。糾紛必須是真實且進行中的，法院才會同意受理。(© Syracuse Newspapers/Carl J.

Single/The Image Works)



巡迴法院對於聯邦審判庭的民事上訴擁有上訴管轄權，例如 2000 年的一個案件中，美國第 4 巡迴上訴法院被要求推翻一聯邦法官之裁決，該判決裁定採礦業停止在阿帕拉契山採礦。 (AP/WWP)



巡迴法院亦可審理部份聯邦行政機關的上訴。圖中兩隻年幼的墨西哥斑點貓頭鷹不知道有個叫做奧杜邦協會 (Audubon Society) 的環保團體提出了一項與其物種棲息地有關的訴訟。 (AP/WWP)



國會表示，聯邦地方法院有聯邦民事與刑事案件的管轄權。照片中，司法部首席檢察官戴維．波伊斯(David Boies)(左立者)和康乃迪克州檢察總長理察．布魯門薩爾(Richard Blumenthal)(右立者)正與媒體討論微軟窗口 98 一案。。 (AP/WWP)

在設置法院管轄區域時，國會和美國憲法 — 以及各州議會和州憲法 — 規定了每個法院可受理的案件類型。本章討論(特別是)國會如何透過重新定義法官可受理之案件類型的方式影響司法行為；也探討司法自制，並檢驗源自於法律傳統和憲法與成文法，以及主宰法官複審一個案件與否之決定的十項原則。

聯邦法院

聯邦法院系統分為三個審級：初審法院、上訴法院，以及美國最高法院。

聯邦地方法院(U.S. District Court)

國會已經訂定了聯邦地方法院的司法管轄權。這些法院有聯邦刑事與民事案件之初審管轄權；意即，無論當事人是誰或議題有多重大，依法這些案件必須由聯邦地方法院進行初審。

刑事案件

當地方上的聯邦檢察官有理由相信發生了違反美國刑法的行為，刑事案件於焉誕生。在取得聯邦大陪審團的起訴後，聯邦檢察官在個人所服務的地方法院對被告提出指控。國會定義的刑事活動涵蓋了範圍廣泛的各種行為，包括州際汽車偷竊、非法輸入毒品、刺殺總統、密謀剝奪個人公民權，甚至捕殺非當季候鳥。

向被告提出指控後若無認罪協商，地方法院便開始進行審理。在法院，被告享有權利法案所保障之一切特權與豁免權(例如迅速暨公開審判的權利)，或國會立法或最高法院裁決所保障的一切權利(例如 12 人小組陪審團必須提出全體一致的裁決)。被告可以放棄參加由同儕陪審團作出判決之審判的權利。被告被判無罪後便獲得釋放，此後不會再因為同一樁罪行受審(第五修正案禁止重複追訴)。若被告被判有罪，地方法官會在國會規定的範圍內裁量適當的刑罰。只要是在規定的範圍內，刑期長短就不可以再上訴。政府也許不能上訴陪審團的無罪裁決，但若被判有罪的被告認為法官或陪審團做了不當的法律判決，則可上訴。

民事案件

民事案件民事案件，也就是私人當事人之間或與美國政府(以不起訴的身份)之間的訴訟，佔了地方法院案件量的絕大部份。源於美國地方法院的民事案件可分為幾類。第一類與憲法的解釋與應用、國會法案，或美國條約之訴訟有關。這類案例包括：請願人聲稱聯邦法保障的其中一項民權遭到侵害、訴訟人宣稱受到違憲之國會成文法所傷害，以及原告主張因為條約之不當影響而蒙受損害。重點是必須提出聯邦問題，聯邦初審法院才擁有管轄權。

傳統上，有些類型的案件必須涉及特定最低金額的爭議初審法院才會受理，但在幾種普通類型的案件中則另當別論。例如，涉嫌違反民權法的案件，例如 1965 年的選舉權法案，必須由聯邦而非州法院審理。這類型的其它案件還包括專利與著作權的請求、護照與歸化程序、海事法與海事糾紛，以及違反美國郵政法等。

聯邦初審法院行使一般初審管轄權的另一個範圍廣大的案件類型，包括所謂的不同公民資格(**diversity of citizenship**)的糾紛，也就是發生在不同州的當事人之間或美國公民與外國或其公民之間的糾紛。

若是被定罪的罪犯堅稱被監禁(或被拒絕假釋)是違反聯邦保障的權利，聯邦地方法院也擁有這類請求的管轄權。絕大多數這類案件中的犯人都會要求「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一項由法官所頒布、判定監禁或拘留是否合法的命令。法官會要求獄方證明拘留的正當理由，否則就要釋放請願者。在州法院被定罪之犯人必須主張受聯邦保護的權利(例如，在受審時由律師代表)遭到侵害，否則聯邦法院是沒有管轄權的。聯邦的犯人上訴範圍較為廣，因為他們的所有權利與選擇都在美國憲法範圍內。

最後，聯邦地方法院有權審理任何國會可能依法指定的案件。

美國上訴法院(U.S. Courts of Appeals)

美國上訴法院沒有任何初審管轄權；交由這些中級陪審團的每項案件或糾紛事先都在其它法庭辯論過了。美國上訴法院就和聯邦地方法院一樣，是由國會所創造的，其結構與功能從過去至今已發生了相當大的改變。

基本上，國會允許巡迴法院有兩種一般種類案件的管轄權。一是來自於聯邦初審法院的一般民事與刑事上訴。在刑事案件中，上訴人是被告，因為政府不能隨意上訴一項無罪的裁決。在民事案件中，於初審法院輸的一方當事人通常是被告，但是贏的一方若對下級法院的判決不滿也可上訴。第二個廣泛的上訴管轄權類型包括了來自特定聯邦行政機關與部門的上訴和來自獨立之管制委員會的上訴，例如證券暨交易委員會、國家勞工關係局等。

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是憲法中唯一提到名稱的聯邦法院，憲法並說明了最高法院管轄權的大致架構。最高法院常被認為是上訴法院，不過它的確擁有部份初審管轄權，而其中最重要的，當屬兩州或數州之間的訴訟。

最高法院在以下這些案件中(與聯邦地方法院)共有初審管轄權：外國大使或領事被控或由他們提告的某些案件、美國與一州之間的案件，以及一州控告其它州公民或其它國家公民的案件。在這些管轄權共享的案件中，最高法院被視為擁有共

同權限。最高法院可初審的案件通常非常重要，但數量上並未占有所有案件的大部分。近幾年，最高法院初審的案件佔不到受理紀錄的百分之一。

美國憲法聲明最高法院「依國會之規定...擁有上訴管轄權」。多年來國會已通過多項立法，制定了決定哪些案件能夠出現在國家最威嚴之司法機構的「規定」。向最高法院上訴的途徑主要有二。第一，上訴可能來自於所有下級聯邦憲法與領土法院以及大多數的聯邦法立法院。第二，只要涉及實質的聯邦問題，最高法院可以審理來自各州最高審級法院之上訴。

最高法院受理的大部份案件皆為該院同意頒布移審令之案件——此為裁量行為。這類令狀(至少必須得到四名法官的支持)是最高法院要求下級法院呈交完整案件紀錄給最高法院複審之命令。從歷史上來看，最高法院批准移審令請求之案件可說少之又少——通常低於一成，近幾年的數量更近乎 1%。

最高法院行使上訴管轄權的另一個方法是認證(certification)。此程序在一上訴法院向最高法院要求針對某一法律問題給予指示時發生。大法官可能選擇給上訴法院的法官具約束力的指示，也可能會要求把全部的紀錄轉交給最高法院進行複審與最後裁決。

州法院的管轄權與決策

美國 50 個州的法院系統各自獨立，但其架構與國家法院系統幾乎相同。每一州都有一套憲法，規定該州初審與上訴法官的職權與決策權。同樣的，每個州議會也會通過法令，進一步說明法官的具體權力與優先權以及在州法院興訟者之權利與責任。由於各州法令與立法組織不同，因此各州法院的管轄權也各異。

州法院對於美國的政策制定而言相當重要。有九成九以上的司法案件都是州的案件而非聯邦案件，而全美九成五的法官都擔任州層級的職務。再者，州法官的決策通常對公共政策有重大影響。例如，1970 年代，聯邦法院有多起訴訟質疑州花費在學童的教育款項嚴重不均是否合法。(發生這類情事的原因，是較貧窮的校區無法籌措到與富有校區同等的金額。)訴訟當事人主張貧窮區域孩童是非法歧視的受害者，其為憲法所保障之平等保護權利遭到侵害。然而，最高法院在聖

安東尼奧獨立學區訴羅德里格斯案(**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案(1973 年)中以五票比四票反對這項主張。但至此事情還沒結束。許多州接到訴訟案，主張不平等的教育機會違反了各州憲法的多項條款。自羅德里格斯案後，這類訴訟在 **24** 個州被提了 **28** 次。在其中的 **14** 個案件中，州最高法院宣佈該州籌措教育資金的方法無效，因此要求將數十億美金重新分配。

管轄權與立法政治

有些法官與司法學者主張美國憲法與各州文件賦予部分重要領域的司法權限某種固有的管轄權，使之不受立法意志的支配。然而，美國法院的管轄權界限也是立法判決的產物——判決通常受到政治的影響。

國會可能會為了達成某項目標而給予法院以往是司法權限禁地的審理權力，讓法院受理公共政策領域的案件。例如，國會通過 **1968** 年的民權法案讓法官有權懲罰「因其種族、膚色、宗教，或國籍，以及因其曾...於州際通商...遊歷」而加以妨礙之人。在 **1968** 年之前，法院對於干擾他人旅遊權之事件沒有管轄權。同樣的，國會可能會為了阻止某項社會運動而通過立法，使其擁護者在法院沒有任何成功的機會。

州法院的管轄權，就像聯邦法院一樣，也受到州議會——及其政治產物——意志的支配。

司法自制

法官被禁止或不受到鼓勵涉入的活動，與其說和管轄權有關，不如說是與可裁判性(**justiciability**)有關——也就是司法制度內的法官應否審理或避免審理某些類型的糾紛的問題。以下探討的十大司法自制原則旨在控制或抑制美國法官的權力。這些準則的來源廣泛——包括美國憲法與州憲法、國會與州議會的法案，以及普

通法。有些較適用於上訴法院、較不適用於初審法院；大部分都適用於聯邦與各州的司法體系。

必須有明確的爭議

美國憲法聲明「司法權應擴及根據本憲法、美國各項法律，以及根據美國各種權力所締結之條約...所產生之法律和衡平法中的所有案件」(第 3 條第 2 項)。這項條文的關鍵詞是案件。自 1789 年起，聯邦法院即選擇照字面詮釋「案件」一詞的意義：已達訴訟之嚴格法定標準的合法對手之間必須存有真正的爭議。該爭議必須涉及有意義且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權利之保障，或直接影響到訴訟當事人之不法行為的預防或賠償。這項大原則有三項必然結果。

第一，在假設性或未對雙方當事人造成真正衝突的情況下，聯邦法院不提供諮詢意見與裁決。糾紛必須是真實且當前發生的，法院才會同意受理。

第二，訴訟當事人必須有適當資格。這個概念與向法院提出訴訟者之資格有關。提出訴訟者必須曾經遭受(或即將遭受)直接且重大的傷害。一般來說，訴訟者無權代表他人(幼童之父母或是稱為集體訴訟的特殊案件除外)。此外，可能的傷害必須個人化且具立即性，而非一般化的抗議。

第三，當基本案情或當事人的狀況在提出訴訟之初與法官受理這兩個時間點之間有所改變，法院通常不審理已過時(**moot**)的案件。當一方訴訟當事人死亡或雙方停止對抗狀態時，大部分的法院都認定該案件已過時。然而，即使案情狀況與當事人可能看似已發生根本的改變，法官有時仍可能裁定有進行審理的必要。這類案例包括有人反對州拒絕准許墮胎，或准許關閉末期病患的維生系統。(這類案件中，當案件送達上訴法院時，婦女的小孩可能已出生，而垂死病患可能已經去世。)在這些案子中，法官認為這些議題非常重要，法院必須表態。在實務上，只要宣佈這類案件過時，就能不讓它們及時得到上訴機構的審理。

雖然聯邦法官不裁決抽象、假設性的議題，但許多州法院可以某種形式裁決這類議題，聯邦法立法院可能也會提供諮詢意見。而且，美國的法官有權提供確認之訴(**declaratory judgment**)，明確定義各當事人依據成文法、遺囑，或合約所擁有的權利。確認之訴並不限定任何類型的強制補助。**1934** 年的聯邦確認判決法案賦予聯邦法院採取這項行動的能力，約有四分之三的州賦予其法院這項權力。聯邦法院必須避免的抽象糾紛和確認之訴的情況之間雖存有差異，然而在真實世界中，法官很難畫這條界線。

抗辯必須具體、明確

聯邦司法的另一項約束是，除非請願者能先引用憲法條文作為抗辯基礎，否則法官實質上不審理案件。例如，憲法第一修正案禁止政府制訂「與宗教組織有關」之法令。在 **1989** 年，紐約州只為了撒塔瑪哈西德派(**Satmar Hasidim**) 人士的利益而建立了一個學區。該派由一群來自東歐且強烈抗拒現代社會之同化的哈西迪猶太人(**Hasidic Jews**) 所組成。該教派大部分的孩童就讀克亞斯喬爾鎮(**Kiryas Joel**) 的教區學校，但這些私校不收弱智或殘障的學生。撒塔瑪哈西德派聲稱，如果這類學生被迫就讀公立學校將受到精神創傷。州議會的響應辦法是建立一個只有單一學校的特別區，由該校收容來自哈西迪猶太人社區的殘障學生。這項做法遭到代表紐約州學校委員會之協會的抗議。**1994** 年 **6** 月，美國最高法院裁定單一學校學區的建立等於是將政治力量委託給正統派猶太教族群人士，因此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對政府「宗教組織」的禁令。無論是否所有人都同意紐約法規的合法性，幾乎無人懷疑該學校委員會在獲得司法複審上不符合標準：憲法明令禁止政府將政治權力委交特定的宗教實體。在上述的案例中，紐約州政府立即承認曾經為了單一宗教團體獨特利益而通過一項法令。

然而，若是有人走進法院聲稱某法條或公務行為「違反權利法案的精神」或「違反了制憲者的價值標準」，法官當然不會受理，因為如果法官可以隨意將實質意義賦予這種含糊的概述，那麼他們的所作所為就不受限制了。在真實世界中，由於憲法包含許多能廣泛解釋的條款，讓法官有巧妙處理與決策的充分空件，因此「抗辯必須具體、明確」的原則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那麼簡單、清楚。

受益人不得控告

司法自制的第三點是身為法令或公務行為受益人的請願者不可質疑該法。例如，假定一名農夫長期以來都是某方案的成員，參加該方案時，他同意讓部分農地休耕並定期接受聯邦政府的補助。幾年後，他獲悉一鄰人因為讓所有農地休耕而獲得定期款項。鄰人不勞而獲的情況觸怒了農夫，他因而質疑方案的合憲性。農夫向當地的聯邦地方法院抗議方案的合憲性。法官發現農夫為方案之成員並且從中獲得金錢補助便駁回了訴訟：人民不能在受惠於某項政府措施或公務行為後又在法院加以抨擊。

上訴法院裁決法律問題 — 而非事實問題

州與聯邦上訴法院的可行做法是，法院一概不受理以初審法官或陪審團不當堆積與識別案件之根本事實因素為理由的上訴。這不代表初審法官或陪審團在做事實判決時總是完美無缺，而是因為他們更貼近案件的實際當事人與物質證據，因此，比起在初審幾個月或幾年後閱讀文字紀錄的上訴法院，在事實評估方面能做得更好。不過，法律事務— 哪條法律適用於案件的事實，或如何就優勢法律評估事實 — 就適合上訴法院進行複審。

最高法院(嚴格說來)不受判例約束

如果最高法院在裁定案件時能夠隨意推翻或規避以往可能具有主導性的判例，這對司法積極(**judicial activism**)而言似乎是項爭論 — 而非限制。然而，這個慣例卻是司法自制原則之一。如果最高法院無可避免必須遵循先前判決，便失去了通融性。偶爾享有否決或忽視判例的自由讓最高法院保有支配權，也因此建立了必要時可躲避的安全角落。當法官發揮智慧、主導法院改變方向，或保持開放的態度時，這項自製原則便可付諸使用。

必須用盡其它救濟方式

另一項司法自制原則通常讓焦慮的訴訟當事人感到挫敗，但對井然有序的法律行政來說則是必要的：只有在其它法律與行政上的救濟辦法都用盡後，法院才能受

理案件。簡言之，此項準則代表訴訟者的法律請求必須經過向上層層打通關。聯邦案件首先由美國初審法院審理，接著由一個上訴法院複審，最後才由美國最高法院審理。無論案件或訴訟者的重要性為何，都必須按此程序進行。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上訴過程可縮短。

用盡救濟方式意味著可能的行政救助和嚴守司法三審級的準則。這類救助可能是以向行政官上訴、在委員會前召開聽證會，或經由立法組織正式考慮問題的形式進行。

法院不裁決「政治問題」

對美國法官而言，政府的行政與立法部門是屬於政治性的，因為都是以制訂公共政策為目的而由人民選出的。相較之下，開國元老們並未將司法設計成表達民意的工具，因此司法不具政治性。於是，根據這項推論，政治問題理所當然應由其它兩個政府部門之一來解決。

例如，奧勒岡州在大約 **1900** 年左右給予公民復決權與創製權的投票權，此舉遭到美國太平洋洲電話電報公司的抗議。（該公司害怕選民會忽略較為商業導向的法案，並通過限制其費率與獲利的法令。）該公司主張，憲法第 **4** 條第 **4** 項保障各州「實行共和政體」—此名詞應該是指法律只能由人民選出之代表制訂，而非直接由人民立法。最高法院拒絕審理此案，並聲明這是政治問題。法院的推論是，既然憲法第 **4** 條主要規定國會職責，因此制憲者是希望由國會— 而非法院 — 來監督各州的政府形式。

近數十年來，一項重要的政治對上非政治的糾紛已經影響到立法區域的重新分配。**1962** 年之前，最高法院多數的大法官拒絕裁決立法區人數不平等的合憲性問題，並表示這類事務「不應受法院審判」，而且法院也不敢進入法官菲立克思·法蘭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所謂的「政治棘叢」(the political thicket)。根據傳統的最高法院思維，制憲者希望議會能自行重新分配區域 —也許由選民共同參與。但是，在最高法院貝克訴卡爾(Baker v.Carr)案(1962 年)的裁決中，多數大法官已徹底改變思維。自彼時起，在許多案件中，法院皆認為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的平等保護條款規定立法區的人口規模必須相等，而且法院應該加以監督，確認此項命令之實施。

聲請人需負舉證責任

美國的法官一般都認為質疑成文法之合憲性的人必須承擔提出證據之責。因此，如有人抨擊某條成文法，那麼此人不能只是證明「其合憲性可疑或不明確」；還必須讓法院相信反對法律的證據是清楚且佔絕對優勢的。

這項舉證原則的唯一例外是公民權與自由的領域。有些強烈主張公民自由意志論的法官長年來堅決聲稱，當政府試圖限制基本人類自由時，舉證責任應該轉給政府。現在，這項主張在多個公民權法律學的特定領域相當盛行。例如，美國最高法院已裁定，與各種因種族與性別而對人民實施差別待遇的法律有關的案件要自動受到「特殊詳查」，意即將舉證責任轉給政府，由政府來證明確實有強制且優先的需要，所以必須依種族或性別來區分人民。舉例來說，政府一直以來(成功地)主張應給予軍中女性較大的限制，防止她們奉派執行全面性的戰鬥任務。

只以最狹義的理由推翻法律

有時在審判中，法官清楚明白憲法的規定已被立法或行政行為所冒犯。然而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法官可能還是會謹慎行事。首先，法官可能可以選擇宣佈某一所謂法定公務行為無效，而不是以憲法為依據。於法無據(**statutory invalidation**)意指法官因為某公務員的行為超越了法律所授與的權力推翻該公務員的行為。這類裁決具有在宣佈不端的公務行為無效之同時挽救法律本身的功能。第二，如果可能，法官只宣佈有合憲性缺陷的部份法令無效，不推翻整個成文法。

不依立法「智慧」作出裁決

如果嚴格遵守，這項原則代表宣佈某法令或公務行為違憲的唯一依據，是該法令或行為真的違反憲法。成文法不單因為不公平、浪費公帑，或導致糟糕的公共政策而違憲。認真思考之後會發現，這意味著當法官在檢驗立法的合憲性時，不能隨意採用個人對於公共政策的對錯或好壞的觀念。

隨著這項原則而來的情況是，某法令在通過時可能得到全體認可為良善且明智的，但該法卻違憲；反之，成文法可能合理化某項所有人明知不適當又危險的公務行為，卻仍無違憲之虞。

不依法律「智慧」作出裁決的原則實際上是很難遵循的，因為憲法是一份相當簡短的文件，在許多公共生活領域又著墨不多，而其中的諸多措辭與告誡也予人相當大的解釋空間。例如，憲法提到國會可規定州際通商，但到底什麼是通商？在具有「州際」特性之前，必須達到多大的規模？生而為人，法官對這個問題也有不同響應。憲法保障被控犯罪之人有請辯護律師的權利。但若有人向有罪之判決提出上訴，這個權利應繼續維持嗎？若答案是肯定的，那麼要持續幾次上訴？從嚴格與含糊的角度來解釋法律的人，對上述疑問的響應也各異。

總的來說，儘管法官解釋憲法時無法避免地會帶有個人的價值觀，但幾乎每位法官都贊同以上原則，意即：只有在違憲時 — 而非不合法官個人偏好時 — 法律才會被宣佈無效。

第四章

司法程序中的律師、 訴訟當事人以及利益團體



新任律師在堪薩斯州托皮卡宣誓於堪薩斯州法院和堪薩斯區聯邦法院就職。根據最新估計，全美有超過 95 萬名律師。 (AP/WWP)



大型的全國性法律事務所僱用律師、圖書館員，以及律師助手來協助合夥人執行例如研究調查等各項任務。 (© *Bob Daemmrich/The Image Works*)



在某些地區，如果被指控違反州或聯邦刑事成文法的人請不起辯護律師 — 如圖中的被告(中間面對法官者) — 則由稱為公設辯護人的政府官員負責代表被告出庭。 (© *Syracuse Newspapers/John Berry/The Image Works*)



涉及特殊利益最有名的案例之一是 1925 年的猴子訴訟(monkey trial)。此案中，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派出律師克萊倫斯·達若(Clarence Darrow)(左)為一名違反田納西州教授演化論禁令的生物老師約翰·史柯普斯(John T. Scopes)辯護。威廉·布萊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右)以聖經專家名義在起訴中作證。 (AP/WWP)



琳達·布朗(Linda Brown)(左)與妹妹及雙親提出了具指標性的訴訟案，即 1954 年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最高法院在此案中裁定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政策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同等保護條款。(© Time Life Pictures/Getty Images)



阿米希(Amish)青年阿比·尤達(Abe Yoder)、其父，以及其它教友被威斯康星州指控未依州法規定讓孩童接受直到 16 歲的義務教育。在這個宗教自由的案例中，利益團體為其雙親辯護。(AP/WWP)

本章的重點在於司法程序中的三個重要角色：律師、訴訟當事人，以及利益團體。美國法官裁決的案件，是由彼此發生爭執或糾紛的個人或團體向法院提出的。這些對手通常稱為訴訟當事人，有時他們在一些像小額賠償法院的小場所辯論案件，但是在較重要的司法場合，他們通常由律師代表。本章先就法律專業進行檢驗，隨後探討司法程序中訴訟當事人與利益團體的角色。

律師與法律專業

在美國，律師的訓練與法律的實踐隨著時間逐漸發展成形。現今，美國的律師在各種背景與環境下執業。

法律專業的發展

在殖民地時期(1607-1776)，美國沒有法律學校可訓練對法律專業感興趣的人。一些年輕人到英國受教育並就讀律師學院(Inns of Court)。律師學院並非正式法學院，只是英國法律文化的一部分，讓學生能夠熟悉英國法律而已。這時期，有志於法律的人通常都跟隨執業律師擔任書記工作或學徒。

美國革命(1775-83)之後，法律教育與進入律師業的門坎都不高，律師人數因而遽增。當學徒仍舊是獲得法律訓練最普遍的方式，但法學院已經出現。第一所法學院是由專門訓練書記與學徒的法律事務所產生的。這類學校的元老是康乃迪克州的李奇菲爾德學校(Litchfield School)。該校建於 1784 年，以講課方式教授商業法為重點。最後，幾所大學開始在一般課程中教授法律。1817 年，哈佛大學設立了獨立的法學院。

在 19 世紀後半，法學院數量顯著增加，從 1850 年的 15 所到 1900 年的 102 所。當時的法學院與今日的法學院有兩大差異。首先，以前的法學院通常不要求先前的大學學歷；第二，在 1850 年，標準的法學院課程可於一年內完成。1800 年代後期，法學院多為兩年制。

在 1870 年，哈佛大學開始推動重大變革，對之後的法律教育產生了長遠的影響。哈佛制訂更嚴格的入學門坎；沒有大學學歷的學生必須先通過入學測驗。法學院課程在 1871 年延長為兩年，在 1876 年延長為三年，而且學生必須通過第一年的期末考試才能繼續上第二年的課程。

然而，影響最深遠的改變是案例教學法的使用，也就是以個案紀錄簿取代講課與課本。這些個案紀錄簿(真實案例的彙編)的設計以解釋法律原則、法律含意，以及發展過程為宗旨。教師採用蘇格拉底式教學法，引導學生從案例中探索法律概

念。其它學校最終都採取了哈佛大學的教學方法，許多法學院至今仍採用案例教學法。

因應 1800 年代末對律師需求的增加，新的法學院也快速建立。設立新校的花費不高，這段期間還出現了不少僱用律師與法官為兼職教職員的夜校。新校的標準通常不嚴謹，課程則著重本地的實際做法，其主要貢獻在於給窮人、移民，以及工人階級的學生更多接受訓練的機會。

在 20 世紀，有意研讀法律的人數大幅增加。到了 1960 年代，法學院的申請人數暴增，幾乎所有的學校都變得挑剔。同時，因應社會壓力與訴訟，許多法學院開始主動招收女性與少數族群的申請者。

在 1960 年代，部份法學院的課程也擴及例如公民權法律和法律與貧窮等社會焦點，國際法也納入了授課範圍。

最近法學院興起一股強調使用計算機的趨勢，從註冊、上課須知、訴訟格式之取得，到學生服務等，幾乎無所不包。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愈來愈多法學院也提供智慧財產權特別課程，這是近幾年有相當成長的專門領域。最後，律師大幅增加對廣告的使用也對業界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全國各地的電視頻道上，民眾可看到律師提出上訴以吸引新客戶上門，而處理因廣告使用量的增加所衍生之業務的法律中心也已快速普及。

成長與層級化

過去半世紀來，美國律師數目呈現穩定成長，目前估計超過 95 萬名。這些律師在美國要如何就業？

法學院入學委員會在 2001 年版的《美國法學院官方指南》(The Official Guide to US LawSchool)上提供一些辦法。近乎四分之三(72.9%)的美國律師都是私人開業，有些在小型、個人的辦公室，有些在大型的律師事務所。約有 8.2%的法律專業人員在政府機構上班；約 9.5%在私人企業與協會擔任律師或管理職；約 1.1%

在法律扶助基金會服務或擔任公設辯護人，代表請不起律師的人；約 **1%**的人從事法律教育工作。另有約 **5%**的律師已經退休或不執業。

美國的律師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下運用其專業訓練。有些環境較有利可圖且享有聲望。這種情形導致所謂的專業技術分層。

影響聲望層級的因素之一，是法律專業的類型和所服務的訴訟委託人類型。在大型企業或機構服務的專業律師佔據了頂層，而在底層的則是代表個人利益的律師。

位於聲望頂層的，是大型的全國性法律事務所，一般都知道在此服務的律師出庭的時間少於為客戶提供諮詢的時間。客戶必須付得起僱用這些頂尖專業法律人才的費用，因此他們通常是大企業而非個人。不過許多大型的全國性事務所也提供公益性(**probono**，拉丁文，意指「公益」或「免費」)的法律服務，以促進公民權、公民自由、消費者利益，以及更美好的環境。

大型的全國性事務所由合夥人與律師所組成。合夥人擁有公司部分收益，律師則領薪水，並為合夥人擔任核心工作。這些大型事務所爭取全國最優秀的法學院畢業生。其中，最具聲望的公司擁有 **250** 名以上律師以及數百名律師助手(接受過特別訓練的非律師人員，專門處理法律工作的例行事務)、行政人員、圖書館員，以及秘書。

比在大型全國性事務所服務的律師低一個層級的，是受雇於大型公司的律師。許多大公司僱用全國性法律事務的律師擔任外聘律師，但愈來愈多公司僱用支薪的內部律師。有些公司的法律部門在規模上和私人事務所不相上下。此外，這些公司也和大型法律事務所為最優秀的法學院畢業生而競爭。

除了在法庭上代表公司(必要時，通常由外聘律師代表)，法律部門處理許多現代公司面臨的法律問題。例如，法律部門監督公司人事作業，使其確實遵循聯邦與州法所規定的僱用與免職程序。公司律師可以向董事會就例如合同、公司合併、股票出售，以及其它商業行為提出建議。公司的律師也協助訓練其它員工可運用

於特定職責的法律知識，並確使他們遵循法律。大公司的法律部門也扮演與外聘律師間的溝通橋樑。

大部分的律師則在法律專業中聲望較低的層級工作，他們不像為大型的全國性法律事務所和大企業工作的人那樣領取高薪。但他們從事的活動範圍更廣，並且幾乎每天都可以在法庭上看到他們的身影。這些律師代表人身傷害訴訟的當事人、起訴被控犯罪者或為他們辯護、代表離婚訴訟中的丈夫與妻子、協助人們進行房地產交易，以及準備遺囑等，經手的案件類型非常繁多。

為政府工作的律師也包含在層級較低的範圍內。有些人，像美國檢察總長與副檢察長，擔任相當具有名望的職位，但許多都是辛苦且薪水微薄的職務。一些律師選擇從事聯邦或州層級的法官工作。

法律職業的另一項特點是原告律師與被告律師間的不同。前者提出訴訟，後者則替被控從事民事與刑事不法行為的被告辯護。

司法程序中的政府律師(Government Attorneys)

政府律師的工作涉及司法程序的所有層級，從初審法院到州與聯邦最高層級的上訴法院都包括在內。

聯邦檢察官(Federal Prosecutors)每個聯邦司法區都有一名聯邦檢察官和一名或多名聯邦助理檢察官，他們負責在聯邦地方法院起訴刑事案件的被告，而當美國在聯邦初審法院被告時，他們也負責為美國辯護。

聯邦檢察官是由總統指派並經參議院批准的，被提名人必須居住於被指派的地區，而且必須是律師。正式任期為四年，但總統可決定重新任命或將其免職。聯邦助理檢察官在正規上是由美國司法部長(the U.S. attorney general)指派，雖然實務上的做法是由美國聯邦地區檢察官選任，再轉交司法部長批准人選。司法部長可解雇聯邦助理檢察官。

聯邦檢察官有相當大的職權可決定起訴哪些刑事案件，也有權決定哪些民事案件可尋求庭外和解、哪些案件必須在法庭上解決。因此，聯邦檢察官對聯邦地方法

院受理哪些案件的影響力很大。而且，由於聯邦檢察官是地方法院中接觸最多訴訟的人，他們與其職員的參與在聯邦初審法院的決策制定上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州層級的檢察官起訴被控違反州刑事成文法的人，通常稱為地區檢察官。許多州的地區檢察官是民選的郡級官員；少數幾州的地區檢察官則是被指派的。地區檢察署通常會僱用一些助理，由助理執行大部分的實際審判工作。多數地區的助理檢察官都是法學院的應屆畢業生，他們從這樣的職務得到寶貴的審判經驗。許多人後來自行開業，通常擔任刑事辯護律師。其它人則希望在幾年後成為地區檢察官或法官。

地區檢察官署在處理案件上有很大的斟酌空間。由於預算與人事限制，並非所有案件都可獲得相同的時間與關注。因此，有些案件遭到駁回，有些案件不起訴，有些則在法庭上被大力起訴，不過大部分的案件都以認罪協商收場，也就是地區檢察署同意接受被告承認較輕的罪，或撤銷部分指控以換取被告認罪。

公設辯護人通常被指控違反州或聯邦刑事成文法的人是請不起辯護律師的。在某些地區，被稱為公設辯護人的政府官員負責代表付不出錢的被告。因此，公設辯護人是檢察官的對手。與地區檢察官不同之處，在於公設辯護人通常是被指派而非選出的。

美國某些州設有遍及全州的公設辯護人制度；在其它地區，公設辯護人則由地方官員擔任，通常是來自於郡政府。公設辯護人和地區檢察官一樣都僱用助理與調查人員。

其它政府律師在州與聯邦層級，有些政府律師在上訴法院的表現比在初審法院更廣為人知。例如，每州都有一名檢察總長(**attorneygeneral**)，專門監督負責處理州法律事務的律師職員。在聯邦層級則由司法部代表美國負責類似的工作。

美國司法部雖然司法部是政府行政機構，其本質仍與司法部門有關。許多在聯邦法院審理的案件都和全國性政府脫離不了關係。有時政府被控告，有時則是政府提出訴訟。無論如何都必須由一名律師代表政府。即使許多政府機構都聘有律師，與聯邦政府有關的訴訟大多仍由司法部處理。

司法部的檢察總長辦公室(**Office of the Solicitor General**)在於最高法院辯論的案件中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司法部之下設有多個法律部門，各有專門領域的律師，由助理司法部長(**assistant attorney general**)所領導。法律部門監督聯邦檢察官處理的訴訟、將案件帶到上訴法院，並在最高法院辯論的案件中支持檢察總長辦公室。

聯邦檢察總長(U.S. Solicitor General)聯邦檢察總長是司法部第三號人物，有 5 名代理人與 20 名助理檢察總長提供協助。聯邦總檢察長的主要功能是代表美國決定哪些案件該或不該交由最高法院複審。當行政部門或機構在上訴法院輸掉官司並希望最高法院複審時，該部門或機構可要求司法部取得移審令。聯邦檢察總長將決定是否對下級法院的判決提出上訴。

做這類決定時有許多因素需列入考慮。也許最重要的著眼點在於最高法院可審理的案件有限。因此，聯邦總檢察長必須決定某些案件是否值得法院的密切注意。除了決定是否尋求最高法院複審之外，聯邦總檢察長個人也替由最高法院審理的政府案件進行辯論。

州檢察長(State Attorneys General)每個州都有一位檢察長擔任主要的法律官員。在大多數的州，州檢察長是由全州各黨票選的，負責監督以處理該州所涉及之民事案件為主要工作的律師僱員。雖然對刑事被告的起訴通常由地區檢察官處理，檢察長辦公室在調查全州各地刑事活動方面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檢察長與其職員在準備起訴被告案件時會與地區檢察官密切合作。

州檢察長也為州與地方機構提供諮詢意見。通常，這些意見是對尚未被法院裁決之部份州法的解釋。雖然諮詢意見可能在法庭上的案件中遭到否決，就認定州與地方機構的行為而言，檢察長的意見仍具重要性。

司法程序中的私人律師

在美國，刑事案件的被告擁有憲法賦予的權利，可由律師代表。部份司法管轄區已設置公設辯護人辦公室代表貧窮的被告，其它地區則採取指派私人律師代表給付不出錢的被告的方式。出的起錢的被告也會這麼做。

在民事案件中，憲法未賦予原告或被告僱用律師的權利。然而，在民事範圍中，法律問題通常非常複雜，所以需要僱用律師。有需要的人也可尋求各種形式的法律協助。

指定的辯護律師必須指派私人律師代表某位貧窮的被告時，通常由某位法官基於特殊原因進行指派。地方律師協會或律師本身通常會提供願意擔任這項工作的律師名單給法院。

私人辯護律師有些私人開業的律師專精於刑事辯護。雖然電視與電影將刑事辯護律師的生活描繪得光鮮亮麗，但真實情況卻是工時長、薪水少，而且聲望低。

法院工作小組

在刑事法庭工作的律師與法官常會變成工作小組的成員，而非指示偶爾為了解決某件糾紛而集會然後分道揚鑣的陌生人。

法院工作小組中能見度最高的成員 — 法官、檢察官，以及辯護律師 — 各司其職：檢察官負責給被控刑事上違反政府的人定罪，辯護律師為客戶尋求無罪，法官則擔任立場超然的裁決者以確保審判的公平性。儘管職責不同，法院成員共享某種價值觀與目標，並不如許多人想像的那麼勢不兩立。法官、檢察官，以及辯護律師之間以合作為常規。

法院工作小組最重要的目標是快速處理案件。法官與檢察官喜歡快速處理案件，以彰顯其成就與效率。私人辯護律師需要處理大量案件才能維持生活，因此快速處理案件對他們有利，而公設辯護人快速處理案件則純粹因為缺乏充足資源來應付案件量。

法院工作小組的第二項重要目標是維持小組團結。成員間發生衝突會使得工作更難實行，並且使案件無法快速解決。

最後，法院工作小組關心不確定性的減少與控制。在實務上，這代表法院工作小組的所有成員都盡力避免審判。審判(尤其是陪審團審判)會造成許多不確定性，因為它需要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卻無法保證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

為達上述目標，小組成員使用多項技巧。雖然也會出現單方面的判決與相互對立的程序，但協商仍是在刑事法庭中最普遍使用的方式。小組成員針對廣泛的各項問題——例如：延期審理、審理日期，以及信息的交換等——進行協商，而認罪協商然是協商中最關鍵的手段。

提供給窮人的法律服務

刑事被告在憲法上有權由律師代表，民事案件被告或想要提出民事案件的人卻不然。因此，沒有錢僱請律師的人可能覺得難以獲得正義。

為此，許多地區都設有法律扶助服務。早在 1880 年代末，紐約與芝加哥即設有法律扶助協會，其它大城市也於 20 世紀陸續跟進。部份法律扶助協會由律師協會贊助，但多數憑靠私人捐獻。在部分地區，法律扶助協會與慈善機構結合，許多法學院也開設法律支持中心為窮人提供法律協助並提供法學院學生有價值的訓練。此外，許多律師提供的多為「公益性的」(*pro bono publico*，拉丁文，意指「為了公益」)法律服務，因為他們視之為職業義務。

訴訟當事人

向法院提出的案件，有些是由個人提出的，其它的則是由一位或多位可能是政府機構、企業、協會、利益團體，或大學的訴訟者所提出的。

什麼原因促使一個人或團體把不滿帶上法院？在刑事案件中，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簡單，那就是有人涉嫌違反州法或聯邦法，所以政府對於涉嫌違反成文法的人起訴。民事案件就沒那麼單純了。有些人準備將不滿帶上法院，許多其它的人在相關費用和時間的考量下盡量避免採取此一途徑。

政治科學家菲利普·庫柏(*Phillip Cooper*)指出法官要解決的糾紛有兩種：私人的法律案件與公開的法律爭議。私人的法律糾紛指的是由某公民或組織控告他人的糾紛。所謂的公開的法律爭議，則是公民或組織聲稱某政府機構或官員違反憲法或成文法保障他們的權利。庫柏在《困難的司法抉擇》(*Hard Judicial Choices*)

一書中提到，「法律行動，無論是私人或公開的，一定是政策導向或以賠償為目的」。

一個私人、尋常，且以賠償為目的的經典訴訟案例是，在汽車肇事的車禍中受傷的某人控告另一輛車的駕駛人，以獲得賠償金作為所需之醫藥費的補償。這類訴訟屬於私人性質，不以改變政府或商業政策為目的。

然而，部份私人法律案件在本質上卻是以政策或政治導向的。個人傷害與產品責任的訴訟從表面上看來可能純粹以賠償為目的，但也可能用來改變被告之私人公司的製造和商業運作方式。

北卡羅萊納州一起訴訟案就是很好的例子。此案始於 **1993** 年。當時，一名五歲女童在另一名孩童將兒童池的排水孔蓋移開後被困在排水管裡。在救出女童之前，排水管強大的吸力幾乎把女童的大小腸都吸去了。結果，女童餘生的每一天都必須花費大約 **11** 個小時靠進食管維持生命。**1997** 年，陪審團判給女童家人 **2,500** 萬美金的賠償金，而在陪審團考慮懲罰的賠償之前，排水管製造商與其它兩名被告已以 **3,090** 萬美金和解。原告律師表示，這件訴訟案突顯了全國其它地區的類似事件，並揭露了業內人士知悉而其它人不知情的事情。這家人不只贏得訴訟，北卡羅萊納州議會也通過立法要求設置多個排水孔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然而，最具政治與政策導向的訴訟是公開的法律爭議，也就是為了阻止可能的不法政策而向政府提起訴訟。這類訴訟也可能尋求賠償金或其它的補償形式。最高法院判決之盧卡斯訴南卡羅來納州海岸委員會 (**Lucas v. South Carolina Coastal Council**) 案，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南卡羅來納州的沿岸區域管理法禁止戴維·盧卡斯 (**David H. Lucas**) 在他所有的兩塊海濱空地上建造住宅區。南卡羅來納州初審法院裁定盧卡斯有權獲得損失賠償，但是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推翻了這項判決，於是，盧卡斯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最高法院的判決有利於盧卡斯。該判決指出，如果財產所有者因為被拒絕使用自己經濟上可用之財產而蒙受損失，依憲法規定可以得到賠償。

政治或政策取向的訴訟在上訴法院比在初審法院更普遍，也是美國最高法院最常見的案子。一般的賠償金案例通常在司法程序初期就結束了，因為訴訟者發現和解或接受初審法院判決是較有利可圖的做法。政治案件的訴訟者通常不會很努力地透過在下級法院爭取勝訴的方式推動政策目標，而寧願透過上訴法院的判決獲得外界的高度關注。在上訴法院上訴所費不貲，因此這個審級的案件大多有利益團體提供某種形式的贊助。

司法程序中的利益團體

雖然利益團體較為人所知的是其影響立法與行政部門決定之企圖，但他們也在法院追求政策目標。有些團體發現司法部門比其它兩個政府部門更能接納他們。沒有在國會或州議會發動密集遊說攻勢之經濟來源的利益團體發現，僱請律師或以某憲法與成文法法條為基礎而構成法院案件的作法比較容易。同樣的，成員中沒有法定登記選民的小型團體可能缺乏政治力量，難以對立法與行政部門官員造成影響。然而，大型會員組織與政治力對向法院提出訴訟而言並非必要條件。

有時利益團體也會轉而訴諸法院，因為他們發現司法部門比其它兩部門更為支持其政策目標。從 1960 年代初期到末期，以自由政策為目標的利益團體在聯邦法院取得很大的進展。此外，以大眾利益為宗旨的法律事務所的概念在此時代也備受矚目。以大眾利益為宗旨的法律事務所進行的，是對一般大眾有利的案件，包括消費者權利、就業歧視、職業安全、公民自由，以及環境議題。

在 1970 與 1980 年代，保守的利益團體比以往更常訴諸於聯邦法院。這是自由利益團體勝利的部分效應，聯邦法院為保守的觀點提供一個愈來愈有利的場所也是原因之一。

利益團體在參與司法過程中可能會依據團體的目標而採取幾個不同形式，其中有兩項主要策略特別受到矚目：透過「法庭之友」狀(*amicus curiae* brief)參與測試案例與資料陳述。

測試案例(Test Cases)

由於司法部門只能藉由在特定案件中作出裁決的方式參與決策，因此，利益團體使用的策略之一，是確保能達到政策目標的案件能向法院提出。在某些情況下，這代表利益團體將提供所有必要資源以促進案件的進行。此類贊助中最著名的，是布朗訴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1954 年)。在本案中向堪薩斯州托皮卡教育局提出訴訟的雖然是琳達·布朗(**Linda Brown**)的雙親，但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NAACP**)也提供了所需的法律與金錢贊助，讓本案一路順利上訴至最高法院。索古德·馬歇爾(後來成為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代表原告和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辯論此案。結果，最高法院判決公立學校的種族隔離政策違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美國有色人種促進會贏得了勝利。

利益團體可能會為一個原本由他人所提出，但涉及該團體非常重視之議題的案件提供協助。以一個宗教自由的案件：威斯康星州訴尤德(**Wisconsin v. Yoder**)一案為例。威斯康星州提出刑事訴訟，控訴喬拿斯·尤德(**Jonas Yoder**)等人未依州法規定讓孩童接受直到 16 歲的義務教育。尤德等人是阿米希(**Amish**)教徒，他們認為八年級以上的教育會瓦解他們所珍視的信仰，並「對他們的孩童造成世俗的影響」。

一個名為阿米希宗教自由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mmittee for Amish Religious Freedom**)的組織為尤德等人辯護。在初審法院做出不利於阿米希的判決後，阿米希宗教自由全國委員會向威斯康星州巡迴法院提出上訴，不過該法院支持原判。該會繼而向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上訴並得到有利於阿米希的判決。判決認為，義務教育法(**compulsory school attendance law**)違反了憲法第一修正案的信教自由條款。1972 年 5 月 15 日，威斯康星州向美國最高法院上訴，結果最高法院認可阿米希宗教自由全國委員會以宗教理由反對義務教育法的主張。

正如以上各例所闡明的，利益團體的訴訟參與以可送達最高法院的重大憲法議題為重點。因為只有少部分案件能上訴到國家最高法院，所以大部分利益團體律師所處理的，大都是下級法院的一般例行工作。這些律師可能只要處理所屬團體之訴訟委託人的法律問題即可，不需為了上訴法院而打造重大的測試案件。

舉例來說，在 1950 和 1960 年代的民權運動中，公益的律師不只針對重大的民權議題打官司，也為與地方當局發生問題的非裔美國人與民權工作者辯護。這些利益團體律師後來在專業的法律扶助協會中發揮了許多功能：他們擔任參與重要社會改革運動人士的法律代表，並透過持續向法院提出訴訟的方式讓大眾注意到非裔美國人的困境。

法庭之友狀

呈遞法庭之友狀是利益團體參與案件的簡便辦法。透過這個方式，即使利益團體無法掌控案件，仍然可以把想法呈現在法庭上。假如團體獲得訴訟當事人或法院的同意參與案件，利益團體便可呈遞法庭之友狀作為訴訟者的補充辯論。提出法庭之友狀的策略通常用於聯邦與州層級的上訴法院而非初審法院。

有時法庭之友狀用於加強一方訴訟當事人的立場。當威斯康星州訴尤德一案在美國最高法院審理時，提出法庭之友狀支持阿米希動機的組織包括基督復臨安息日會(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Seventh Day Adventists)、全美基督教會協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國猶太教會堂理事會(the Synagogue Council of America)、美國猶太人委員會(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全國猶太委員會法律與公共事務部(the National Jewish Commission on Law and Public Affairs)，以及門諾中央委員會(the Mennonite Central Committee)。

有時使用法庭之友狀不是以加強一方當事人的辯論為目的，而是為了向法院表達該團體對如何裁決案件的看法。法庭之友狀的使用通常是為了說服上訴法院批准或拒絕複審下級法院的裁定。美國最高法院的一項研究發現，法庭之友狀的出現大幅提高了法院完整解決案件的機會。

不同於私人的利益團體，政府所有層級不需經過批准即可呈遞法庭之友狀。在這方面，聯邦檢察總長尤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某些情況下，最高法院可邀請聯邦檢察總長呈交法庭之友狀。

第五章

刑事法院程序

當有人違反法律，刑事程序便開始，接著延伸到逮捕、控告、審判，以及上訴。美國沒有任何單一的刑事或民事法院程序。聯邦體系有一套國家層級的法院程序，而各州與各地區也有自己影響司法程序的一套規則。上述的所有政府實體之間確實有規範與相似處，這也是接下來探討的重點。不過，沒有兩個州的司法體系是完全相同的，也沒有一州的司法體系和全國性政府的司法體系是完全一樣的。

犯罪的本質與真義

造成傷害或不道德的行為不一定是犯罪行為。只有明確違反由國會、州議會，或其它公家機關正式頒布之刑事成文法的行為，才是真正的犯罪行為。因此，犯罪是違反州法的罪行，可處以罰金、監禁，或死刑。犯罪是對整體社群義務的違反行為，並只可由州加以處罰。民事法院或民事訴訟無法加諸入獄或死刑的制裁(雖然罰金可能是民事或刑事的一項處罰)。

在美國，大部分的罪行都屬於干犯之罪(**sins of commission**)，例如重傷害或侵佔；少數屬於怠忽之罪

(**sins of omission**)，例如在交通事故後沒有停下車來提供救助，或未申報所得稅。州認為某些罪行，例如謀殺與叛國罪，是重罪，其嚴重性也反映在相應的懲罰上，例如無期徒刑或死刑。州認為其它的罪行，例如並排停車或擾亂治安，只要稍加懲罰即可，因此處以小額罰金或在當地監獄拘留一晚，略施小懲。

有些犯罪行為，例如綁架或強暴，超過了所有公民可容許的人類行為範圍，有些罪行卻造成意見分歧。舉例來說，1897年的一項密執安州成文法規定在孩童面前咒罵是違法行為，內布拉斯加州的一項法律則禁止在教堂晚餐時玩賓果遊戲。其它愚蠢的刑事成文法還包括威斯康星州規定在酒吧唱歌不合法，劉易斯安納州則禁止在出席文學研究聚會時出現醉態。

美國最嚴重的犯罪行為是重罪。絕大部分的州，任何罪行之重罪可處以死刑(在許可死刑的州)或是坐牢(聯邦或州監獄)；其它的罪行則包括輕罪或違規。在其它州，依據聯邦法，重罪可處以死刑或入監一年以上。因此，重罪在某些州依據懲罰出現的地方而有不同；某些州，根據聯邦政府，刑期才是重點。重罪的例子有謀殺、強制性交以及持械搶劫。

輕輕罪則被各州視為小罪，其懲罰通常是在市或郡監獄監禁一年以下。公然酗酒、小賭，以及流浪都是一般常見的輕罪。有些州有第三類罪行，稱為違規，通常包括不嚴重的交通違規，例如違規停車，通常以小額罰鍰作為懲罰。罰鍰通常也是輕罪或重罪懲罰的一部份。

犯罪種類

今日美國的主要刑事犯罪分為五大類，包括傳統型犯罪、經濟犯罪、組織犯罪、政治犯罪，以及合意犯罪。

傳統型犯罪

在美國每年 **3,110** 萬件傳統型犯罪中，財產犯罪佔其中大多數。政府將財產犯罪與暴力犯罪區別開來，即使兩者往往關係密切。例如，闖進住宅的小偷不慎和抵抗的屋主起衝突時可能會傷害屋主，因此所涉及的罪行就不只是竊盜的財產犯罪。

數量較少但更令人害怕的傳統型犯罪是對人身的侵害。這些暴力犯罪包括謀殺、故意殺人、強制性交、搶劫，以及重傷害。

經濟犯罪

經濟犯罪分為四大類：

- 個人犯罪由非暴力犯罪行徑所構成，即某人以金錢報酬欺騙另一人，例如蓄意開空頭支票、逃漏所得稅，以及福利詐欺。
- 違反信託是企業或政府員工違反對僱主或客戶的忠誠，並從事例如商業賄賂、在工作場所竊盜與侵佔，以及填寫不實之公款支付賬戶等行為。
- 商業犯罪是指非企業之主要目的但附帶(或是為了助長公司)發生的犯罪。不實廣告、違反反托辣斯法，以及為了公司所得稅而估算之不實折舊數字等，皆屬商業犯罪。
- 騙局(con games)是假藉商務之名的白領階級犯罪行徑。

組織或集團犯罪

組織犯罪由一群人所從事，通常以某種階級型態為領導基礎。這是一種與恐懼和腐敗緊密結合的持續性活動。集團犯罪的活動通常集中在特別有利可圖的領域，例如非法毒品的走私、賭博、賣淫，以及高利貸(高利息與高償還率的金錢借貸)。

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通常是由侵犯政府的行為所構成：叛國、叛亂、刺殺政府官員，以及煽動叛亂。不過，政治犯罪一詞也指政府對個別公民、異議團體，以及外國政府或國民的犯罪行為。一例如，政府對政治異議團體進行非法竊聽，或軍方拒絕調查性騷擾事件等。

合意犯罪

所謂的無被害人犯罪，例如賣淫、賭博、非法使用毒品，以及兩名成年人同意進行不法的性行為等，皆為犯罪者與委託人雙方想從事法律禁止之活動，因此稱為合意犯罪。

犯罪的要素

每項犯罪行為都有數個不同要素，除非州能在法庭證明這些關鍵要素的存在，否則無法定罪。雖然法庭上的司法程序可能不會清楚而個別地針對這些要素，但在將某刑事罪犯定罪的整個司法過程中，這些要素至少是內隱其中的。

定義犯罪及其懲罰的法律

如果法律禁止或規定某項行為，正式設立的機構(通常是國會或州議會)必須詳加說明，好讓人民能事先知道什麼行為是受到法律禁止或規定的。立法者也必須針對涉及傷害行為的個人訂定懲罰。

這項總則會產生一些必然的結果。一是美國憲法禁止刑事的追溯法令，也就是在行為發生之後法令才宣佈該項行為違法。同樣的，州不能通過剝奪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法案(**billsofattainder**)，意即針對特定人士或族群，並宣佈這些人的某些行為是罪行，但相同行為由其它人來做的話卻是合法的。最後一項必然結果是犯罪行為的法律必須是精準的，如此一般人才能先行判斷哪些行為是被禁止或規定要做的。

犯罪行為(**actus reus**)

拉丁文 **actus reus** 是指被告犯下之被法律起訴的犯罪行為。犯罪行為是犯罪的物質要件。這項要件可以是犯下被禁止的行為(例如施暴或毆打)，也可以是未履行規定之行為(例如拒絕停下來協助車禍受害者)。

犯罪意圖(**mens rea**)

拉丁文 **mens rea** 是指關鍵的犯罪心理要件。美國法律系統清楚區隔意圖傷害與因單純疏忽或意外造成的傷害。因此，如果某人使另一人喪命，州通常不會稱之為謀殺。如果一名心理健全人士做出蓄意謀殺之行為，則可能被稱為「一級謀殺」。如果是因在酒吧爭吵而動怒殺人，則可能被稱為「二級謀殺」，刑責較輕。在公路上因魯莽駕駛而致他人於死，則屬於「過失殺人」——這當然是一種罪行，但是在州看來並不如蓄意謀殺他人那麼嚴重。

傷害或結果

犯罪是指某人對他人造成的明確傷害，或一人對另一人做出犯罪行為。犯罪可能會對社會大眾造成傷害，例如將販賣軍事情報給外國政府，或者，傷害可能是加諸於個人的，但因其本質，而被視為危害社會整體。傷害的本質，如同犯罪意圖一樣，通常決定了犯罪的本質。例如，假設有兩名駕駛互超對方的車，最後都停下車出來互毆。假定其中一人把對方打得太嚴重，致使一方死亡，此罪行可能是(某種程度的)謀殺。如果對方沒死但身體嚴重受傷，罪行則為重傷害。如果傷害不嚴重，則以一般傷害罪起訴。由於罪行通常取決於傷害的本質，因此，傷害的本質可以說是犯罪的關鍵法律要素。

即使沒有造成任何實際上的傷害，有些行為可能仍是犯罪行為。大部分的犯罪共謀行為即屬於此類。舉例來說，如果有幾個人計劃行刺法官或賄賂陪審員好讓某罪犯不被判有罪，就犯了共謀阻礙司法之罪。即使法官安然無恙，陪審團也沒拿到任何一毛錢，仍然屬於犯罪行為。只要有犯罪計劃和意圖，加上為達目的由一共謀者從事特定且蓄意之行為(例如購買武器或擁有法官往返住家與法院之間的路線圖)，犯罪行為就成立。

行為與造成的傷害之間的因果關係

在刑事犯罪定罪之前，州必須證明被告以自然且連貫的程序造成了傷害。要證明因果關係通常不困難。假設比爾以小刀刺傷約翰並造成輕傷，比爾因為使用致命武器施暴而有罪是無庸置疑的。但若約翰的傷口因為沒有得到適當醫療照護而引發感染並導致死亡，那麼比爾是犯了過失殺人罪抑或謀殺罪？又或者，如果約翰被刺傷後巧遇第三人並將之傷害，比爾該為此負責嗎？

如何處理這類問題通常讓法官與陪審團頭痛。法律規定必須考慮所有的情況。只有當州能證明被告的行為是受害者受傷的直接、立即，或決定性的因素，才能將之定罪。

刑事審判前的程序

聯邦與州法律規定，在舉行刑事審判之前必須完成一連串的程序與事件。其中的幾個階段是美國憲法和州憲法所規定的、幾個階段是法院判定的，其它階段則是

由法律條例規定的。至於其餘的，則取決於慣例與傳統。雖然這些程序性事件的真正本質在聯邦與州以及州與州之間各有不同，全國仍有相似之處。這些程序表面上看來具有必然性與例行性，但實際上卻不然；司法體系的決策者在全程各階段皆可據其價值觀、態度，以及世界觀來運用裁量權。

逮捕

逮捕是州與被告間的首次實質接觸。美國司法體系提供兩種逮捕方式：有逮捕令的逮捕與沒有逮捕令的逮捕。逮捕令是在某人對他人提出控訴，經地方法官審查並發現正當的逮捕理由後所發佈的。沒有逮捕令之逮捕行為則發生於犯罪在警官面前發生或某警察有正當理由相信某人已經(或正要)犯罪之時。之後警官必須起誓聲明或提出證詞來證明當時的判斷。在美國，高達 **95%** 的逮捕行為都是在沒有逮捕令的情況下發生的。

警察對於逮捕與否的判斷絕不單純，也絕非理所當然。當然，如果情況允許，親眼目睹謀殺案的警察會當場進行逮捕。但是大部分的違法事件沒有這麼簡單或黑白分明，而警察在是否拘捕某人這件事情上擁有一 也行使 一很大的裁量權。警方根本沒有足夠資源來處理所有國會與議會禁止的行為。因此，他們必須行使裁量權來決定如何分配既有的時間與資源。在某些地區，警察裁量權達到了最大極限。

微不足道的違法行為(Trivial Offenses)許多警察手冊都建議警察在關切一些不重要的違法事件時，警告比逮捕更合適。交通違規、青少年行為不端、酒醉、賭博，以及流浪等，都是輕微的罪行，由警察決定即可。

受害者將不尋求起訴犯罪受害者不與警察合作起訴案件時，警方一般也不會執法。例如在較不嚴重的財產犯罪中，受害者通常滿足於賠償或無暇出庭作證。除非警方已經投入了大量資源調查某樁財產犯罪案，否則通常就會依從受害者的意願。

當犯罪受害者與罪犯有持續往來的關係，警察通常拒絕逮捕。這類關係包括房東與房客、鄰居，以及最近才加入的夫妻關係。不過，夫妻關係中受到高度關注的家暴行為已對警方的處理程序造成重大的影響。

強暴與對兒童性騷擾(**child molestatoin**)是犯罪的另一大種類。因為受害者不願或不能與警方合作，通常無法逮捕這類罪犯。通常受害者或與罪犯為熟識或相關，因為害怕報復或令人難堪的案情公諸於世而不願提出告訴。

受害者也涉入不法行為 當警方得知犯罪受害者也涉入某種不當或可疑行為時，往往選擇不予逮捕。

在治安法官面前應訊

犯罪嫌疑犯被捕後，會送到警察局備案；也就是記錄逮捕的相關事實，留下被告的指紋並拍照。接下來被告被帶去見審級較低的司法官員，可能是法官、治安法官，或行政官員。這樣的應訊應以「無非必要之延遲」的方式進行；**1991**年，美國最高法院裁定警方無逮捕令所逮捕之罪犯在法院審理其正當性之前，警方羈押時間最多為**48**小時。

此次法庭應訊是刑事司法程序中多項重大事件發生的場合。首先，被告必須已經知悉被控的明確罪名以及所有的憲法權利與保障，這些權利包括最高法院於**1996**年對現在廣為人知的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v.Arizona**)案所做的判決中所包括的權利：被告「在回答任何問題之前必須被告知有保持緘默的權利；被告的任何陳述都可被當作法庭上不利於他的證詞；有權請律師辯護，若無法負擔律師費，在應訊前會指派一名律師給他。」(進行逮捕的警官在詢問嫌犯案情之前也必須先告知這些權利。)在某些州，還必須讓被告知悉該州權利法案所提供的其它權利，例如迅速審判的權利以及與帶有敵意之證人對質的權利。

第二，由治安法官決定是否讓被告交保和保釋金額。憲法只規定金額不可「過高」。交保被視為特權 一而非權利 一就死刑案件而言，如果罪證確鑿或治安法官認為被告無論保釋金多寡都有可能棄保潛逃，就可能會完全拒絕交保。保釋的替代方

法是具結釋放(**release on recognizance**)，基本上是指被告保證在指定的審理日期返回法庭。

在次要案件中，被告可能被要求承認或否認有罪。如果認罪，可能當庭宣佈刑責；如果被告不服罪，再排定審判日期。然而，在典型的重大案件(重罪)案件中，治安法官的下個主要職責是決定是否預審被告。如果預審的做法是妥當的，檢方便會延後該案，下一個刑事司法程序於焉開始。

大陪審團程序或預審

在聯邦層級，所有被控犯罪者都受到憲法第五修正案的保障，由大陪審團審理案件。然而，最高法院已拒絕讓各州受此權利之約束。今日，只有約半數的州使用大陪審團；其中部份州的大陪審團只用於特殊類型的案件。不使用大陪審團的各州則採取預審或審查性審理(**examining trial**)。(有幾個州兼用兩套程序。)無論採用哪一種方法，刑事司法程序在這個階段的主要目的都是決定是否有充分理由讓被告接受正式審判。

權利告知

你被捕了。在我們問你任何問題之前，你必須瞭解你有什麼權利。
你有權保持緘默。你隨時可以不和我們說話或回答任何問題。你所說的一切都可能成為在法庭上對你不利的證據。
在我們詢問你之前，你有權諮詢律師，審訊時並可要求律師在場。
如果你沒能力請律師但是想找個律師來，會指派一個律師給你。
如果你現在想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回答問題，你仍有權隨時拒絕回答任何問題。在你和律師交談之前，你隨時有權停止回答任何問題。

自 1966 年起，警方在審訊之前必須將嫌犯的權利加以告知。警方使用所謂的「米蘭達警告」(**Miranda Warning**)，這是以恩尼斯托·米蘭達(**Ernesto Miranda**)命名的，他因為未被告知權利而獲准重審。

大陪審團大陪審團由 16 到 23 名公民組成，通常從選民登記名單中隨機挑選，他們以多數決的方式做判決。陪審團的開庭期可能持續一個月到一年，有些人在這期間可能審理一千件以上的案子。檢察官單獨向大陪審團提出證據，被告與其律師不只不在場，通常也不知道進行審理的是哪個陪審團或何時審理。假如多數陪審員認為有充分的理由，檢察官便提出起訴書或向法官提出起訴通告 (truebill)，否則不予起訴。

歷史上有兩個論證對大陪審團有利。第一，大陪審團擔任制約檢察官之工作，防止檢察官因政治或個人因素而利用職務之便騷擾無辜人民。理想上來說，是由一群公正無私的公民介入不道德的檢察官與被告之間。支持大陪審團的第二個論證，是確保地區檢察官已握有充份證據，足以作為啟動一樁全面性審判所帶來的麻煩與花費的正當理由——這是為了州，也是為了被告。

預審在廢止大陪審團制的州當中，大多數採用預審方式來決定是否有充分理由審理被告。在預審時，檢方提出案件，被告有權對證人進行交叉盤詰並提出有利的證據。通常被告不會選擇在刑事訴訟程序的這個階段爭論；事實上，大部分案件中的被告往往都會放棄預審。

如果預審法官認為有正當理由進行初審，或假如預審被放棄，那麼檢察官必須提交訴訟狀給進行審理之法院，精確簡述將在新司法階段提出的指控。

傳訊

傳訊是指被告為了因應大陪審團之起訴書或檢察官之訴訟狀而被帶到即將進行審理之法院的法官面前的過程。通常由檢察官或法官助理於公開法庭宣讀被告被控之罪名。被告被通知擁有由律師代表的憲法權利，如果必要，會免費為其指派一名律師。

被告可選擇的答辯方式有幾種。最常見的答辯是有罪與無罪，但被告亦可以精神失常、曾經被告(曾經以相同罪名受審)，或「不爭執」(noln contendere)作為無罪答辯的理由。不爭執代表被告不否認案情但主張沒有犯任何罪，或者也可能表示被告不瞭解指控。只有經過法官(有時還需檢察官)同意，才可提出不爭執之答

辯。這種答辯有兩種好處，一來，被告可在面對大眾時保住面子，因為即使被判刑或處以罰鍰，被告仍可於之後聲稱嚴格來說法院並未做出有罪判決。再者，此種答辯可讓被告免除可能附隨有罪答辯的民事刑罰(例如，因為認了詐欺或挪用公款之罪而可能發生的民事訴訟)。

假如被告作無罪答辯，法官將排定審理日期。如果有罪答辯，被告可能當場或由法官擇日判刑。法院接受有罪答辯之前，法官必須證實被告自願作出答辯，也知道該答辯代表的含意。有罪答辯實際上已相當於正式的有罪判決。

認罪協商(Plea Bargain)的可能性

州與聯邦的所有刑事案件中，至少有九成不進行審理，因為在審理日期前，檢察官與被告律師已針對被提出的正式指控和州可能向法庭建議的刑罰種類達成協商。實際上，是以允諾某種形式的減輕處罰換取被告認罪。

由於認罪協商在審理之前已經決定了被告的命運，法官只扮演確保法律與憲法程序得以妥善進行的角色。認罪協商分為三類(彼此並非互不相容)。

減少控訴檢察官與被告之間最普遍的協議方式就是將原來證據所支持的罪名減輕，大幅縮減了罪犯刑罰可能性的範圍。罪犯認罪以換取較輕微指控的第二個原因，是避免留下會帶來社會污名的定罪紀錄。另一個可能性則是被告可能希望不要留下任何重罪紀錄，因此願意承認檢察官提議的任何輕罪，這麼一來就不用面對重罪指控了。

刪除無關的指控認罪協商的第二個形式是地方檢察官同意放棄對某人未了結之其它指控。其方式有二：一是同意不「垂直」起訴 一意即不向某人被告提出更嚴重的指控，一是協議是取消「水平」指控，也就是取消被告同罪行之未了結的額外起訴。

此類認罪協商的另一種做法是同意移除起訴書中的累犯條款。在聯邦層級以及許多州，如果某人在全美任何地點被判第三次暴力重罪，就被視為累犯。對於累犯的強制刑罰是終身監禁。州法院通常用移除累犯指控的方式換取認罪答辯。

這個認罪協商形式的另一種做法是同意將不同法院的起訴合併至同一法院，讓刑罰同時發生。當許多管轄區域都發出起訴書或預審判決時，這些起訴書和預審判決就會進入協調系統的法院待審清單。這意味著被控以四項偽造文書和一項藏有偽造文書罪名的被告，可能被列在五個不同法院的待審清單上。通常，這種多法院管轄案子的一般作法，是將對被告的所有起訴轉至清單上的第一所法院，讓審判長有權同時裁量被告的所有課刑。

量刑協商第三種形式的認罪協商是指被告以認罪答辯換取檢察官向法官要求從輕量刑。量刑協商的效力以司法體系中有限資源之事實為基礎。至少在州層級，檢察官有把握對被告承諾的某項建議刑罰能為法官所接受。如果法官不這麼做，檢察官的可信度將快速降低，許多先前認了罪的被告也開始提出無罪答辯，在法院冒險一試，結果可能導致法院待審案件大量增加，以致於超出負荷，造成司法體系運作停頓。檢察官與法官都很清楚這個現實，被告律師也不例外。

憲法和成文法對認罪協商的限制正當的法律程序規定，認罪協商必須在自願且充分瞭解的情形下進行，在州和聯邦層級都是如此。這意味著法院必須告誡被告認罪的後果(例如，被告放棄所有改變心意的機會)，被告必須神智清楚，並且就像一州所言之「顯然未受任何恐懼或勸說所影響，也未在誤信將有特赦的情況下因他人慫恿而認罪。」

對於前兩類認罪協商 — 減少控訴以及刪除無關的指控 — 聯邦法院有其更嚴厲的標準。一是法官不能實際參與認罪協商過程：在州審級，法官可能在這個程序中扮演著主動的角色。同樣的，如果聯邦檢察官與被告間達成認罪協商，則政府不可背信，一旦聯邦政府背信，聯邦地方法官就必須撤銷認罪。最後，聯邦地方法院刑事訴訟規則規定，在接受認罪之前，檢察官必須提出指控被告之證據摘要，法官也必須同意有確鑿之證據可證明被告之罪行。

贊成與反對認罪協商的論點對被告來說，認罪協商的明顯利益是如果被告在最高條件下被起訴，就不會被那麼嚴厲對待。而且，不出席審判也減少案件曝光度，因為被告基於個人利益與社會壓力，可能會希望避免冗長的正式審判與曝光。最

後，有些刑罰專家(專門研究刑罰與改過自新的專業人士)主張，罪犯改過的第一步便是認罪和認清自己的問題。

認罪協商也為國家與社會整體帶來不同的利益。最明顯的是定罪的必然性，因為不論證據如何有力，只要案件仍在進行，就有無罪開釋的可能。而且，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和法官可省下準備審理案件和出庭的大量時間與精力，畢竟這些案件已沒有無罪的主張，再不就是不適合審判程序。最後，當警察不需出庭在刑法審判中作證，就可以花更多時間防止和解決犯罪。

認罪協商確實有其負面之處。反對認罪協商最常見的理由，是被告的刑罰可能不是以刑罰學為基礎。認罪協商因為龐大的案件量而成為常規，導致刑罰常與案情、懲治罪犯的需要，或社會對於大力起訴案件的正當關注毫無關聯。第二個缺陷是，假如認罪協商成為特定制度的基準，那麼就連無辜的人都可能必須承受認罪的不當壓力。研究顯示在某些司法管轄區中，定罪機率愈小，協商就愈困難，原因可能是檢察官希望能得到被告至少某種型式的最低限度自白。

認罪協商的第三個不利之處，在於濫用所謂過度指控(**overcharging**)的可能——檢察官在過程中提出比證據所證明的更為嚴厲的指控，以期之後與辯方律師協商時能強化立場。

認罪協商制度的另一個缺陷是能見度非常低。檢察官與辯方律師的協商並非在有立場中立的法官主持並開放給所有人觀看的公開法庭進行，而很可能是在法院地下室的自助餐廳一邊喝咖啡、一邊決定的，全憑檢察官和被告律師的道德良心。

最後，認罪協商制度有可能規避證據的關鍵程序與憲法規則。由於檢察官不需在法庭提出任何證據或證人，因此就算是可能無法通過適當程序條款的案件，只要檢察官虛張聲勢嚇唬對方就可能定罪。被告可能處於劣勢，因為某些州的公開原則(**rules of discovery**，允許被告詳知檢察官將提出之證據的法律)規定辯護律師只能在認罪協商後著手準備案件。因此認罪協商可能會剝奪被告的基本憲法權利。

對抗式的過程

對抗式模式的基礎假設是每件案子或爭議都有兩面：在刑事案件中，政府認為被告有罪而被告聲稱無罪；在民事案件中，原告宣稱控告之對象造成了某種傷害，而被告拒絕承擔責任。在法庭上，各當事人提供自己所認知的事實。支持此模式的理論(或希望)是，如果給予各方當事人完整的機會在立場中立且專注聆聽的法官(與陪審團)面前提出全部的證據、事實，以及主張，實情就會顯露出來。

雙方的代表律師是這場法庭戲劇中的要角。法官的角色更像是被動、公正的仲裁者，其主要任務是確保雙方不超出可接受的法律程序規則和法庭禮儀。唯有在雙方有充分機會陳述案情之後，法官才能根據證據規則決定哪一方獲勝。

刑事審判中的程序

假設沒有達成任何認罪協商且被告堅持無罪，便會舉行正式的審判。這是憲法第六修正案對於被指控犯了聯邦法的所有美國人所保障的權利，也是各州法律 — 以及憲法第十四修正案 — 對於被指控之犯了州法的所有人所保障之權利。被告在受審時擁有許多憲法與成文法保障之權利。以下是約束聯邦與州法院的各項主要權利。

審判過程中被保障的各項基本權利

憲法第六修正案寫著：「在所有刑事起訴中的被告皆享有迅速暨公開審判之權利。」制憲者特別強調「迅速」一詞，是為了避免被告在審判前在獄中受苦太久，並讓拖延過久的官司出現判決結果。然而迅速是多快？雖然最高法院給了這名詞各種定義，國會通過 1974 年速審法時又賦予它新的定義。法案頒布時間限制，刑事案件必須於在百日內審理，否則便取消。大部分的州在成文法典中都有類似規定，不過確切的時限因地區而有不同。制憲者提出「公開審判」一詞以表達對秘密程序的概念的不贊同。要是進行了秘密程序，那麼被告就可能會在外界不知情的狀況下受審，然後被打發到不為人知的拘留營。

憲法第六修正案也保障了美國人接受公正審判的權利。這至少表示即將擔任陪審員的人們在審判開始之前不能帶有任何成見。例如，檢察官或該案受害者的親友不能擔任陪審員；認為與被告相同種族或血統者「皆可能犯罪」的人也不能擔任

陪審員。「公正陪審員」概念的實踐方式，是從選民登記名冊— 越來越多的司法轄區會另以車輛登記、駕照、電話簿，以及福利名單等作為補充 — 隨機挑選陪審員。雖然這個制度無法做到完美的跨區挑選 — 因為不是所有人皆為註冊之選民 — 但最高法院已表明這個方法已經可以接受了。最高法院也規定，任何種族性別(例如非洲裔美國人與女性)皆不得被排除在陪審員的可能人選之外。

除享有在犯罪發生地點所屬法庭受審和知悉被控罪名的保障權利，被告也有權與不利於他的證人對質。被告有權知道指控他們的人是誰和對方指控了什麼，以便做出適當的辯護。被告「請律師協助」進行辯護的機會也在保障之列。在 1960 年代之前，只有罪行嚴重(在州層級)和請得起律師的人享有這項權利。然而，繼最高法院一連串的判決之後，美國法律開始保障其罪行可能導致入監服刑之被告得到律師辯護的權利，而政府必須替貧窮的被告支付聘請辯護律師的費用。這項原則通用於國家與州層級。

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聲明，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罪行而遭受兩次生命或身體的危害」。此即重複追訴(double jeopardy)條款，意指任何人不得因同樣的罪行被州政府或聯邦政府審判兩次，不過，假如某人的行為違反了聯邦法與州法，不代表就不會因為相同的行為受審兩次。舉例來說，如果有人在紐澤西州搶劫聯邦註冊銀行，就等於違反了聯邦法與州法，則這名搶劫犯可能在紐澤西州法院受法律審判並無罪釋放後，又進了聯邦法院為相同的行為接受審判。

被告在州與聯邦審級中受到保障的另一項權利是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這項權利闡述的含意是，若某人決定不出庭作證，法官與陪審團不得因此做出不利於此人的處置。這項保障強化了美國司法體系的原則，也就是州必須負舉證之責；除非政府用其它方式證明「罪證確鑿、無合理疑點」，否則都假定被告無罪。

最後，最高法院已解釋過正當法律程序的保障，也就是非法搜索或取得之證據不得在法庭使用來對付被告。所謂證據排除原則是來自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最高法院也已訂出對各州的限制。法院的目的是要排除任何警方可能非法獲得對被告不利證據之機會。

挑選陪審員

如果被告選擇不由法官審判 — 意即，不由單單一名法官審理和判刑 — 則由陪審團決定他的命運。在聯邦審級，必須由 **12** 名陪審員做出全體一致的裁決，但在州審級，這項標準只適用於最嚴重的罪行。在許多州，一個陪審團的人數可能不到 **12** 人，其判決亦非經全體一致同意。

一群可能成為陪審團的人經傳喚出庭。在陪審團資格審查(**voir dire**，意指「說真話」)過程中，這群人於公開法庭接受有關其擔任陪審員之資格的詢問。檢察官與辯護律師對這些可能成為陪審員的人詢問一般與特定問題。他們是州的公民嗎？理解英文這個語言嗎？他們或其家庭的任一成員是否曾因刑事犯罪而受審？是否曾讀過即將審理的案件或已經形成任何看法？

在資格審查的過程中，州與辯方有兩個目標。一是排除有對案件裁決不公之明顯動機的小組成員。常見例子可能是依法被排除在陪審團名單之外的人，審判參與者的親友，或公開承認對即將審判之案件持有激烈偏見的人士。對這類陪審員的反對被稱為有理由的排除(**challenges for cause**)，這類排除的人數沒有限制，由法官裁定這樣的排除是否有效。

在訊問可能成為陪審員的人選時，對立雙方的律師的第二個目標是排除他們認為可能對己方不利之人，即使這些人的潛在偏見並不明顯。各方都獲准提出一些先制性的反對 — 不說明原因就要求法院將某位陪審員排除在外。大部分的州習慣上都會給被告比檢察官更多的先制性反對。在聯邦審級，通常允許雙方從每個陪審團排除一到三人，端視罪行本質而定；死刑案可多達 **20** 人。先制性反對的使用比較憑感覺，科學的成分較少，通常以律師的直覺為主。

過去，律師憑著先制性反對幾乎無須任何理由就可以排除陪審員。然而近幾年，最高法院已對憲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護條款做了解釋來限制這項權力，禁止檢察官使用排除方式不讓非裔美國人或女性擔任刑事陪審員。

詢問與排除陪審員的過程會持續到有理由的排除進行完畢為止，先制性反對的額度不是用完就是放棄，**12** 人陪審團(有些州是六人)於焉成立。有些州也會選出替

補陪審員。這些人會出席審判，但只在某位原始陪審員無法繼續參加程序時才參與商議。一旦選定陪審員，即由法官或法庭書記宣示就職。

開審陳述

正式審判開始之後，檢方與被告進行開審陳述(雖然沒有任何一州強迫被告這麼做)。冗長而詳細的陳述較有可能在有陪審團審理，而非法官審理，的情況下進行。開審陳述的目的在於為不熟悉法律與刑事調查程序的陪審團成員概述雙方訴訟的主要目的、呈堂供證有哪些、會傳喚什麼證人，以及雙方想要證明什麼。如果開審陳述得不錯，陪審員就可以很快理解證據與證詞的重要性。一般程序是讓州先進行開審陳述，接著讓辯方在陳述中加以反駁。

檢方的論據

在開審陳述後，檢察官將由州搜集而來之不利於被告的證據呈現在法庭上。證據一般分為兩類——物質證據和證人證詞。物質證據包括了例如子彈、彈道測試、指紋、筆跡樣本、血液與尿液檢驗，以及其它文件，或可作為物證之物品。辯方可以反對其中任何一項物證並且，如果成功的話，將該項證據因素排除，不加以考慮。如果辯方反對不成，則物證會由法庭人員貼上卷標並成為官方紀錄的一部分。

刑事審判大部分的證據是以證人證詞的形式存在，其形式采問答程序，目的在於以井然有序的方式引導出特定信息，其目標則為呈現只與當前案件有關的證據，不提供有誤導性或不相干的信息或非法證據以免造成無效審判(例如，顯示被告先前曾因相同罪行被定罪的證據)。

辯方律師對每位證人都有交叉盤詰之權利。辯方的目的是質疑檢方證人的證詞——也就是讓它不足採信。辯方律師可能試圖讓證人感到困惑、慌亂，或憤怒，使之無法自制並開始說出令人疑惑與矛盾的證詞。如果辯方之後請證人作證，而其證詞和州所提出之事件版本有矛盾之處，則檢方證人的證詞也可能會遭到質疑。完成交叉盤詰之後，檢察官可進行覆主詰問(**redirect examination**)，以釐清或修

正交叉盤詰過程中的某個評判要點。在提出所有證人與證據之後，州的論據闡述便告結束。

辯方的論據

辯方提出論據的風格和形式與檢方類似。實質證據較少出現在辯方的論述中，大部分的證據都是準備好要反駁或反對檢方主張的證人證詞。辯方律師詢問證人的形式與檢方相同。每位辯方證人可能輪流由地方檢察官進行交叉盤詰，然後依序進行覆主詰問。

檢方與辯方論據的不同處在於法律規定的義務。法律不要求辯方提出任何新的或額外的證據或證人。辯方可以只質疑州的證據與證人之可信度或合法性。辯方沒有證明被告無罪的義務，只需證明州的論據並非「罪證確鑿、無合理疑點」。被告甚至不需出庭作證。(然而，如果被告決定作證，將會面臨與其它證人一樣交叉盤詰風險。)

被告的論據闡述結束時，檢方有權提出反駁的證據。接著，辯方可以提出二次答辯，稱為辯駁(surrebuttal)。之後，雙方各提出結辯。通常，這是審判中最戲劇化的部份之一，因為雙方會試圖總結論點、濃縮最強有力的論證，並且向陪審團作出最後一次呼籲。新證據不會在這個階段出現。雙方的論證往往充滿情感並訴諸超越整個案件的價值觀。檢察官可能會概論犯罪問題、對法律與秩序的需求，以及莫讓對被告的憐憫妨礙了對犯罪受害者的同理心。另一方面，辯方律師可能會提醒陪審員「我們每個人這輩子都犯過錯」，或主張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中，他們的任何懷疑都應以對被告有利的方式加以解決。檢方可能比辯方更避免訴諸情感，因為在地方檢察官在結辯中加入偏頗陳詞之後，許多陪審團的判決都在上訴時遭到了推翻。

法官在審判中的角色

雖法官在審判中的角色雖然重要，卻相當被動。法官不提出任何證據，也不主動詰問證人。檢察官與辯方律師會要求法官裁定他們提出的許多請求，這些請求都是關於可以提出的證據種類和可以詢問證人的問題類型。部分地區允許法官向證

人詢問實質問題，並向陪審團評論證據的可信度；其它各州則禁止法官從事這些行為。即使如此，美國的司法傳統兼容了多種司法形式，為個別法官的性格、訓練，以及智慧保留了空間。

首先也最重要的是法官應該秉持公正，以確保雙方在法律限制內盡可能提出完整論據為其首要任務。如果法官的表現和行事背離了公正、中立的角色，那麼就是和美國法律體系的基本教條背道而馳，置自身判決於被上訴法院推翻的風險之下。

雖然法官大多扮演這樣的角色，其背景與價值觀仍會在雙方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當他們被要求裁定正反論據同樣有力、或從法律觀點來看解釋空間寬廣的一項聲請時——影響其裁決。

陪審團在審判中的角色

陪審團在審判中的角色是被動的，其職責為注意聆聽對立雙方律師分別提出的論據，並只依呈堂供證進行裁決。他們通常不能詢問證人或法官，也不能在過程中作筆記，不是因為憲法或成文法明文禁止，而是因為這是美國法院的傳統慣例。

然而近幾年，許多法官已准許讓陪審員進一步參與司法領域。芝加哥美國地方法院首席法官約翰·葛瑞迪(John F. Grady)十多年來都允許法庭中的陪審員作筆記。至少有四個聯邦上訴法院允許陪審團詢問證人，只要陪審員不在審判中脫口詢問，而律師在陪審員詢問證人之前有機會反對特定問題。在某些州，少數初審法官准許陪審員在審判中扮演相當積極的角色。不過，陪審團在州與聯邦審級中的角色基本上仍屬被動。

給陪審團的指示

雖然陪審團的職責是衡量與評估案件事實，但是法官必須就法律的意義以及如何應用法律方面給予陪審員指示。由於許多在上訴時被推翻的案件皆肇因於陪審團收到的指示不完整，因此法官往往會特別留意措辭在技術與法律上的正確性。

所有給予陪審團的指示必定有一些基本要素。其一是向陪審員解釋被告所犯之罪的定義，可能包括提供陪審員定罪的各種選擇。例如，某人殺了另一人，州可能會以一級謀殺加以起訴。然而，如果陪審團認定被告是兇手但並非蓄意謀殺，則法官必須讓陪審團瞭解二級謀殺或過失殺人的法律定義。

法官必須提醒陪審團，舉證責任在於州且被告被假定無罪。假如在檢視過所有證據之後，陪審團對於被告之罪有合理懷疑，就必須提出無罪判決。

最後，法官通常會讓陪審員熟悉各種程序性事務：若有問題如何與法官聯繫、指控超過一項時必須的考慮順序，以及誰必須簽署陪審團的判決文件。向陪審團宣讀指示(且已給予雙方律師提出反對的機會)之後，陪審員即退回評議室去決定被告的命運。

陪審團的判決

陪審團在完全秘密之下進行商議，沒有外人觀察或參與討論。在商議期間，陪審員可能要求法官釐清一些法律問題，他們可以查看一些證物或挑選出的部分案件文字紀錄，但參考的數據可能僅此而已—沒有法律辭典、沒有法律著作，也沒有專家意見。當成員投票做出決定時，陪審團就回到法庭上宣佈判決。如果陪審團到了傍晚還無法作出決定，那麼就請團員們回家，並明確指示他們既不能與他人討論案情也不能閱讀報上與案件有關的文章。在重大或惡名昭彰案件中，法官可能會將陪審團隔離，也就是讓陪審員在當地旅館過夜，遠離外界的眼光。

假如陪審團陷入僵局而無法作出判決，可向法官報告。在這種情形下，法官可能堅持讓陪審團繼續努力達

成判定，或者，如果法官認為陪審團實際上已陷入無可解決的僵局，則可解散陪審團並召開新的審判。

研究指出，多數處理刑事案件的陪審團很快就作出判決。為了想知道意見分歧或一致的狀況，幾乎所有的陪審團在返回商議室後不久便投票表決。三成的案件只需表決一次即達成共識，其餘案件中有九成是第一次投票時多數票勝出。唯有第

一次投票出現高比例的少數票時，才會出現懸而未決— 未能作出裁定 — 的陪審團。

學者已發現，陪審員通常會作出與法官相同的判決 — 假設法官是單獨為判決負責的話。一項大型的陪審團研究要求法官陳述他們會如何裁定由他們所主持的陪審團案件，結果發現法官與陪審團在 **81%**的刑事案件中(和民事案件大致相同)意見一致，在 **19%**的刑事案件中意見分歧，因為法官明顯傾向將陪審團宣告無罪的案件判定為有罪。

陪審團達成判決後會回到法庭，通常由陪審團長公開宣佈判決。此時，檢察官或辯方律師通常會要求陪審團明確表態 — 也就是個別詢問陪審員全體判決是否反映他們內心的真正意見，目的在於判斷是否每位陪審員都支持整體判決，抑或只是屈服於群體壓力。如果結果發現陪審團並非意見一致，他們就必須回到陪審團室繼續商議；某些司法管轄區可能會宣佈判決無效。如宣佈判決無效，則案件可能由其它陪審團再次審理。由於原本的陪審團並未作出一致判決，因此沒有重複追訴的問題。如果陪審團作出無罪判決，則當庭釋放被告，被告可逕自離開法庭。

刑事審判後的程序

審判終結時，如被告被判有罪，通常還需經過兩個階段：判刑與上訴。

判刑

判刑是法院對被告的正式公告，刑罰也於此時提出。

在聯邦審級與大部分的州，只由法官進行判刑。但數個州，被告可選擇由法官或陪審團判刑。在死刑案件

中，州通常規定除非 **12** 名陪審員達成一致決定，否則不可處死刑。在一些州，陪審團判某人有罪之後會再次商

議刑期。有數個州會特別在陪審團中加入新成員以討論判刑。此時，證據規則也較為寬鬆，陪審團獲准聆聽在

實際審判時被排除的證據(例如，被告以前的刑事紀錄)。

法官宣佈判刑後，在被告被判有罪和判處刑罰之間，通常歷經數周。這段期間讓法官聽取或考慮辯方律師可能提出的任何審後聲請(例如要求新的審判)並且讓觀護人進行判決前調查。觀護人是擁有犯罪學、心理學，或社工背景的專業人士，負責向法官建議判處之刑期的長短。觀護人通常會調查例如罪犯的背景、所犯罪行的嚴重程度，以及罪犯繼續參與非法行為之可能性等要素。法官不需遵照觀護人的建議，但這項建議仍是影響法官刑罰考慮的主要因素。在決定刑事刑罰時，法官有各種選項和長度不一的刑期供他選擇。其中的許多選項皆與改過自新的概念有關，因此需要犯罪學與社會科學領域專家的協助。

法官所能判的最輕懲處是緩刑。如果罪行不嚴重或法官認為罪犯不太可能再涉入更多犯罪活動，就會予以緩刑。一旦處以緩刑，只要罪犯維持緩刑的條件就不必坐牢。緩刑條件可能包括遠離被判刑的罪犯、不犯其它罪或犯罪頻率減少，以及從事某些社區服務工作等。一旦罪犯服完緩刑且無任何事件發生，其犯罪紀錄通常會被清除，在法律上視同未曾犯罪。

如果法官不打算判緩刑，並認為入獄服刑是恰當的，則必須在法律規定範圍內判處入獄服刑。刑期有長短範圍而非自動指定的原因是，法律認為並非所有的罪行與罪犯都一樣，而懲罰原則上應與罪行相符。

為了消弭判刑上的嚴重差別，聯邦政府與許多州已試圖建立一套精確方針以提高法官之間的一致性。在國家層級，這份努力在 **1987** 年制訂的量刑改革法中顯露無遺，此法案為判刑過程建立了一套方針。

國會規定法官只能在發現委員未充分考慮到的惡化或緩和情況下違反量刑方針。雖然國會提供的方針沒有明確指出可違反量刑方針的因素類別，但國會確實聲明這些因素不可包括種族、性別、國籍、信仰、宗教、社會經濟地位、藥物依賴，或是酗酒。

各州也設有許多避免法官量刑差異過大的方案。截至 **1995** 年，已有 **22** 州設置了委員會為法官制定判刑方針。截至 **1997** 年底，這樣的方針已在 **17** 個州生效。同樣的，現在幾乎所有的州都實施了強制的判刑法律，針對特定罪行判決之量刑

做出必然、明確的規定— 特別是暴力犯罪、使用槍枝的犯罪，或慣犯所犯之罪行。

儘管法官對判刑有莫大的影響，卻不一定擁有最後的決定權。無論法官何時提出刑期，仍受聯邦政府與州的假釋法之影響。因此，假釋委員會(有時是批准特赦與減刑的總統與州長)對於囚犯服刑時間長短，才有最後決定權。

上訴

在州與聯邦層級，每個人都有權對重罪之判決至少上訴一次，但實際上幾乎沒有罪犯利用這項特權。上訴的基礎在於審判過程中發生了法律錯誤，這項錯誤必須是可逆轉且非無害的。如果錯誤的發生對於審判結果毫無影響，則被視為無害。然而，可逆轉的錯誤卻非常嚴重，可能已經影響了法官或陪審團的判決。例如，成功的上訴可能是以主張在審判中不當接受證據、法官給予陪審團的指示有缺陷，或認罪並非在自願情況下進行等為依據的。然而，上訴必須以程序問題與法律解釋為理由，而非對被告有罪或無罪之事實確認。而且，在大多數的情況下，在美國無法針對刑期長短提出上訴(只要刑期是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

刑事被告的確有部分成功上訴機率(約兩成)，但這不代表被告從此自由。上訴法院的一般作法是將案件發回下級法院重審。此時，檢方必須決定是否能在第二次審判中解決原審中的程序錯誤，以及是否值得花費時間與精力這麼做。第二次審判並非重複追訴，因為被告已經選擇對原始判決提出上訴。

關切法律議題的媒體與民眾通常會留意將明顯有罪之犯人予以釋放的上訴法院和以技術問題被逆轉的判決。這樣的事情當然會發生，有人可能會認為這是民主社會中不可避免之現象，因為司法體系的基礎在於公平競爭與被告的無罪推定。然而，所有被告中約有九成認罪，而這種有罪答辯就等於排除了上訴的可能性。至於其它人，有三分之二於審判中被判有罪，而其中又只有一小部份上訴。在提出上訴的人當中，大約只有兩成有成功的可能性。而在判決獲得逆轉的人當中，許多人在之後的審判中被判有罪。因此，原先被判有罪、後來因為可逆轉的法庭錯誤而得到釋放的人數，只佔小小的百分之一。

第六章

民事法院程序



奧勒岡州茂特蒙馬市巡迴法官羅斯福羅賓森(Roosevelt Robinson)在一起涉及侵權法的民事案件中要求陪審團各自回答其裁決結果。此案控告某公司的產品有瑕疵。(AP/WWP)



破產與債權人的權利是合約法的重要領域。上圖為美國航空公司所屬的一架噴射機。該公司差一點在 2003 年聲請破產。(© Scott Olson/Getty Images)



產品責任是侵權法中成長最快速的次領域，愈來愈多廠商即使已經盡到注意之責，卻仍須負起法律責任。上圖，產品責任律師羅夫．帕提諾(Ralph G. Patino)展示一個輪胎。他的客戶表示輪胎胎面與胎體剝離導致了嚴重事故——這是使得費爾斯通輪胎公司(Firestone Company)於 2000 年回收數百萬枚輪胎的諸多索賠訴訟之一。(© RobertKing/Newsmakers/Getty Images)



兩名小孩正在等待曼哈頓家庭法院裁定監護權結果。無過失離婚制度使得監護權糾紛變得更普遍，因此法院必須判決由哪一方家長取得監護權的情況也越來越多。(© Carrie Boretz/The Image Works)



媒體的大量報導經常促使辯方律師要求更換審判地點，以避免對其客戶的案件，例如酒駕所造成的車禍，造成不利。(AP/WWP)



憲法第七修正案與州法保障民事訴訟中的陪審團審判權。因此，許多公民，

例如這些來自密執安州馬科姆郡的婦女，被召集擔任陪審員。 (AP/WWP)

民事訴訟有別於刑事訴訟程序。本章重點在於民事法院：民法與刑法有何不同、民法最重要的種類、審判的替代方式，以及對民事審判程序的逐步檢視。

民法的本質與要義

美國司法體系奉行刑法與民法之間諸多重要差異。刑事法與侵犯整體社會的行為有關，而民事法主要涉及公民之間的義務。民事案件中，糾紛通常發生於私人之間，不過政府有時也可能成為民事訴訟的一方。刑事案件則是由政府對個人涉嫌侵犯社會的罪行所提出的起訴。

在民事案件中，法院試圖以判決法律權利的方式解決訴訟當事人之間的糾紛。接著法院會決定適當的救濟方式，例如判給受傷的一方賠償金或發佈一項命令指示一方當事人履行或禁止從事某項行為。在刑事案件中，法院決定被告是無辜或有罪。有罪的被告被處以罰鍰、入獄服刑，或兩者。

在某些案例中，同一行為可能導致刑事程序與民事訴訟。假設兩名政治科學家「喬」與「彼特」前往亞特蘭大參加會議。他們從機場搭乘同一部出租車到市中心的飯店，一路上兩人激烈地討論著政治，而於出租車抵達飯店門口時發生肢體衝突。如果彼特下車時用公文包打喬的肋骨，彼特可能會被控刑事暴行罪。此外，喬也可能對彼特提起民事訴訟以獲得賠償金來支付醫藥費。

無論是在聯邦或州法院，民事案件一般都較不為媒體所關注，但其件數卻遠高於刑事案件。民事訴訟往往挑起重要的政策問題，社會上許多爭論皆屬民事範圍。司法學者赫伯特·雅各布(Herbert Jacob)在《美國司法》(Justice in America)中概述民法領域的範圍：「每一樁破裂的協議、每一樁令顧客不滿意的買賣、每一件未收回的債務、每一樁與政府機關之間的糾紛、每一件毀謗與中傷、每一起意外傷害、每一次婚姻破裂，以及每一起死亡都可能引起民事訴訟。」

因此，任何發生於兩人或多人之間的糾紛幾乎都可能成為民事訴訟的導火線。民事訴訟的案件量龐大，但大多可歸入五個基本類型。

民法的主要類型

民法分為五大類：合約法、侵權法、財產法、繼承法，以及家庭法。

合約法

合約法主要是關於兩人或多人之間的自願協議。一些常見例子包括同意執行某項工作、買賣物品，以及建造或修補房屋或商業建築。構成這些協議的基礎是一方承諾某事而另一方也做了相應的承諾，通常是一方承諾為另一方的服務或貨物支付金錢。例如，「柏恩司先生」與「柯德小姐」簽訂一項合約，柯德答應如果柏恩司幫他砍一捆橡木柴並於 12 月 10 日運到她家，便支付 125 美元。如果柏恩司當天無法將木柴運到便是違約，柯德可以上法院告他要求賠償。

許多合約相當單純、直接了當，但有些複雜的領域也建立在合約法或合約概念上，商業法即為一例。商業法主要涉及信用或分期付款計劃的銷售行為，其處理範圍還包括支票、本票，或其它可轉讓的金融工具。

另一個密切相關的領域是破產與債權人權利。破產的個人或公司可能會經歷一個將過去一筆勾消、聲請破產者從頭來過的過程，破產過程也旨在確保對債權人的公平性。破產法多年來一直是立法者的關切焦點，有許多專門的破產法法官現在隸屬於美國地方法院。

最後一個領域是保險合約，由於適用於許多人，因此非常重要。保險業受政府機構之管理和該業界特有之規定的約束。

侵權法

侵權法一般被認為是民事違法行為法，主要與造成傷害且未符合社會標準的行為有關。

侵權法以個人傷害或人身傷害賠償為中心，傳統上這類賠償以汽車意外佔大多數。成長最快速的一個侵權法次領域是產品責任。就作為迫使公司對於瑕疵食品、玩具、設備、汽車、藥物，或其它眾多產品所造成的傷害負起責任的手段而言，這個次領域的效果日益顯著。

也許產品責任案件成長快速的原因之一，是證據標準的一項改變。傳統上，在某人能夠領取因為另一人的傷害而得到的賠償金之前必須證明過失行為的發生(通常指的是在法律訴訟中揭露的特定情況下疏忽或未行使普通注意)。然而有些人主張，多年來對過失行為概念的依賴已經降低，在產品責任案件中尤其如此。法庭上通常使用嚴格的責任標準，也就是說，即使沒有過失行為，或就算廠商也很注意，受害者仍可取得損害賠償。

一般認為，產品責任案件成長快速的另一個原因，是陪審團在判決有利於原告時的裁定額。陪審團的損害裁定額可分為兩種：補償性與懲罰性。補償性賠償金的目的是支應原告的實際損失，例如修理費、醫藥費等，而懲罰性(或懲戒性)賠償金的用意則是懲罰被告，或警告被告日後不得再有這樣的行為。

高額的陪審團裁判額和日益增加的所謂瑣碎案件引發了關注，因此，政府官員、企業主管，利益團體，以及法律界的成員紛紛呼籲立法機關進行侵權法改革。在1990年代的十年間，許多州都頒布了各種侵權法改革措施。鼓吹侵權法改革的美國侵權法改革協會(American Tort Reform Association)提出報告，指出各州已限制了非經濟損害的裁定額、修正了主管懲罰性賠償的法令，或頒布了懲罰提出瑣碎案件之原告的成文法。

另一個成長快速的侵權法次領域是醫療疏失(medical malpractice)。醫療疏失索賠案件隨著醫學的長足進步而增加。當代醫學有兩個持續存在的問題：隨著新治療方式而來的高風險，和醫師與醫院的不涉及私人(impersonal)特質。今日的病人對醫師懷有高度期待，當期待轉為失望，病人會感到憤怒從而提出醫療疏失訴訟。

法院在處理醫療疏失訴訟時一般會使用傳統的過失標準而非嚴格的責任原則。這代表法律對醫師並無擔保治療成功的要求，而是要醫師在病患確實證明醫師未依

可接受之醫療方式進行醫治的情況下負起責任。各州對於何謂可接受之方式的概念不同，因此這類問題必須由法院採逐案基礎解決。但是，一般的推定是專業人員(包括醫師)之行為在本質上要合理，意思是受到損害的病患若想在法庭上戰勝醫師，就需要至少一位或更多專家證人的證詞來證明醫師的行為不合理。

財產法

傳統上，不動產與個人財產兩者有所區別。前者通常指房地產 — 土地、房屋，與建築物 — 還包括生長中的農作物，其它項目幾乎都被視為個人財產，包括金錢、珠寶、汽車、傢俱，以及銀行存款等。

根據勞倫斯·傅利曼(Lawrence M. Friedman)在《美國法律》(American Law)所言，「就法律而言，財產一詞主要指不動產；個人財產重要性居次。」法律上沒有任何一個特殊領域專管個人財產。個人財產一般被視為合約法、商業法與破產法之下的一部份。

財產權在美國一直以來都相當重要，但如今，財產權的複雜性已經超過對某物的所有權。現在，財產的概念主要是指使用該所有物的權利。

今日財產法的一項重要分支是土地使用的控制。最常見的土地使用限制是分區管制，也就是地方法令規定將一個自治區劃分為不同用途的數個地區。例如，將一個地區設為住宅區，一區為商業區，而另一區為工業區。

早期的分區法受到質疑，原因是土地使用的限制等於政府違憲強徵收土地。憲法規定「除非給予合理賠償，否則政府也無權徵收私人財產作公共用途。」在某種意義上，分區法的確以自認為合適的方法將土地的使用權利從所有者手中拿走，不過法院大體上認定分區法並非違憲強征。現今，分區是存在於全美所有規模之市鎮的一個事實。都市規劃者與市府官員認為就都市地區的規劃和穩定發展而言，分區法確有其必要。

繼承法

繼承法談的是如何將財產從一代傳給下一代。美國司法體系認可個人依照自身意願處理財產之自由。最常見的繼承方法是執行遺囑。如果某人留下一份有效遺囑，法院便會加以執行。但若某人未留下遺囑(或遺囑草擬不當)，那麼此人便是未留遺囑之死者，州必須處理其財產。

州根據州成文法訂定的固定方案處理這類財產。依法，未留遺囑之財產要傳給已故者的繼承人——也就是死者最親近之親屬。有時，未留遺囑之死者沒有任何活著的親屬。在這種情況下，則將財產充公或留給已故者居住的州。州成文法通常禁止遠房親戚，例如相同曾祖父母的同輩(**second cousins**)和叔(伯)祖父母(**great uncles and aunts**)繼承這類財產。

愈來愈多美國人開始準備遺囑，以確保財產能依自身意願而非州所規定的方案處理。遺囑是一份正式文件，必須謹慎草擬，因此大部分的州規定草擬遺囑時至少需有兩個人在場作證。

家庭法

家庭法處理的是諸如結婚、離婚、子女監護權，以及子女權利等事務，該法每年無疑觸及了非常多美國人的生活。

進入婚姻的必要條件都清楚寫在州法上，一般而言包括了雙方的最低適婚年齡、必要的血液測試或身體檢查、雙方的心理狀況、證書與費用規定，以及等待期等。

婚姻的終結一度是很罕見的。在 19 世紀初，有些州只允許透過某些州議會法案離婚；而南加州則不允許離婚。在其它州，只有當一方證明有離婚的理由，才准許離婚。換句話說，只有配偶犯下通姦、遺棄，或虐待罪行的無罪當事人才能獲准離婚。

20 世紀見證了離婚法令的重大改變，從限制性的法律轉向無過失離婚。這種趨勢的興起有兩個因素。第一，對離婚的需求多年來持續增加。第二，以往加諸於離婚者的污名已經消失。

無過失離婚制度是指夫妻只要解釋雙方之間存在無法和解的差異致使婚姻無法繼續即可。無過失離婚制度結束了離婚訴訟的敵對本質。

無過失離婚制度是指夫妻只要解釋雙方之間存在無法和解的差異，使得婚姻無法繼續。無過失離婚制度結束了離婚訴訟的敵對本質。

不易解決的是婚姻結束可能造成的一些其它問題。子女監護權、子女撫養費，以及探視權之爭經常在法院上演。和無過失離婚制度問世之前相比，監護權之爭在現今更可能發生也更常見。小孩的需求是優先考量，而法院也不再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這表示監護權要判給母親。獲得監護權的父親愈來愈多，現在法院也常把共同監護權判給已經離異的父母。

與民法有關的法院與其它機構

爭執在美國人的生活中是很常見的。這些爭執通常可以在司法制度外解決，然而有時爭執過於激烈，以致一方不得不尋求訴訟途徑。

決定是否上法院

每年未經審理而解決的潛在案件有數千樁，因為可能的訴訟者以其它方式解決了問題或原告決定不提出控告。面臨向法院提告、試圖解決差異，或乾脆把問題忘掉的抉擇時，許多人會訴諸簡單的成本效益分析。意即，他們會在與審判相關之成本和如果打贏官司可能得到的好處之間作一番權衡。

替代性的糾紛解決方案

實際上，用到完整的司法過程的人很少。大部分的案件其實都是在未訴諸完整審判的情況下解決的。民事案件的審判可能既費時又昂貴。在許多地區，由於積壓的案件過多，一個案子通常要等三到五年才得以審理。此外，民事審判可能是極度複雜的。

通常，審判費用就足以使潛在原告打消念頭。即使原告贏了官司，在所有人對審判完全沒有異議之前 — 要是真的有人人都對審判毫無異議的一天的話 — 輪掉

官司的可能性也永遠存在。換言之，審判可能只會為當事人帶來新問題。基於上述理由，愈來愈多人已經開始討論解決糾紛的替代方法。

從大型公司到律師或個人都有愈來愈多人支持替代性解決爭議方案(**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又稱 **ADR**)。美國的企業界不希望冗長又昂貴的法庭訴訟是解決複雜商業糾紛的唯一方法。此外，當有必須快速解決案件或以保密方式處理某些事務的需求時，律師會較常考慮例如仲裁與調解之類的替代方案。個別公民也越來越常求助於地方調解服務來協助他們解決家庭糾紛、鄰居爭執，以及消費者申訴。

替代性解決爭議方案有各種實施形式。蘇珊·凱塔(**Susan L. Keita**)在《法院行政與管理手冊》(**Handbook of Court Administration and Management**)中寫道，實施的形式通常可分為「私人、法院涉及，以及法院附設，但後兩種往往被稱為法院相關。」換言之，有些私人 **ADR** 程序的運作完全獨立於法院之外。法院涉及的 **ADR** 程序在法院外運作但仍與法院有一些關係。法院在法院附設方案中實施 **ADR** 程序。凱塔指出，「**ADR** 可能是志願或強制的；可能是限制性的或允許判決之上訴的；可能是雙方同意的、經由審判的，或是兩者以某種方式混合而成的」，端視問題的型態和議題而定。一般常見的 **ADR** 有調解、仲裁、中立的事實發現、精簡型審判、即決陪審團審判，以及聘請退休法官。

調解(Meditation) 調解是一個私人且保密的過程，由一位公正人士協助糾紛當事人找出並澄清相關問題從而讓雙方達成協議。調解人不扮演法官的角色。對於最後的和解有控制權的是當事人本人。

調解特別適合有持續的關係爭執者，例如家庭成員、鄰居、受僱人與僱主，以及房東與房客。調解也適用於離婚案件，因為它將衝突的過程變成合作的過程。子女監護權與探視權也常以此方式解決。其它許多領域，例如個人損害與涉及保險公司的財產索賠，也經由調解解決。

仲裁(Arbitration) 仲裁的過程和上法院類似。在聽取爭執雙方談話後，一名稱為仲裁者的公正人士決定爭議該如何解決。過程中並無法官或陪審團，而是由

雙方挑選出的仲裁者作最終決定。仲裁者來自各種不同的專業背景，往往自願付出時間協助人們解決問題。

爭執者之所以選擇仲裁，是為了節省時間與金錢，而且不如法院審理般正式。大部分仲裁可於四個月內完成，相較之下，法院裁決過程則需半年到數年。

在不公開的情況下，仲裁也用來解決各種消費者的申訴。這類例子包括不當汽車維修糾紛、退回瑕疵商品的問題，以及服務索價過高等。仲裁也用於法院涉及與法院附設的程序，以解決數種型態的糾紛，包括企業、商業，以及勞資糾紛等。

中立的事實發現(Neutral Fact-Finding)中立的事實發現是指在非正式過程中由一名大家都同意的中立人士調查糾紛。糾紛通常涉及複雜或技術性議題。中立的第三者分析糾紛事實，並將調查結果發表在一份不具約束力的報告或建議書當中。

這個程序特別適合處理公司內傳出的種族或性別歧視，因為這類案件容易引起強烈情緒和內部意見不合。假如雙方當事人都是同一家公司的員工，那麼利益衝突會妨礙主管針對歧視傳言進行公正調查的能力。為避免發生不公，公司可能會求助於中立的第三人以期達成所有員工都能尊重的解決方式。

精簡型審判(Mini-Trial)在精簡型審判中，雙方以類似審判之形式，在由經挑選之雙方代表和中立第三人組成的小組面前表達立場。每個小組都有一名中立的顧問。精簡型審判旨在促成問題的釐清，並為實際可行之解決協商建立基礎。雙方代表向小組發表各自立場與論點之概要。這樣一來，雙方就更瞭解對方的立場。來自雙方的代表在小組面前概述己方立場和主張。這麼一來，每一方都更瞭解對方的立場。在聽完雙方陳述之後，小組(包括顧問在內)開會找出解決之道。中立的顧問可能也會就案件的是非曲直發表諮詢意見。除非雙方事前以書面方式同意遵循，否則這份意見不具約束力。

精簡型審判的主要優點是雙方當事人都有提出解決之道的機會。這也表示雙方都有代表人和瞭解詳情的途徑。

即決陪審團審判(Summary Jury Trial)即決陪審團審判指的是在提出訴訟後、達成裁定前，由法院處理的一個程序。在即決陪審團審判中，雙方分別在陪審團(通常是六人)面前申論，概述各自的論點以及簡短的開庭與結案辯論。律師通常有簡短的時間(一小時以內)陳詞，但只能發表審判可接受之數據。宣誓證人之證詞一概不予採用，其間過程也不加記錄。由於整個過程不具約束力，其程序與證據規則較正常審判更具彈性。

陪審團根據雙方提出的辯論作出不具約束力的判決，這樣的判決旨在讓律師及其客戶對案件有更深一層的瞭解。陪審團可能也會建議解決糾紛的基礎。如果爭議未在即決陪審團審判的過程中或結束當時立即得到解決，則在法院舉行審前會議。

即決陪審團審判的主要優點之一是花費的時間。比起動輒數天或數周的完整審判過程，即決陪審團審判通常花不到一天。

聘請退休法官(Private Judging)這種替代性解決爭議的方式是利用退休法官所提供的收費服務。提倡者宣稱這個方法有數種好處。第一，案件當事人可挑選具有充分資格與經驗之人士處理案件。第二，當事人可以確定案件能在第一次排定時間時就獲得解決，不會因為法院日程表排得太滿而無法繼續。最後，費用可以比完整訴訟更低。不過，有些人批評退休法官收費過高。例如加州的一個上訴法院就曾指出，某些在任的法官為了賺更多錢而離職去擔任私人法官。

專門法院

州法院體系通常下轄多種為處理特定種類的民事案件而設置的專門法院。家事法院通常以處理如離婚、子女監護權，以及撫養子女等事務為宗旨。在許多司法管轄地區，遺囑認證法院則處理遺產和遺囑爭議。

也許最為人熟知的專門法院是小額賠償法院。小額賠償法院擁有處理求償金額未超過一定上限之案件的審判權。金額因司法管轄地區而不同，但上限通常是 500 或 1,000 美元。小額賠償法院讓較不複雜的案件在處理時不用像多數的其它初審法院那麼正式。訴訟費用低廉，通常也不鼓勵聘請律師，因此一般人都負擔得起。

行政組織

多個政府機構都設立了擁有類似司法權威的行政組織來處理某些類型的案件。舉例來說，在聯邦層級，聯邦交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與聯邦通訊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都在各自的權力範圍內進行了各類判決。對於這些機構的判決的上訴，可能會交給聯邦的上訴法院審理。

在州層級，行政組織協助解決民事索賠的一個常見例子是勞工補償管理局。該局判斷員工的傷害是否與工作有關和是否有資格得到勞工補償費用。許多州的汽車監理所都設置聽證委員會決定吊銷駕駛執照與否。另一種常見的州行政委員會則裁定公民權事務與涉及歧視之案件。

民事審判過程

有些糾紛透過替代性解決爭議方案、在專門法院，或由行政組織解決。然而，每年仍有許多案件進了民事法院。

一般而言，刑事審判使用的對抗式過程也使用在民事審判中，只是有一些重要的差異。第一，訴訟者必須適格(**have standing**)。這個概念是指提出訴訟者在爭議結果必須有個人的利害關係，否則當事人之間就沒有真正的爭議，而法院也沒有實際的案件可以裁決。

第二個主要差異在於民事案件使用的證據標準是優勢證據，而非刑事案件中較為嚴格之「罪證確鑿、無合理疑點」的標準。一般來說，優勢證據代表有足夠的證據克服懷疑與猜測。這明顯意謂著民事案件所需的證據少於刑事案件。

第三個主要差異是，刑事審判中許多被告的正當程序保障都不適用於民事訴訟。例如，雙方當事人都無權獲取律師幫助。憲法第七修正案所保障之擁有陪審團審

判權利的是「訴訟的價值必須超過 20 美金」的案件。雖然這項修正案尚未於各州施行，不過大部分的州都有類似的憲法保障。

提出民事訴訟

提出民事訴訟者稱為原告，被控的一方稱為被告或答辯人。民事訴訟以原告與被告的名字定名，例如瓊斯訴米勒(**Jones v. Miller**)案，原告的名字置於前。典型的情況是由辯方律師支付費用向合適法院的書記提出訴訟或聲請。訴訟聲明了訴訟原由、涉及的損失，以及尋求的審判或救濟。

該由哪間法院審理案件則與司法管轄權的概念和審判地點有關：司法管轄權指的是法院執行司法權力的職權，審判地點則代表應該執行該權力的地點。

當法院擁有被告的事物與人身擁有管轄權，就符合了管轄權之規定。這代表好幾個法院都有同一案件的管轄權。例如，假設一位俄亥俄州達頓市的居民在一起發生於田納西州的車禍中嚴重受傷，他被一輛車從後面撞擊，該車駕駛是田納西州金斯波特市的居民，而這位俄亥俄州居民的人車損傷約為 80,000 美元。俄亥俄州審判庭擁有事物管轄權，而且非常可能得到被告的管轄權。此外，田納西州法院可能擁有管轄權，又因為該案涉及各州公民間的訴訟且訴訟金額超過 75,000 美元，所以俄亥俄州與田納西州的聯邦地區法院也都有管轄權。假使管轄權是唯一的考量，則原告可在上述的任一法院提告。

合適的審判地點可能由成文法以避免可能之偏見為理由或純粹為了方便而規定。聯邦法規定合適的審判地點必須是原告或被告的居住地或傷害發生的地點。州成文法對於審判地點的規定稍有不同，但只要涉及土地，則通常規定合適的審判地點為土地所在之郡。在大部分的其它情況下，審判地點都是被告居住的郡。

審判地點的問題可能涉及察覺到或害怕法官或未來的陪審團存有偏見。律師有時會為此反對在某地審理案件並要求更換地點。雖然這類反對在曝光度較高的刑事案件中或許較為普遍，但是也出現在民事審判。

一旦確定適合的法院並提出訴訟後，法院書記將訴訟內容的副本附加於傳票中發給被告。傳票由警長辦公室人員、聯邦法院執行官，或私人訴訟服務機構發出。

傳票規定被告必須在一段時間內(通常 **30 天**)提出回復，也就是答辯。被告不這麼做的話會受到缺席審判。

由被告、法院書記，以及發送傳票者所執行的簡單行動啟動了民事案件的運作。接下來在真正的庭審之前還會出現一連串的活動，而且可能維持數月。約有 **75%** 的案件在這段期間內未經審判便獲得解決。

庭審前的活動

聲請(Motions)被告一旦收到傳票，辯方律師可以提出一些聲請。律師可以傳票未被妥善傳達為由提出要求法院撤銷傳票的聲請。例如，被告可能聲稱傳票未依州法規定當面送達。

有兩種聲請可用來澄清或反對原告的申請。其一是取消法院的聲請，或以部分請願書內容偏頗、不當，或不相關為由加以取消。另一種聲請是更明確請求法院要求原告提供更多訴訟細節。

第四種常在民事案件中提出的聲請是駁回原告之訴。此種聲請可能主張法院沒有管轄權，或可能堅稱原告沒有提出訴訟之完整法律基礎，即使訴訟陳詞為真。

答辯(The Answer)如果訴訟通過了法官對聲請的裁決，被告接著就要提出答辯。答辯可能包括承認、否認、辯護，以及反訴。如果在答辯中承認罪行，則審判時便不需證明事實，若以否認作為答辯，審判時就必須證明事實。被告在答辯中提出的某些事實可能會讓原告無法得到賠償。

被告也可能另外提出一項名為反訴的訴訟。如果被告從同一事件中找到控告原告的理由，就必須向法院提出請求以響應原告之請求。原告可對被告的答辯進行再抗辯。原告可於再抗辯中承認、否認，或針對反訴中的事實陳述提出辯護。

證據揭示(Discovery) 美國法律體制有證據揭示程序的設計；也就是雙方都有資格取得對方擁有的信息。證據揭示的工具包括：

- 取口供證詞(**deposition**)是證人在法庭外於宣誓後所說的證詞。口供證詞使用與法庭相同的問與答形式。所有的案件當事人必須被告知要進行取證，以便其律師到場交叉盤詰證人。
- 書面詢問(**Interrogatory**)是指必須在宣誓下回答的書面問題。書面詢問可以只提交給案件當事人，不提交給證人，目的在於取得對訴訟另一方所擁有之證據的陳述。
- 訴訟其中一方如果希望檢視文件、信件、圖畫、圖表、地圖、照片，或對方擁有的其它對象，可要求調閱訴訟其中一方的相關文件(**production of document**)。
- 若對訴訟之一方當事人的身心狀況存疑，法院可令該當事人呈交一份醫師檢查報告。**審前會議(Pretrial Conference)**在出庭之前，法官可召開審前會議，與雙方律師進行非正式的案情討論。通常此會議只允許法官與律師參加，並於法官室進行。在這個會議中，法官與雙方律師就無異議之事實問題達成一致意見，稱之為協議(**stipulation**)，目的是藉由減少法庭中必須爭議的議題數量，好讓實際的審判更有效率。雙方律師也分享案件的證人名單與文件數據。律師與法官也可利用審前會議來解決案件。有些法官主動促成案件和解，使之不必上法院審理。

民事審判

挑選陪審團聯邦法院民事訴訟的陪審團審判權受到美國憲法第七修正案的保障。州法律同樣保障此項權利。若放棄陪審團審判，則由法官裁定。雖然傳統的陪審團是由 **12** 人組成的，但是現今的人數不一。大多數聯邦地方法院目前在民事訴訟中使用少於 **12** 人的陪審團。大多數的州也允許在部分或所有民事審判中使用人數較少的陪審團。

刑事審判的陪審員必須跨區隨機挑選以達公平。大批陪審員被召集至法院，之後當案件被指派於某一法院審理時，再將一小群陪審員候選人派至特定的法庭。

在陪審團資格審查中，雙方律師可以反對某些陪審員。審查完畢後，聽取某案件的陪審團就座。律師可能提出理由排除某位陪審團候選人，法官必須決定被反對的人是否公正。雙方也可能進行先制性反對—沒有理由就排除某位陪審員。不過，美國最高法院已裁定憲法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平等保護禁止以種族或性別為由取消民事審判中的陪審員資格。先制性反對受限於成文法或法院規定，通常只有二到六人。

開審陳述選出陪審團後，雙方律師即開審陳述，從原告律師開始。原告律師向陪審團解釋案情和原告一方希望證明什麼。通常，辯方律師可選擇在原告律師陳述結束後立即進行開審陳述，或等到原告的論據完整陳述後再進行。如果辯方律師選擇等待，則會從開審陳述開始接連陳述完整論據。開審陳述概述了案情並讓陪審團更容易瞭解提出的證據，用處很大。

原告論據之陳述在一般民事案件中，原告是先提出並證實其論據的一方，也是最後結辯的一方。陳述案件時，原告律師通常會傳喚證人作證並提出文件或其它證據。

證人被傳喚時，由原告律師對其進行直接詢問，接著輪到辯方律師詢問或交叉盤詰證人。亞利桑納州最高法院最近採取了協助陪審員在民事案件中作出更妥善裁決的措施。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該州最高法院投票決定讓陪審員透過法官向證人提出書面問題，其它州也在考慮跟進這項新作法。交叉盤詰後，原告律師可以進行覆主詰問，接下來被告律師可能會進行第二次交叉盤詰。

一般而言，證人只可就實際上看到的事情作證，不可表達自己的意見。然而這項通則有一重要例外，那就是特別被傳喚前來就自己專門領域之事務提出看法的專家證人。

要成為合格的專家證人，就必須擁有特殊領域的豐富知識。而且，該知識通常必須於公開法庭中被建立。兩方通常派出意見相左的專家，若發生這種情形，陪審團必須決定哪一個看法正確。

當原告一方已提出所有證據，其律師的論據便告一段落。

聲請指示裁決(Motion for Directed Verdict)原告一方的論據告一段落後，被告通常會聲請指示裁決。被告提出這項聲請的意思是原告未證實其案件，所以應該輸掉官司。此時法官必須決定如果法院程序停止，原告是否可在此時贏得官司。如果法官裁定原告並未提出有足夠說服力的證據，就會認可這項聲請，並為被告作出裁決。如此一來，原告就輸掉官司了。指示裁決的聲請類似於審前駁回原告之訴。

被告論據的陳述如果指示裁決遭到駁回，被告接下來必須提出證據。被告陳述論據的方式與原告類似，也就是對證人直接詢問和提出文件和其它證據。原告有權交叉盤詰證人，接著可能進行覆主詰問和覆反詰問問題(recrossquestions)。

原告的反駁被告陳述論據後，原告可以提出以反駁被告之證據為目的的反證。

答詢原告的反駁辯方律師可提出證據，對原告反駁的證據提出反擊。這種反駁與答詢的模式可持續進行到提出所有證據為止。

結辯(Closing Arguments)提出所有證據之後，雙方律師向陪審團進行結辯，或辯論總結(summations)。最先和最後發言的都是原告律師。也就是說，由原告律師開始和結束辯論，被告律師則於其間辯論。在過程中的這個階段，律師會攻擊對方證據的可信度，並試圖證明對方證人不足以採信。為達此目的，律師通常向陪審團提出有說服力的訴求或訴諸情感。然而，其論證必須以有證據支持且審判時已提出之事實為基礎。

給陪審團的指示假定並未放棄陪審團審判，那麼陪審團將於結辯結束後得到指示。法官告知陪審團其判決必須以審判時提出的證據為基礎。法官的指示也讓陪審員知悉與這個法律概念有關的規定、原則，以及標準。在民事案件中，對原告有利的判決是以優勢證據為基礎的。這表示陪審員必須衡量審判時提出的證據並在心中判斷較具影響力的證據，就法律依據與價值而言，有利於原告。

判決陪審團進入評議室進行商議。成員們必須在不與外界接觸的情況下作出判決。有時商議時間過長且過於詳盡，必須為陪審員供應食物與住宿，直到達成判決為止。判決代表的是陪審員針對證據進行詳細討論與分析之後所獲得的一致看法。有時即使陪審團認真商議，卻無法達成判決。發生這種情況的時候，法官可能宣佈判決無效。這表示可能必須進行新的審判。

陪審團達成判決後，在引領下回到公開法庭，向法官提交判決。雙方當事人獲告判決結果。接下來通常會要求陪審團明確表態 — 法官會詢問個別陪審員是否同意判決。

審後聲請達成判決後，不滿的一方當事人可以採取各種策略。儘管已做出判決，輸的一方仍可提出判決聲請。如果法官認為有理性的人不會作出陪審團所達成的判決時，便會批准此種聲請。

輸的一方可能請求進行新的審判。這種請求通常以判決違反證據優勢為基礎。如果法官認為證據根本無法支持陪審團所達成的判決，就會批准這項聲請。批准進行新審判的原因很多，包括：超額的賠償金、極為不當的賠償金、發現新證據，以及提出證據時發生錯誤等。

在某些情況下，輸的一方會向法官提出救濟聲請。如果法官在審判中發現文書錯誤、新證據，或斷定判決結果是由於詐欺行為而起，就可能批准這項聲請。

審判與執行若裁決對被告有利則審判結束，但對原告有利的裁決則需要進入另一個階段的訴訟過程。民事案件沒有刑罰，但會判處救濟或賠償金。這項決定就稱為判決。

如果被告被處以賠償金卻不自動支付規定的金額，原告可要求法院書記發佈執行判決之命令。執行判決之命令會發給警長，要求警長扣押被告的財產並將之拍賣以執行判決。另一項替代方案是下令置留權(**lien**)，也就是扣留可能用於支付判決之財產的合法權利。

上訴如果一方當事人認為審判中出現法律錯誤，如果法官拒絕於判決後進行新審判之聲請，那麼不滿的一方可以向較高審級的法院上訴。最常見的上訴因素或許是法官可能認可了應被排除之證據、拒絕承認已提出之證據，或未給予陪審團適當的指示。

律師藉由反對審判時可能的錯誤，為上訴打下基礎。此項反對會成為審判紀錄的一部分，而後有可能得到上訴法院的檢閱。上訴法院的決定可能是要求下級法院執行先前的裁決或舉行新的審判。

第七章 聯邦法官



裡根總統於 1981 年任命珊卓．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右)為大法官，打破了最高法院的性別藩籬。首席大法官華倫．伯格(Warren Burger)(左)宣誓她就任，她的丈夫約翰．歐康納(John O'Connor)。

Connor)(中)手持兩本家用聖經。 (AP/WWP)



約翰遜總統(右)於 1967 年任命首位非裔美國人索古德．馬歇爾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 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兩名美國地方法官在紐約州主持一場歸化典禮。 (© Syracuse Newspapers/The Image Works)



小布什總統向獲得他提名為聯邦法官的人道賀。 (AP/WWP)



紐約南區的美國地區法院資深法官康斯坦絲．莫特利(Constance Baker Motley)(右)在一場小組討論中發言。(AP/WWP)

聯邦體系中最重要的角色是法官與大法官。 什麼樣的特質使這些人不同於其它公民？擔任法官需要什麼 — 正式與非正式的 — 資格？法官是怎麼選出來的，參與甄選過程的人又是誰？法官如何學習成為法官？如何訓練法官，何時撤去他們的職務？

聯邦法官的背景特徵

美國人相信，一個從最卑微環境出身的人(例如亞伯拉罕．林肯)有一天可能成為美國總統或至少美國法官。如同大部分的迷思，這個觀點有其真實性。原則上，幾乎任何人都能成為優秀的公職人員，也有少數出身貧困的人爬上了權力頂端，成了著名的例子。不過，最典型的情況是，美國的聯邦法官，如同其它公職人員和大企業首腦一樣，都來自於美國的中產與中上階級。

地方法官

過去 210 年來，聯邦地方法官的所有背景資料從未被匯整過，但有大量關於近幾十年來任職者的已知資料。

在坐上聯邦法官席之前，大部份的法官都曾擔任州或地方層級的法官，第二大類是曾受雇於政治或政府領域，或在中型至大型法律事務所服務。在小型法律事務所工作或擔任法律教授者占最少數。

從法官的教育背景看得出一些精英本質的端倪。他們全是大學畢業生；約有半數是從昂貴的長春藤聯盟或私立大學取得大學與法律學位。法官作為一個群體和一般人不同之處，在於他們具有強烈的「職業遺傳」傾向——也就是說，法官往往來自於有擔任司法與公共事務傳統的家庭。

雖然美國女性人數佔了 **51%**，一直以來法官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直到卡特總統任內(**1977-81**)才出現 **2%**以下的女性地方法官。即使刻意努力改變這個現象，在卡特總統所任命的地方法官中，女性也只佔 **14.4%**。少數民族在法官席上向來都低於適當比例，就絕對數字而言如此，與總人口數的比例上也如此。直到現在，也只有卡特總統曾任命相當數目的非北歐裔英語系白人擔任聯邦法官——超過 **21%**。柯林頓任內(**1993-2001**)發生了劇烈改變。在他任內的前六年，他所任命的司法人員當中有 **49%**皆為女性或少數民族。

約有十分之九的地方法官與任命他們的總統屬於同一政黨，歷史上約有 **60%**的地方法官有明顯的黨派色彩。

典型的法官在 **49** 歲時獲得任命。不同的總統執政期間，法官年齡差異並不大，也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

上訴法院法官

上訴法官比初審法院法官更可能具有先前的司法經驗，而且他們也很可能，如果不是更可能的話，曾經就讀於私立與長春藤聯盟學校。

以政黨關係而言，初審與上訴法院的法官任命並無差異。然而，上訴法官比其初審法院同僚更有黨派色彩的傾向。

柯林頓政府讓法官席更精確反映性別與種族人口結構的企圖，在上訴法官層級是很明顯的。在柯林頓任命的法官有三分之一是女性，而柯林頓任命至上訴法院的法官中的非裔美國人、操西班牙語的拉丁裔人，以及亞洲人都比其它任何總統所任命的還要多。

小布什(**George W. Bush**)總統落實了種族與性別多樣性的承諾。例如在他指委派至地方法院的人員當中，有三分之一皆為「非傳統」— 即女性與少數民族。

最高法院大法官

自 **1789** 年以來，共有 **106** 名男性與兩名女性曾擔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雖然可能有一成的大法官出身低微，但大多數大法官都來自於活躍於政治的家庭，而且大約三分之一與法官有關，並與有服務於司法界之傳統的家庭關係密切。

直到 **1960** 年代，高等法院全為白人男性，但是在 **1967** 年，約翰遜總統任命索古德·馬歇爾(**Thurgood Marshall**)為最高法院的第一位非裔美國人成員。**1991** 年馬歇爾退休後，老布什總統(**George H.W. Bush**)以另一名非裔美國人克萊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取而代之。性別藩籬在 **1981** 年打破。當時，裡根總統任命珊卓·歐康納(**Sandra Day O'Connor**)進入最高法院任職。**13** 年後，另一名女性法官魯思·金斯柏(**Ruth Bader Ginsburg**)也加入她的行列。

說到大法官的非政治性職業，**108** 位法官全都受過法律訓練，並曾於職涯中當過律師。雖然半數以上在奉派至最高法院前都曾擔任過法官，但只有 **22%** 在就任前原本就擔任州或聯邦的司法職務。大法官們和下級聯邦司法體系的同僚一樣，在政治上活躍的可能性比一般美國人更高，並且幾乎全都與任命他們的總統擁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取向。

聯邦法官的資格

聯邦法官的職務雖無正式規定，卻有定義明確的非正式規定。

正式資格

憲法或成文法未就任職於最高法院或下級聯邦法院的資格做任何規定。憲法僅規定「美國之司法權，必須授予一最高法院」和任何國會設置之下級聯邦法院(第 3 條第 1 項)，還有總統「得經參議院之建議與同意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第 2 條第 2 項)。國會將同樣的甄選程序應用於上訴與初審法院。不須通過考試、沒有最低年齡規定、法官不需為本國出生之公民或法定居民，甚至也不要求法官要有法律學位。

非正式規定

至少有四項重要但非正式的因素決定誰能坐上聯邦法官席：專業能力、政治資格、自我推薦，以及運氣因素。

專業能力:美國司法職務候選人雖不一定非律師不可，但是任命有傑出專業表現之律師已成慣例。政治常規雖允許總統以法官席上的座位獎勵老盟友，不過傳統上仍期待想成為法官的人在專業能力上有一定聲譽，特別是層級越高，從初審法院到上訴法院再到最高法院，對法官職務的期待也越高。

政治資格:司法職位的大部分被提名人都有一些政治活動紀錄，原因有二。第一，在某種程度上，法官職位仍被視為政治庇護系統的一部份；曾服務於黨的人比沒有的人更有可能獲得聯邦職位作為獎賞。第二，想成為法官的人往往有必要從事一些政治活動，否則候選人根本無法吸引總統、參議員，或送交候選人名單之地方黨政領袖的注意。

自我甄選:雖有許多人認為公開宣佈成為聯邦法官之意圖的做法有失莊重且缺乏司法特質，但部分志在法官職務者精心安排了考慮周到的宣傳活動來代表自己，或至少傳話讓人知道自己有意願擔任司法職務。幾乎沒有人會承認自己在尋求職務方面很主動，但是根據可靠傳言，律師們通常會設法讓自己的名字在有職務空缺時出現。

運氣因素:幾乎所有司法職位的委派都存在相當成份的偶然。在對的時間成為對的黨的一員或在對的時點受到權力掮客的注目等因素與能否成為法官的關聯，和一個人的專業背景的影響一樣大。

聯邦遴選過程和參與者

遴選所有聯邦法官的司法架構都一樣，不過參與者的角色視美國的司法層級而有不同。所有的被提名人都是由總統在與白宮幕僚、司法部長、部份參議員，以及其它政治操盤手慎重商議後提出的。隸屬於司法部門的聯邦調查局(FBI)會進行例行的安全檢查。提名名單公佈後，認為被提名人與自己有利害關係的各利益團體可能會進行遊說，支持或反對某個候選人，候選人的資格也將交由美國律師協會進行評估。候選人的名單將送至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由委員會針對被提名人的職位合適性進行調查。如果委員會投票贊成，則名單將送至參議院，並以多數票決方式批准或否決。

總統

嚴格按照法律說來，總統提名所有的司法候選人，但從歷史上來看，總統對最高法院人選任命的參與多於對下級法院人選任命的參與，主要有兩項原因。

第一，最高法院的人選任命在總統 — 和整體大眾 — 看來要比下級法院的職位空缺更重要也更具政治意義。總統常利用任命高等法院大法官人選的少數機會發表政治宣言並為其主政方向定調。例如，在美國參加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全國壓力時期(period of national stress)，民主黨羅斯福總統升任共和黨的哈倫·斯通(Harlan Fiske Stone)為首席大法官，以示國家團結。1969年，尼克松總統任命保守派人士華倫·伯格(Warren Burger)以落實現其恢復「法律與秩序」的競選承諾。1981年，裡根總統為了擺脫對婦女運動冷漠以待的名聲，成為首位任命女性擔任高等法院大法官的總統。

總統對最高法院人選任命的關心很可能多於下級法院人選任命的第二項原因是，個別參議員和地方政黨領袖傳統上通常主導了下級法院人選的任

命。這項人稱「參議員禮遇」的作法是地方法官任命過程的一部分。根據參議員禮遇慣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詢問與總統同政黨且與被提名人來自同一州的參議員對候選人的看法。參議員發表對某候選人的看法，就等於有權否決提名。參議員禮遇並不適用於上訴法院的任命，即使總統通常必須聽從來自一上訴巡迴法院巡迴區之各州的同黨參議員的意見。

司法部

協助總統與白宮幕僚進行司法人員遴選過程的，是司法部兩名關鍵的被總統任命者——司法部長和副司法部長——其主要任務是找出符合總統制訂之標準的聯邦司法職務候選人。一旦有了人選，司法部人員便對候選人展開進一步審查。他們可能會命令聯邦調查局調查候選人的性格與背景；他們通常也會研究候選人撰寫的文章或演講內容，或諮詢一位現任法官的書面意見；他們可能會向地方政黨領袖確認候選人是否為忠誠黨員，以及是否和總統的主要公共政策立場同調。

在任命地方法官過程中，名單通常由與被提名人同州籍的參議員提交，司法部的功能與其說是提名不如說是篩選。不管提交之名單上有誰的名字，司法部的主要任務是評估候選人的個人、專業，以及政治資格。執行這項工作時，司法部可能會與白宮幕僚、參與提名的參議員，以及希望參與甄選過程之政黨領袖密切合作。

州與地方政黨領袖

地區政黨領袖對最高法院法官的任命不能什麼發表意見，因為總統的特權優於一切。這些領袖們在上訴法院法官遴選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無足輕重，但他們能左右美國初審法官的遴選，特別是當任命發生在其兩名參議員皆不與總統同政黨的州時，地區政黨領袖們的影響力尤大。這種情形下，總統較有可能與同黨的州領袖而非州議員商議人選。

利益團體

代表整個從左至右的政治光譜的部分美國壓力團體通常會進行遊說，以表達他們對司法被提名人的贊成或抵制。這些團體 — 公民自由、商業、勞工組織、民權 — 的領導人積極敦促總統取消政治與社會理念與他們不同的被提名人，或遊說參院支持他們贊同的被提名人。利益團體贊成或抵制的被提名人遍佈各聯邦司法層級。

美國律師協會

五十多年來，美國律師協會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ABA**) 的聯邦司法委員會在評估聯邦法官職位可能被提名人的專業資格上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其代表美國所有巡迴區的 **15** 名委員會成員根據三項評判表准給予候選人評價：司法品格、專業能力，以及正直。委員會將候選人評為「合乎資格」或「非常合乎資格」，令人無法接受的則被歸類為「不合乎資格」。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

參議院的規則規定其司法委員會必須詳加考慮所有聯邦法官被提名人並向整個參議院提出建議。因此，它扮演著審查被提名人而非推薦可能人選的角色。委員會主持所有的提名聽證會，並於期間聽取證人證詞並進行秘密商議。地方法院人選任命的聽證會多半只是敷衍為之，因為「參議員禮遇」原則實際上已經決定了候選人是否為參議院所接受。然而，對上訴法院被提名人 — 當然還有最高法院被任命人 — 而言，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的聽證會是個嚴肅的程序。

參議院

任命聯邦法官過程中最後的一個步驟是由參議院進行多數票決。從歷史上來看，參議院被規定的角色已經被兩個普遍的觀點所凌駕。自華盛頓以來的歷任總統和少數學者採取的立場是，除非有強烈的反對理由存在，否則參議院應該默默聽從總統的選擇。其它學者與大部分參議員抱持的看法，則是參議院有權利和義務針對被提名人做出決定。實際上，參議院在司法核准過程中的角色依聯邦法官人選的層級而不同。

就地方法官而言，參議員禮遇原則凌駕一切。也就是說，如果被總統提名人獲得總統同黨之該州參議員所接受，那麼參議院通常樂於核准這項任命。參議員禮遇不適用於上訴法院的法官任命，因為職位空缺所涵蓋的範圍超過了一位或兩位參議員所在的各州。但出現職位空缺之巡迴區內的各州參議員，通常會向總統提交可能的候選人名單。一項不成文規定是，巡迴區各州至少應有一名該州的法官坐上巡迴上訴法院的法官席。只要遵守上述原則，再加上被總統提名人有相當良好的資格，參議院通常都會聽從總統的建議。

如果對高等法院被提名人的合適性有爭議，參議院傾向對總統提出質疑。自 1789 年以來，歷任總統曾送交 144 個最高法院被提名人選給參議院，徵求其意見與同意。在這些人選當中，有 33 人不是遭到參議院拒絕或「無限期延遲」，就是被總統取消。總統約有 79% 的成功率，而且這個機率似乎正在提高當中，特別是和 19 世紀多達三分之一的被提名人遭到參議院拒絕的情況相比。紀錄顯示，當被提名人的背景無爭議並採取向中間靠攏的政治路線，而參議院也在總統所屬政黨的控制之下，或大多數參議員與總統有相同的基本立場與價值觀時，總統任命高等法院法官的成功率最高。

司法社會化過程

在大學與法學院中，未來的法官們除了學習基本法律知識之外，還必須習得重要的分析和溝通技巧。累積了一、二十年的法律實務經驗之後，未來的法官們對法庭和法律的實際運作已經瞭如指掌，也專精了幾個法律領域。儘管他們作了種種的準備——有時稱為「預期社會化」(anticipatory socialization)——在美國，大部分的新法官在如何當一名法官的路上，都還有很多事情要學。

美國不只缺乏司法專業的正式化訓練程序，甚至還有一種假設是，只要具有大約十年的律師經驗就足以擔任法官。情況正好相反，在美國，成為一

名法官需要很多的新鮮人社會化(短期學習與新角色的適應)和職業社會化(為期多年的在職訓練)。

典型的初審法院新被任命人可能是一流的律師和專精於幾個法律領域的專家。但是，眾人期待身為法官的他們專精於所有法律主題。他們必須參與通常和他們擔任律師時無關的司法職責(例如，判刑)，而交付給他們的許多行政事務都是他們以前沒有經驗過的(例如，學習如何有效記錄數百宗案件)。

在上訴法院層級也一樣有一段新人社會化的時期 — 雖然巡迴法官先前可能已有司法經驗 — 而曾任初審法官的人似乎比較容易度過這段過渡期。在過渡期間，法庭上的巡迴法官在經驗更豐富的同僚面前較少發言。他們通常會花更多時間撰寫意見書、較順從資深同僚的意見，或經歷一段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

最高法院新任大法官的學習過程難度就更高了。和上訴法院法官一樣，最高法院的新手大法官通常會聽從資深同僚的意見。他們較少撰寫多數與異議意見書，也面臨著一定程度的不確定感。高等法院的新被任命人可能比下級法院同僚擁有更多司法經驗，但是最高法院廣泛參與司法決策的事實 — 相對於上訴法院的錯誤修正和初審法院的規範執行 — 也許解釋了他們起初的躊躇不決。

所有的新聯邦法官都需要新鮮人社會化和職業社會化，但他們從何處獲得指導？上訴法院法官與初審法院法官大部分的訓練來自於他們資深且有經驗的法官同僚 — 特別是巡迴或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官。最高法院的情況也一樣，主要由資深同僚(通常是首席大法官)負責將法院的必要規定與法庭價值基準傳承給新手法官。

聯邦司法中心為新任法官提供的訓練研討會也在新法官的訓練與社會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雖然有些研討會由外界專家所指導 — 法學院的主題事務專家 — 核心指導者往往是經驗老到的法官，他們的實際法庭經驗贏得了聯邦司法體系中新成員的敬重。

這些社會化過程對於美國司法法律系統的運作有何重要性？第一，新手法官垂手可得的社會化媒介讓系統運作更為順利，並將停工期減到最短。假如新法官被孤立在經驗較老到的同僚之外，可能要花更多時間學習這一行的細微要點，在訴訟中的犯錯次數想必也更多。

第二，司法制度本身能夠提供社會化的這個事實 — 由較年長、有經驗的法官訓練新手 — 扮演著黏合整個制度中的角色，讓一個世代的法官的司法價值、作法，以及定向能夠傳承下去，也讓司法制度在這個充滿混亂與隨機行為的世界中得以保有連貫性與恆久性。

法官的退休與免職

法官停止履行司法職務的原因有選擇性退休、健康不佳或死亡，或遭到其它法官的懲處。

對於聯邦法官的懲處辦法

根據憲法第 3 條規定，所有被任命的聯邦法官「行為良好者」可保有職務，實際上也就等於終生任職或直到自願離職為止。將法官免職的唯一方式是彈劾(由眾議院起訴)和參議院定罪。為合乎憲法規定(就最高法院大法官而言)和立法標準(就上訴與初審法院法官而言)，只有在發生「叛國罪、行賄，或其它重罪或輕罪」時，才能進行彈劾。遭到彈劾的法官會面臨在參議院舉行的審判，經出席議員三分之二通過方可定罪。

自 1789 年至今，眾議院只對 13 位法官提出過彈劾 — 雖然約有相同數目的法官在遭受正式起訴前已自行辭職。這 13 名法官中只有七人被定罪並因此遭到免職。

雖然法官的公然犯罪行為極為少見，但是行為不端的灰色地帶可能會使這麼做的法官遊走於可被接受與可彈劾的行為之間。遇到以下這種聯邦法

官，該怎麼辦？儘管有明顯利益衝突卻仍審理案件的法官；在法庭上持續表露偏頗行為的法官；個人習慣對其法庭表現有負面影響的法官。回顧歷史，除了同事的輕微訓斥外，這樣的案例少有懲處，不過近數十年已經出現針對法官的懲處辦法了。

在 1980 年 10 月 1 日這一天，國會的一項新成文法生效了。名為司法理事會改革暨司法行為與無能力法(**Judicial Councils Reform and Judicial Conduct and Disability Act**)的成文法分為兩個不同的部分。第一部分是授權給各巡迴區的司法理事會(由上訴與初審法院法官組成、該巡迴區首席大法官主持)，讓理事會「制訂所有必要且適當的命令，以提升巡迴區內司法行政的效果與速度。」法令的第二部分建立了對法官的法律申訴程序。簡言之，就是允許權利受到非法侵害的當事人向上訴法院書記提出書面告訴。接著首席法官會審查告訴，如果上訴看起來無關緊要或出於其它原因，首席法官可能不予審理。如果告訴看似有效，則首席法官必須指派一個由法官自己或人數相等的初審與巡迴法院法官所組成的調查委員會。調查過後，委員會向理事會報告，理事會有下列幾種選擇：法官無罪；如果違法是破產法官或治安法官，可能會遭到免職；憲法第 3 條的法官可能會受到以下的懲罰：私下或公開的訓斥或責備、無資格的證明、自動辭職的要求，或禁止進一步的案件指派。然而，憲法第 3 條的法官是不能被免職的，彈劾仍是唯一的辦法。如果理事會判定法官行為構成彈劾的理由，就會通知司法會議。司法會議可能會將案件轉給美國眾議院交付討論。

聯邦法官的無能力

也許比將行為不端法官免職更為麻煩的是將因年邁體弱而無法有效履行司法職責的法官免職。國會藉由金錢優惠鼓勵資深法官退休，並已獲得一些成果。自 1984 年起，聯邦法官退休時可領全薪並享受所謂的「80 的規定」下的好處；也就是當法官的年齡與擔任法官的年資相加達到 80。國會也允許法官年老繼續任職，不必完全退休。為了換取案件量減少，他們可以保有辦公室與職員以及 — 同樣重要的 — 身為一名積極法官的聲望與自我敬重。

法官通常會在其所屬黨派贏得總統職位時挑選辭職時機，好讓有類似政治與司法取向的法官取而代之。**1990**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特別從 **1954** 年起，「司法人員的退休/辭職率受到政治/意識型態考量的強烈影響並充滿政黨色彩」，並指出許多法官認為自己是人民、司法任命過程，以及法官與大法官之後續決定之間的政策連結的一部份。

州法官的資格與背景

大部分的州法與州憲法對於州法官職位資格未設嚴格條件。絕大多數的州都不要求治安法官或治安官擁有法律學位，但是初審與上訴法官就一定要有這樣的學位(無論就形式或實際而言)。

雖然女性在美國人口中略佔多數，且近幾十年來從事法律專業的女性有增加的趨勢，然而女性擔任法官的人數仍低於適當比例。曾任職州法官的人擔任較低層級之州司法職務的可能性高於擔任最高法院層級職務的可能性，不過各州情況有所不同。截至 **1990** 年代為止，只有約 **14%** 之法官為女性，**6%** 是非洲裔美國人、操西班牙語的拉丁裔人，或亞裔美國人。

如同聯邦法官一樣，州法官通常待在自己成長與受教育的地方。約有四分之三的州法官任職於自己出生的州，而離開家鄉去外地攻讀學士或法律學位的人不到全體的三分之一。這種強烈的地方色彩傾向也反映在州法官在法官席上的工作經驗模式。例如，在州最高法院任職的法官中，只有 **13%** 有過聯邦司法經驗，有過若干類型的州司法經驗的比例則高達 **93%**。

法官任職時通常已屆中年。州初審法官任職時約為 **46** 歲，和聯邦法官的 **49** 歲不相上下。州上訴法院法官上任時的歲數通常比初審法院的法官更大一些，約為 **53** 歲 — 和聯邦上訴法官差不多。

以所屬政黨而言，無論是遴選或任命而來的州法官，通常都代表掌管法官所在的州的政黨。而且，無論是經由遴選或獲得州長任命的州法官，絕大多數在坐上法官席之前都曾活躍於政治活動。

超過半數的州地方法官都出身於私人法律機構，另外約有四分之一是從下級法院的法官職務(例如，治安官)被拔擢上來的。曾經執業的法官中，大部分都從事一般法律事務而無專門領域。約五分之一的州法官是從地區律師招募而來的，只有 **3%** 曾從事私人執業的刑事實務。任職於州最高法院的法官當中，幾乎有三分之二來自於中級上訴法院或州初審法院。

州法官的遴選過程

州層級用於遴選法官的方式很多，而且每一種都有許多變化。基本上，在 **50** 州中的任何一州都有五種取得法官職務的途徑：政黨性選舉、非政黨性選舉、擇優遴選、州長任命，以及州議會任命。

法官甄選

法官選舉 — 無論是政黨性或非政黨性投票 — 是各州的標準方法。此法盛行於傑克森總統時代(**1829-37**)，一個美國人民尋求政治程序民主化的時期。然而實際上，政黨領袖通常將司法選舉當作獎賞忠貞黨員的間接恩惠。而且，必須出馬競選的法官還經常被迫向將來會出現在法庭上的律師與法律事務所募集競選捐款——一個潛在的利益衝突來源。最後還有一點，那就是法官選舉的投票率極低。選民可能認識他們屬意的總統、國會成員，或州參議員人選，但卻不熟悉那些出馬角逐州法官職位的候選人。

在 **19** 與 **20** 世紀之交的進步運動中，改革者希望抹去司法選舉中的部分政黨色彩，讓法官以非政黨性方式競選。原則上他們以理念與資格，而非憑著所屬政黨，參選。但即使是在所謂無黨派的各州，政黨仍會替個別司法候選人背書並捐獻競選經費，讓候選人對某一政黨有所認同。

擇優遴選(Merit Selection)

擇優遴選自 1900 年代初期便已實行，並被視為遴選法官較理想的辦法。第一個全面採行此法的州是 1940 年的密蘇里州。自彼時起，這個方案就名為「密蘇里計劃」或這之類的名稱。

使用密蘇里形式計劃的各州綜合使用選舉和任命的方式。州長從一個五人(或以上)提名小組的推薦名單中任命一候選人為法官。提名小組的成員通常為律師(通常由地方律師協會選出)和州長指定的非律師人士，有時還包括一名資深地方法官。州長依據法律或經由默然同意(implicit agreement)從推薦名單中任命一人為法官。新任法官在擔任職務一小段時間後(通常為一年)必須參加一項特殊競選，憑著自己的紀錄參選。(選民被這麼問：某法官應該留任嗎？)如果選民支持法官繼續保有職位(幾乎總是如此)，則該名法官的任期將固定下來並維持相當長的時間。

州長任命(Gubernatorial Appointment)與州議會任命(Legislative Appointment)

如今，只有少數州的法官是由州長與州議會任命的。若法官由州長任命，一定免不了政治力的介入。州長傾向任命曾參與州政治活動，且其活動對州長本人或州長所屬之政黨或盟友有利的法官。而且，在司法任命的過程中，州長通常會與地方政黨領袖或州議員談判，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州長也可能會以法官職務酬謝曾給予忠誠政治支持的議員或地方政壇人士。

只有少數幾州還允許議員任命州法官。雖然州最高法院成員的遴選設有各種判斷準則，當出現州審判法官職位空缺時，州議員往往還是會求助於已卸任的議會前輩。

法官的退休與免職

在州層級，法官太老或不適任的問題似乎比聯邦層級少。不少州都設有強制退休計劃。退休的最低年齡為 65 至 70 歲，以 70 歲最普遍。有些州已降低任職超過理想任期之法官的退休優惠；也就是，在法官席上坐得愈久，退休優惠就愈少。

退休計劃，無論在讓年老法官辭職方面效果有多好，對於不適任、腐敗，或不道德的年輕法官根本毫無用處。綜觀美國歷史，各州用來將這類法官免職的程序包括了彈劾、罷免選舉，以及州議會共同決議。然而，這些方式只能達到最低限度的效用，因為這些辦法不是在政治上難以實施，就是既費時又麻煩。

近來，各州已開始設置由法官自行組成以監督其成員的特別委員會。不過這種委員會並不總是有效，因為法官通常不願讓同僚接受公開批評與懲戒。

第八章 司法政策的實施與影響



一名檢察官在華盛頓州最高法院進行辯論。該法院是下級法院之一，常被視為是上訴法院(特別是美國最高法院)判決所制訂之政策的執行者。

(AP/WW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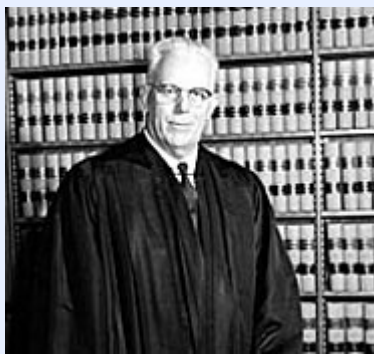


約翰遜總統簽署 1964 年民權法案後伸出手與金恩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握手。國會在施行最高法院判決方面往往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旨在廢

除學校種族隔離政策的這項法案即為一例。 (AP/WWP)



2001 年 4 月 2 日，就在美國公民自由聯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提出訴訟強迫學校取消禱詞後不久，維吉尼亞軍校學生進行晚餐前的禱告。過去 40 年來，宗教在公立學校中的角色一直是美國法院體制中飽受爭議的問題 (AP/WWP)



美國首席大法官厄爾·華倫(Earl Warren)1961 年的照片。在他任內(1953-69 年)最高法院透過許多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判決，包括吉迪恩訴溫賴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和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啟動了刑事程序的重大改革。 (AP/WWP)



自從最高法院的羅訴韋德(Roe v. Wade)案判決以來，國會、司法體系各層級，以及政界都看得到墮胎的支持者與反對者間的戰爭。 (AP/WWP)

法院做出判決之後，各方人士 — 其它法官、公務人員，甚至個別公民 — 都可能被要求執行裁決。本章探討執行過程的各方參與者、他們對司法政策的反應，以及他們響應法院判決的方式。

視法院判決的本質而定，司法政策可能會造成非常有限或非常廣泛的影響。車禍賠償金之訴訟只會對涉案人及其家人產生直接影響。但著名的吉迪恩訴溫賴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1963 年)的判決已對數百萬人產生了或多或少的直接影響。在該案中，最高法院認為各州必須為重罪審判中的貧窮被告提供律師。非常多人 — 被告、法官、律師、納稅人 — 都感受到了這項司法政策的影響。

上級法院判決對下級法院的影響

上訴法院，特別是美國最高法院，通常被視為最有可能參與決策的法院，而初審法院一般則被視為規範的執行者。然而，下級法院有許多脫離上訴法院的獨立性，而且根據一項研究，下級法院可能被視為「不遵循上級法院領導的獨立角色...除非情況有利於他們這麼做」。

下級法院的裁量權

為什麼下級法院在落實上級法院政策時有這麼大的裁量權？部分是因為美國司法制度的結構。美國的司法制度向來都有獨立、地方分權，以及個人主義等特色。以聯邦法官為例，他們受到終生任期的保障，傳統上有權以自認合適的方法管理法庭。懲戒措施很少，從歷史上來看，聯邦法官對於彈劾通常也無所懼。想保住職位的話，州法院法官一般只需讓選民滿意即可。

下級法院法官行使的裁量權可能也是上級法院判決的結果。例如，繼著名的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案(1954 年)後，最高法院告訴執行判決的聯邦地方法官說，公立學校必須立即以

合理的方式開始，並以極為謹慎的速度廢除種族隔離。何謂立即以合理的方式開始？學區必須以何種速度進行才符合所謂之極為謹慎的速度？最高法院並沒有替這些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

雖然並非所有的高等法院裁決都留下這麼大的解釋空間，但其中有許多確實如此。法院判決可能因為數個原因而不明確。有時，議題或主題事務太過複雜，以致於難以制定明確決策。以猥褻案件為例，最高法院不難判決色情用品不受憲法第一修正案之言論自由的保障。然而，要如何定義猥褻則是另外一回事。例如「病態色慾」(prurient interest)、「明顯惡劣」(patently offensive)、「現今社會標準」(contemporary community standards)，以及「無濟於社會價值」(without redeeming social value)等，在猥褻的意見書上已是司空見慣的慣用語，但是這些詞語留給人很大的主觀解釋空間。

合議庭所訂定的政策通常都模稜兩可，因為大多數的意見書都是為了涵納數字法官的看法而寫的。多數意見可能還附有一些協同意見。發生這種情形時，下級法院的法官沒有清楚的判例可循。以富曼訴喬治亞州(Furman v. Georgia)案(1972 年)為例，最高法院廢除了多個州的死刑，但理由卻各異。有些法官反對死刑本身，認為死刑是殘酷且異常之刑罰，違反了憲法第八修正案。其它法官投票廢除死刑的原因是他們認為死刑被以歧視的方式執行。1972 年的這項判決所造成的不確定性不只影響下級法院的法官，也影響了各州議會。許多州一下子就通過一連串差異頗大的死刑成文法，並引發大量的新訴訟案。

下級法院法官在實施過程中的裁量權也受到上級法院傳達政策之方式所的影響。當然案件被上訴的初審法院會得知上訴法院的判決，但上訴法院不會以有系統且正式的方式將其判決告知其它法院，或確保下級法院法官有取得意見書副本的途徑。含有新司法政策的判決會以印刷品形式或置於網絡上讓大眾取得，如果法官有時間與意願時，可自行閱讀。

最高法院、下級聯邦法院，以及州上訴法院的意見書可於各法院、法學院，以及大學圖書館取得，放上網絡的意見書也越來越多。然而，如此廣泛的可得性卻不保證每份意見書都會被閱讀和清楚理解。許多下級州法官，例如治安法官與少年法院法官，都是對於閱讀複雜的司法判決不感興趣也缺乏技巧的非律師人士。最後一點是，即使是對高等法院判決感興趣也有能力理解的法官們也沒有足夠時間讀完所有的新意見書。

面對上述問題的法官要如何知悉上級法院的判決？方法之一是透過在下級法院代表出庭的律師得知。一般假設立場對立的雙方律師會於法官面前辯論時提出相關判例，而僱有助理的法官也可以請助理搜尋上級法院最近的判決。

因此，上級法院的部份判決之所以得不到迅速且嚴格執行，純粹只是因為下級法院的法官不知情。而即使是下級法院法官知悉的判決，可能也未必都能清楚瞭解。這兩者中的任一因素促成了下級法院實施司法政策時的裁量權運用。

下級法院的解釋

一項研究提到「重大政策的宣佈幾乎總是需要決策者以外的某人加以解釋」。就上訴法院所做的司法決策而言，這句話顯然是很中肯的。下級法院法官行使的第一項裁量權，可能就是解釋上級法院判決的意義。

下級法院法官解釋上級法院制訂之政策的方式取決於多個因素。許多政策的陳述都不清楚，因此講理的人可能會因為如何解釋才適當而發生爭論。即使是其公告並無模稜兩可情況的政策，有時也會因法官的不同而被賦予不同的解釋。

法官的個人政策偏好也會影響他們對上級法院政策的解釋。法官們帶著各自獨特的背景特色來到法院。有些是共和黨員，有些是民主黨員；有些人較寬厚，有些人較嚴格。他們來自全國各地。有些曾任檢察官；有些人則以辯護律師或企業律師為其主要經歷。簡言之，個人背景可能會影響法官

的政策偏好。因此，法官可能將自己的想法加入對上級法院政策的解釋之中。結果是，一項政策可能為某些法官熱烈歡迎，而為某些法官全然拒絕。

下級法院採取的策略

偏好並接受某項上級法院裁決的法官自然會加以執行甚或擴大解釋。有些法官還得冒著社會排斥與各種騷擾的風險來執行他們所認同卻不受所在社群歡迎的政策。

不喜歡上級法院某項政策決定的法官在實施時可能會很保守或只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施行。基本上不同意上級法院某項政策決定的法官可以採取一些策略。其中一項甚少使用的策略是藐視，意即法官在下級法院案件中完全不採行上級法院的該項政策。

這種公然藐視極為少見。其它的策略就沒有這麼極端。其中一項策略是避免必須實施該政策的情況。案件可以照技術或程序理由處理，這麼一來法官就不需裁決案件的實際是非曲直。例如，案件可能裁定為原告沒有立場提告，或案件因議題在審判開始前已經得到解決而過時。下級法院法官有時會以宣佈部分上級法院之判決為「附帶意見」(**dicta**，拉丁文，意思是「權威的宣言」)，避免接受政策。附帶意見是指意見書中和裁決之中心邏輯沒有重要關聯的部分，可作為指引但不具約束力。至於附帶意見的組成內容包括哪些，則有很大的解釋空間。

基本上不同意某項司法政策的法官所使用的另一個策略，是盡可能狹義應用該政策。下級法院法官可以採取的一個方法是，以上級法院的案件與下級法院的案件之間存有事實差異為由裁定該判例不具控制力。也就是，因為兩宗案件可能有所差別，所以不需遵守判例。

下級法院法官所受的影響

有時下級法院法官必須針對上級法院未提供精確標準的案件作出裁定。這種情形發生時，下級法院法官必須從他處找到指引以裁決他們面前的案

件。一項研究指出，處於這種狀況下的法官「會從各種廣泛的因素中，包括個人的政黨關聯、意識形態，或該地區的規範等，尋找裁決該案的線索。」

國會對實施過程的影響

國會對聯邦司法判決的反應可能有很多種：國會可能支持或阻礙判決的實施；此外，國會還可以修改法院對法律的解釋。最後，國會還可以對個別法官發動攻擊。

在裁定案件的過程中，法院常被要求解釋聯邦成文法。有時，司法解釋可能會不同於國會中的多數意見。發生這種情形時，國會可以改變在新法規中的成文法，使之有效否決法院的最初解釋。然而，絕大多數的聯邦司法制度的法律判決不會被國會改變。

聯邦法院除了裁定成文法之外，也解釋憲法。對於不喜歡的憲法解釋，國會有兩種推翻或改變的方式。第一，國會可以另一項目的在於避免憲法問題的成文法作為響應。第二，憲法判決可直接由憲法修正案推翻。雖然多年來被提出的這類修正案很多，達到必要之國會各院三分之二的提案票數和各州四分之三的批准票數卻非易事。自最高法院設立至今，該院只有四項判決曾遭憲法修正案推翻。

對於聯邦法院整體與特定法官的國會攻擊是響應司法判決的另一個方法。這些攻擊可能採取的形式包括：由國會成員發表言詞抨擊、威脅彈劾現任法官，或對潛在的聯邦法官被提名人展開更徹底的司法理念調查。

然而，國會與聯邦法院並非天生的死對頭，對聯邦司法的報復相當罕見，雙方通常會攜手朝向類似的政策目標努力。例如，在實施最高法院的消除學校種族隔離政策上，國會透過制訂 1964 年民權法案的方式扮演了關鍵角色。該法案使司法部有權起訴未遵守布朗訴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判決的學區。民權法案第 6 條也為種族隔離的努力提供了一項有力手段，那就是威脅拒絕聯邦對學校之資助者犯有種族隔離罪。

1965 年，為進一步強化對消除公立學校種族隔離政策的支持，國會通過

了美國中小學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此法案擴大了聯邦政府在公立教育資金籌措上所扮演的角色，從而使得聯邦資金中斷的威脅成為許多實行種族隔離學區的嚴重問題。這樣的國會支持很重要，因為當法官與政府團結一致時，遵循政策的可能性便會提高。

行政部門在實施過程中的影響

有時可能會直接要求總統落實司法判決。以美國訴尼克松案(**United States v. Nixon**)案(1974 年)為例，參議院委員會對一樁以非法入侵設於華盛頓特區水門飯店之民主黨總部為掩護的事件所進行的調查，直接導致政府高層官員和總統的密切合作。該調查也揭發了尼克松總統在調查期間於橢圓形辦公室裝置自動錄音系統一事。奉命調查水門案的特別檢察官里昂·賈瓦斯基(**Leon Jaworski**)認為部份錄音帶可能提供了起訴高階官員所需之證據，並要求總統交出。尼克松以行政特權與機密談話為由拒絕交出錄音帶。最高法院的判決命令總統將傳喚之錄音帶交給處理高層政府官員審判的法官約翰·西瑞卡(**John J. Sirica**)。尼克松遵守了高等法院的指示，因此判決的施行使得尼克松快速下台。他在兩周內辭去了總統職務，時值 1974 年 8 月。

總統即使不直接參與司法政策的執行，也可以左右司法政策的影響力。由於其職位的地位與能見度，總統只要透過言語或行動，就可以激起對一項新司法政策的支持或抵制。

總統可以提出直接影響法院的法令。例如，小羅斯福總統(**Franklin D. Roosevelt**)即曾敦促國會擴大最高法院的規模，好讓他能「塞入」支持其政府立法議程的大法官，但未能成功。

任命權也給了總統影響聯邦司法政策的機會，因為所有的聯邦法官都是總統依照參議院的建議並經該院同意而任命的。

司法部是行政部門的一部份。總統可以透過該部的之活動影響司法決策。司法部長與其職員部屬可按照總統的整體政策目標強調特定議題。然而，

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司法部可自行決定以不在法院積極推動的方式降低特定政策的重要性。

另一位可以影響司法決策的官員是檢察總長(**solicitor general**)。從歷史來看，這項職務被視為負有對司法與行政部門的雙重責任。由於檢察總長與最高法院關係密切，因此有時也被稱為「第十位大法官」。檢察總長通常被視為顧問，提供法院關於聯邦成文法與憲法含義的見解。就涉案一方為聯邦政府的案件而言，哪些案件將上訴至最高法院也由檢察總長決定。此外，檢察總長還可以提出法庭之友狀敦促法院批准或拒絕另一位訴訟者的移審令聲請，或支持或反對高等法院所推動的某項政策。

許多司法判決實際上是由各部門、政府機關，以及行政部門委員會實施的。例如，最高法院對弗朗蒂羅訴理查德森(**Frontiero v. Richardson**)案(1973年)的判決要求美國空軍在實行上扮演主要角色。該案對提供福利給空軍中的已婚男性但未提供類似福利給已婚女性的國會成文法提出質疑。空軍中尉莎朗·弗朗蒂羅(**Sharron Frontiero**)以構成性別歧視為由質疑該政策。亞拉巴馬州的一個聯邦地區法院發佈了支持空軍政策的判決。弗朗蒂羅中尉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高院推翻了下級法院的判決，並要求空軍實施新政策。

其它的政策執行者

司法政策通常由州與聯邦官員執行。在最高法院的刑事正當程序判決當中，例如吉迪恩訴溫賴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和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1966)，有許多判決都是由州法院法官與其它州官員負責執行的。以規定刑事嫌犯必須被告知其權利的米蘭達案判決為例，州與地方官員在執行方面就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裁定必須以州之經費為重罪案的貧窮被告提供律師的吉迪恩案判決，則已由公開辯護人、地方律師協會，以及法院指派個別律師執行。

州議員與行政官員也經常參與執行過程。判決有人犯了不法行為的法官可能會從多個選項中選出相應的救濟辦法。較常見的選項包括程序救濟、執

行標準，以及具體的救濟行動。程序救濟提供的辦法包括諮詢委員會、公民參與、教育方案、評估委員會、爭議解決程序，以及請專家處理問題並找出解決之道。程序救濟不具體指定行動形式，執行標準則需要特定的補救辦法一例如，一定數量的房屋或學校，或監獄或心理健康機構中一定的職員人數等。達成這些目標的具體方法，則由訴訟中提及之官員決定。具體的救濟行動的例子則有學校校車接送、調整就學學區，以及改變監獄牢房與醫院病房的規模與條件。就具體救濟辦法或落實辦法的手段而言，這類型的救濟無法為被告提供任何彈性。

這些救濟法令的實施至少有一部分會移交給州議會。規定監獄制度中要有一定數量的牢房或警衛的法令可能需要州方面支出費用，而這些費用必須由州議會去籌措。同樣的，規定興建更多現代的心理健康機構或提供更多現代設備的法令意味著州支出的增加。州長也會涉入這類補償法令的實施，因為他們通常都密切參與州的預算編製程序，而且也可以簽署或否決法律。

有時法官會指派一些人協助救濟法令的實施。專家通常被賦予一些決策權。法院指派的監督者在部份情況下也派得上用場，但法官的決策責任並不因此而得到解除。情況恰好相反，監督者負責收集數據並就被告遵循救濟法令之情況進行報告。當命令未獲執行或有某種障礙阻擋了救濟法令的進行，法官可能會指派某人前往接管，並授予此人漠視一般機構藩籬之權以完成任務。

深入參與司法政策實施的還有一群個人：組成全美各教育局的數千名男女。兩大引人注目的政策領域讓各教育局面臨最高法院政策之任務執行時捲入高度爭議。

第一，高等法院於 **1954** 年裁定種族隔離不得存在於公立學校時，首先必須實施此判決的是教育局、督學，以及聯邦地方法官。他們在執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影響了全美數百萬名學童、家長，以及納稅人的生活。

第二個涉及教育局的領域是最高法院對公立學校的宗教政策。在恩格爾訴維塔爾(**Engel v. Vitale**)案(1962 年)中，最高法院認為紐約州規定公立學校每日朗誦由該州撰寫的禱詞之行為違憲。對此判決，有些學校則改以聖經詩或主禱文代之，理由是既然聖經或主禱文並非由州所書寫，他們就沒有違反高院政策。一年後，最高法院禁止了這些新措施，指出其違憲之處在於為宗教活動背書，違憲與否並非取決於禱詞是否由州所書寫。

司法政策的影響

最高法院判決的根本重要性主要在於對全美社會的影響。幾項具有重大影響力的政策分別屬於種族平等、刑事正當程序，以及墮胎等領域。

種族平等

許多人指出最高法院在布朗訴教育局(**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案的判決是驅動美國種族平等的動力。不過，國會與行政部門也參與確保廢除種族隔離政策的執行過程。無論如何，法院透過布朗案判決開啟了對種族平等這項全國性政策的追求。

一開始，法院的判決往往不明確，給了人們推委新政策的借口。然而，最高法院大法官與許多下級聯邦法官堅持不懈，持續在全國政治議程中推動種族平等政策。他們的堅持隨著 1964 年民權法案的通過而得到回報，也就是布朗案判決的十年之後。這項法案獲得肯尼迪總統(1961-63)與約翰遜總統(1963-69)的強力支持，而國會與總統也成為史上美國種族平等的支持者。

聯邦司法體制在決策過程中還有另一層重要性，布朗案及其後的案件即闡明了這個面向。雖然法院在尋求種族平等過程中有很多年都在孤軍作戰，但其判決並未受到漠視。查爾斯·強森(**Charles A. Johnson**)與布萊利·加南(**Bradley C. Canon**)在《司法政策：執行與影響》(**Judicial Policies: Implementation and Impact**)中主張布朗案的判決「是能見度極高的高院判決，一次企圖推動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社會改革的司法努

力。當然，在其後幾年，非裔美國人與其盟友對其他政府機構施加了龐大的壓力以廢除學校種族隔離。的確，這些壓力很快就遠遠超過學校範圍，變成要求美國生活所有層面的整合」。

刑事正當程序

刑事正當程序領域的司法決策與厄爾·華倫(Earl Warren)任職美國首席大法官期間(1953 至 1969 年)的關係最為密切。談到這個時期，前檢察總長阿奇博爾德·考克斯(Archibald Cox)說過：「以前從沒有過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進行得如此徹底的刑事程序改革。」華倫最高法院的判決以改變各州在處置刑事被告時所遵守之程序為主要目的。華倫離開最高法院時即已制定處理各類廣泛活動的各項新政策；其中影響較為深遠的，是馬普訴俄亥俄州(Mapp v. Ohio)案(1961 年)、吉迪恩訴溫賴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以及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 Arizona)案。

馬普案的判決將已適用於全國政府達數年之久的違法證據排除原則(exclusionary rule)的範圍擴及各州。這項原則規定州法院必須在審判中排除由警察非法取得的證據。雖然有些警察局，特別是主要的都市地區，為了致力於遵守取得證據的規則而設立了具體的方針，然而這樣的努力並不普遍。由於警察實務上的差異，再加上下級法院對於合法的證據搜索與取得之解釋也不同，因此美國各地執行馬普案判決的情形並不一致。

也許讓馬普案影響力不如預期更重要的因素，是最高法院大法官們對違法證據排除原則的支持不一致。打從一開始，這項判決就沒得到全體一致的同意，而多年來都持續有部份大法官公開批評違法證據排除原則。再者，最高法院後來的判決放寬了合法搜索的範圍，從而限制了該原則的適用性。

吉迪恩訴溫賴特(Gideon v. Wainwright)案的判決規定州法院必須在審判前為重罪案的貧窮被告指派一名律師。許多州早在最高法院做出這項判決前即已在這類審判中指派律師，其它各州則以不同的方式開始遵行。許多

地區建立了公設辯護人方案。在其它地區，當地的地方律師協會與法官合作，以實施符合最高法院新政策的方法。

吉迪恩案裁決的影響比馬普案更為明確、一致。原因之一無疑是因為許多州早已執行因吉迪恩案而做出的政策。各州對該政策的接受程度顯然高於馬普案。吉迪恩案中所宣佈的政策比馬普案定義得更清楚。法院雖然沒有具體說明被告必須擁有公設辯護人或由法院指派的律師，卻明確規定貧窮的被告必須有律師的協助。而且，最高法院在下一任首席大法官華倫·伯格(WarrenBurger)在職期間(1969至1986年)並未對華倫最高法院替貧窮被告提供律師的政策有任何退縮，和在馬普案中證據搜索與取得範圍的情況不同。這些因素都使得吉迪恩案中所宣佈的政策更具影響力。

在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最高法院更進一步規定警察必須將憲法保障之權利告知被拘捕的嫌犯，其中一項權利便是偵訊時有律師在場。嫌犯也必須被告知有權保持沉默，且其任何陳述都可能用於法庭上；嫌犯若請不起律師，則以州的公費提供一名律師；他們也有權隨時停止回答問話。這些規定陳述得非常清楚，因此警方實際上已將規定抄寫在卡片上、放在襯衫的口袋裡。如此，當嫌犯被拘捕時，警察只需拿出卡片宣讀嫌犯權利即可。

就警方是否對逮捕的人宣讀米蘭達權利而言，最高法院的這項政策是推行得很徹底的。然而，部份研究已就嫌犯被宣讀權利的方式對米蘭達案的影響提出質疑。向某人宣讀卡片上的內容是一回事；為之解釋高等法院規定的意義並讓嫌犯瞭解又是另外一回事。從這個角度來看，米蘭達案中宣佈的政策的影响力並不如所想的那麼清楚。

伯格最高法院似乎並未強力支持華倫最高法院的米蘭達政策。雖然米蘭達案並未遭到否決，其影響力多少仍受到限制。以哈里斯訴紐約州(Harris v. NewYork)案(1971年)為例，伯格最高法院裁定，未被宣讀米蘭達警告的人之陳述仍可在審判時用來質疑其證詞的可信度。接著，在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領導之下的最高法院在戴維斯訴美國

(**Davis v. United States**)案(1994 年)中裁定，對於含糊請求要有律師在場的嫌犯，警方不需停止詢問。

米蘭達案裁決的兩年後，國會制訂一成文法響應該案裁決，該成文法基本上將嫌犯陳述的接受性轉為僅僅依據他們出於自願與否。此法令到 1999 年才獲得注意，當時，在一樁搶劫銀行嫌犯涉及的案件中，該嫌犯打算隱匿曾向聯邦調查局所作的陳述，理由是他被詢問前，未曾被告知「米蘭達警告」，而第 4 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該法令令人滿意因為該嫌犯的陳述是出於自願。上訴法院的裁決對於應遵守國會成文法或高級法院的米蘭達裁決提出疑問。2000 年 6 月 26 日，美國最高法院認為米蘭達案是合乎憲法的法院裁決，並不能被國會法案有效推翻。換言之，於州或聯邦法院被監禁詢問時所作陳述之接受性仍舊取決於米蘭達案的裁決。

簡言之，各項最高法院刑事司法政策的影響力都不同，理由有好幾個。在某些例子中，模稜兩可是一個問題。在其它案件中，政策可能明顯缺乏大法官的強力支持，或在最高法院換首席大法官之後，對政策的支持也逐漸減弱。這些變因都擴大了實行政策時的裁量權。

墮胎

在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案(1973 年)中，最高法院裁定女性在懷孕初期三個月有墮胎的絕對權利；各州可規定懷孕四至六個月時的墮胎程序以保護母親健康；懷孕七至九個月時，除非母親的生命或健康遭遇危險，各州可規定甚至禁止墮胎。

這項判決引發了立即且大多是負面的反應。有些人寫信給法官、有些人公開演講、有些人在國會提出解決方案並倡議「生命權」修正案。因為法院判決的爭議性本質，醫院並不由衷支持這項判決，也未曾改變其墮胎政策。

法院墮胎政策引發的反應不但持續不減，而且還轉移到新領域。在近幾次總統選舉中都可以看到兩大黨將墮胎議題搬上講台，而各候選人也在這個議題上採取對立的立場。民主黨與該黨被提名人通常都表示對羅訴韋德

(**Roe v. Wade**)案的支持，而共和黨與其候選人則對最高法院的判決表示反對。

國會向來是反對最高法院墮胎判決活動的溫床。反墮胎 — 又名支持生命 (**pro-life**) — 勢力無法讓推翻羅訴韋德(**Roe v. Wade**)案的憲法修正案通過，但卻成功遊說議員支持撥款法案的修正案，不讓聯邦資金花費在自願性墮胎上。**1980** 年，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票決結果確認了這類禁令的合憲性。

羅案判決後的大多數相關法案都屬於州層級。一項研究指出，在判決後的兩年內，有 **32** 州通過了 **62** 條墮胎相關法令，其中大部分皆旨在限制墮胎管道、規範墮胎程序，或禁止在某些情形下墮胎。

在羅案的判決之後，利益團體的活動大幅增加。反對這項判決的團體經常公開示威，後來還開始在診所外站哨。支持羅訴韋德(**Roe v. Wade**)案判決的利益團體則較有可能將心力放在法院裡。

墮胎論戰出現在法院、政治活動，以及立法場域的同時，其它人則偏好更直接的方式，例如在墮胎中心抗議或封鎖墮胎中心。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可對這類抗議施加合理的時間、地點與方式限制。該立場於 **2000** 年 **6** 月 **28** 日被重申，當時最高法院贊成科羅拉多州的一項成文法，該法將未經他人同意而故意接觸他人並分發傳單、展示標語、或在醫療機構 **100** 英尺內以口頭方式抗議的行為視為違法。

結論

部份司法政策對於社會的影響比其它司法政策的影響更大。司法制度在發展國家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遠高於制憲者當初的預期。然而，傑若德·羅森伯格(**Gerald N. Rosenberg**)在《空洞的期望：法院能夠帶來社會變革嗎？》(**Hollow Hope: Can Court Bring About Social Change?**)中寫道：「美國法院並非萬能的機構。他們是在嚴格限制下設計出來的，且被置於

一個分權的政治制度中。要求美國法院創造重大的社會變革，就等於忘記它們的歷史和忽略它們所受到的拘束。」

法院的決策角色存在於由競爭政治和社會需求與期待所構成的複雜架構內。政府其它兩個部門有時無法接受某些社會群體的要求，這些個人或團體的唯一替代方式就是轉而向法院求助。例如，民權組織直到取得最高法院對其廢除學校種族隔離之努力的支持才真正有所進展。

眼見部份民權團體在聯邦法院取得成果，其它人也受到鼓舞，決定以訴訟作為策略。例如，婦權支持者就採取了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模式，將其不滿帶進法院。一開始對種族平等的狹隘追求後來擴大成為尋求社會上其它弱勢團體的平等。

顯然，法院能夠發佈吸引全國注意、也許還突顯出其它決策者未能採取行動之事實的決策。透過這個方式，司法部門可能也邀請了其它部門行使其決策權。後續的判決代表了司法部門推動特定政策和繼續邀請其它決策者一起努力的決心。

總的來看，美國法院似乎最擅長髮展與執行本質上較不具爭議性的小範圍政策。吉迪恩案中建立的政策便是最好的例子。必須替各州刑事審判中的貧窮被告提供律師的判決從未遭遇任何強烈的抗議。此外，該項政策需要的基本上是法官與律師的支持；由國會與總統採取的行動並不必要。另一方面，讓社會所有群體皆平等的政策太過廣泛又充滿爭議性，以致於必須超越司法制度。這麼一來，法院就成了決策過程的一部分，即使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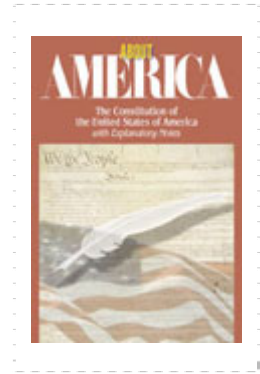
美國憲法及其修正案

您即將進入我們另外一個的出版品, [有關美國:](#)

[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之解釋說明 \(About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http://usinfo.state.gov/products/pubs/>

[constitution/index.htm](#)). 它包括憲法全文及其 27 項修正案。請點選書名或圖像。



名詞解釋

Activism

積極主義(司法): 法官願意將個人對於公共政策好壞的價值觀投入案件。又見自製(司法)。

Actus reus

犯罪行為: 犯罪的物質要件, 可以是犯下被禁止的行為(例如, 搶劫), 也可以是未履行規定之行為(例如拒絕停下車來協助車禍受害者)。

Adversarial process

對抗式的過程: 使用於美國法庭的過程, 在其中, 審判被視為是對立雙方之間的鬥爭, 而法官的角色類似於被動的仲裁者。又見審訊法。

Advisory opinions

諮詢意見: 對於抽象或假設性的問題作出裁決(一件美國法院不該做的事)。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DR)

替代性解決爭議方案: 不經審判即解決爭議的方法(通常透過中立第三人的協助)。調解與仲裁是兩項廣為人知的 ADR 技巧。

Amicus curiae

法庭之友狀：非案件當事人的個人(或團體)針對應該如何判決案件提出看法(通常以書面概要的方式)。

Answer

答辯狀：由被告所寫的正式書面陳述，以響應民事起訴狀並提出其辯護之理由。

Appellate jurisdiction

上訴管轄權：上級法院複審下級法院之判決的權力。

Arraignment

傳訊：被告為因應大陪審團之起訴書或檢察官之訴訟狀而被帶到即將進行審理之法院的法官面前的過程。

Bail

保釋金：為確保被告在審理時現身於法庭而由法院所保留的一筆被告的金錢。

Bench trial

法院自行裁定：沒有陪審團的審判，由法官裁定哪一方當事人獲勝。

Bill of attainder

剝奪財產和公民權利的法案：為美國憲法禁止的一項法令。此法令讓某人(或某一類別人士)，而非一般大眾，的行為成為非法。

Bill of information

訴訟狀：檢察官為指控被告而準備的陳述，若為法官所許可，則被告必須為所涉及的罪行受審。訴訟狀用於沒有大陪審團的州。

Certification

認證：美國上訴法院向美國最高法院請求對特定法律事務加以指示或釐清

的程序。大法官可選擇接受這項請求，或可要求將全部案件紀錄送交最高法院進行複審與最後判決。

Civil law

民法：關於公民之間、公民與公司之間，以及公司與公司之間關係的法令。

Class action

集體訴訟：由一群對一共同實體有類似不滿的人提出的訴訟；例如一群罹患肺癌的抽煙者對一煙草公司提出控訴。

Collegial court

合議庭：有一名以上法官的法院，幾乎都是上訴法院。

Common law

普通法：承襲自英國的法律制度，以法律程序或傳統而非成文法或有系統的法典為基礎。

Complaint

控告書：提起民事案件的原告所提出的書面陳述。內容陳述被告涉及從事之不法行為，並向法院要求補償。

Concurrent jurisdiction

共同管轄權：兩個法院擁有審理同一案件之法律權力的情況。例如，美國最高法院與美國初審法院對於某些由大使或領事提出的案件或控告大使或領事的案件，擁有共同管轄權。

Concurring opinions

協同意見：由一名法院成員所寫的意見。此名成員雖然同意案件結果，但另外提供了同意該判決的理由。

Corpus juris

法典大全：某一法律實體的完整法律正文。

Courtroom workgroup

法庭工作小組：某法庭之日常工作的固定參與者。這個群體中能見度最高的是法官、檢察官，以及辯護律師。

Court of appeals

上訴法院：比一般初審法院層級更高並具有複審或修正初審法官判決之功能的法院。

Crime

犯罪：違反州的罪行，可處以罰鍰、監禁，或死刑。

Criminal law

刑法：此法是關於違反州本身的罪行和不利於某人但被視為是冒犯了整體社會的行為 — 例如，持槍搶劫或強暴。

Cross-examination

交叉盤詰：審判中，向被對方律師傳喚至法庭的證人提出的問題。

Damages

賠償金：民事案件中被告支付給獲勝的原告以賠償其傷害的金錢。補償性賠償金旨在支付原告的實際損失；懲罰性賠償金則用於處罰被告。

Declaratory judgment

確認之訴：此時法院根據成文法、遺囑，或合約概述當事人的權利。

Defendant

被告：民事案件中原告控告的人或組織；刑事案件中則是被控犯罪的人。

Deposition

口供證詞：在獲法律之授權可主持宣誓的官員面前所做的口頭證詞。在證據揭示過程中，這類陳述常用來檢驗潛在證人。

Discovery

證據揭示：律師在準備審判時知悉對方論據的過程。典型的證據揭示工具包括口頭證詞、書面詢問，以及要求調閱相關文件。

Dissenting opinion

異議：由反對法院審理案件結果的一名法院成員所寫的意見書。

Diversity of citizenship suit

不同公民資格之訴訟：某一州公民對其他州公民提出的民事法律程序。

En banc

全院會審：由法院全體成員而非只有一個法官小組參與的開庭期。

Equity

衡平法：法官得以發佈一項補救辦法以避免或糾正即將發生之不法行為的法律範疇；例如對工會的非非法罷工發出禁止令。

Ex post facto law

追溯法令：為美國憲法所禁止，此法在行為發生後才宣佈該行為不合法。

Federal question

聯邦問題：如果一樁法院案件環繞著對聯邦法、美國憲法，或條約的解釋打轉，則此案件便包含了一個聯邦問題，並可由聯邦法院審理。

Felony

重罪：刑罰可能為死刑或囚禁於監獄的罪行。

Grand jury

大陪審團：由 16 至 23 名公民組成的團體，負責聽取由檢察官提出的刑事指控之證據並判定是否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某人已犯下罪行。又見起訴書。

Habeas corpus

人身保護令：通常用於將囚犯帶到法院以判定其監禁是否合法的命令(法庭命令)。

Impeachment

彈劾：免去聯邦法官職務的唯一方法。由眾議院提出指控，參議院在審判後以三分之二票數判定有罪。

Indictment

起訴書：大陪審團因為相信有充分理由可進行審判而下令被告受審的判決。

Inquisitorial method

審訊法：大部分歐洲與拉丁美洲法庭所使用的程序，其中法官與陪審團扮演積極角色，而律師只支持與補充司法調查。又見對抗式的過程。

Interrogatory

書面詢問：民事案件中訴訟一方當事人向對方當事人提出的書面問題，是審前證據揭示的一部分。收到書面詢問的當事人必須在宣誓下以書面方式回答。

Judgment

判決：法院最後解決訴訟當事人糾紛而作出的正式判決。

Judicial review

司法複審：司法部門宣佈行政與立法部門行為違憲的權力。

Jurisdiction

司法管轄權：法院審理與審理法律糾紛和執行其裁決的權力。

Justiciability

可裁判性：法官是否應該或避免審理某些類型的案件。它不同於與法官審

理案件之法律技術性權力有關的司法管轄權。例如，涉及政治問題的法律訴訟就被認為是不具可裁判性的。

Law

法律：在威脅中被批准或實際上是由物理力之施用而批准的社會規範。執行此物理力的人被社會認可為合法擁有這類權力，例如警察。

Magistrate

治安官：被告被捕後必須面對的下級司法官員。治安官有義務告知被告其被控訴之罪名及其法律權利。

Mandatory sentencing laws

強制判刑法：規定被判刑之罪犯之自動刑期的成文法，通常規定最短刑期。這些法令通常用於使用槍枝的暴力犯罪或慣犯。

Mens rea

犯罪意圖：犯罪的心理因素 — 也就是準備從事犯罪者的意圖。通常心理的意圖與意願愈強，罪行就愈重。

Merit selection

擇優遴選：一項遴選州法官的方法。州長從為遴選法官而設置的提名小組所提交的推薦候選人決選名單中挑選一名法官並加以任命。法官任職一小段時間後必須參加留任選舉，接著由選民判定法官是否應該留任做完任期。

Misdemeanor

輕罪：輕度罪行，其懲罰通常在市或郡的監獄監禁一年以下。

Moot

已過時：案件的基本事實或雙方當事人的狀況已於提出訴訟與法官審理之間的過渡期發生重大改變。

Nolo contendere

不爭執：刑事被告的答辯，在答辯中被告不否認案件事實但聲稱自己沒有犯任何的罪，或可表示被告不瞭解指控內容。

Opinion of the court

法院意見：一名法官對法院判決所做的書面解釋。由於案件可能由上訴法院的法官小組審理，因此意見的形式有兩種。如果全體法官都完全同意結果，則由一名法官書寫全體意見。如果不是所有的法官都同意，那麼正式的判決將以多數人的看法為基礎，並由投下多數票的一位法官書寫判決。

Oral argument

口頭辯論：雙方律師在法院概述立場與回答法官問題的機會。

Ordinance-making power

法令制訂權：州長制定州議會通過之法案的細節的權力。

Original jurisdiction

原始管轄權：法院依法必須先審理特定類型的案件。例如，對於涉及不同州公民間且金額至少為 **75,000** 美元的訴訟，聯邦地方法院擁有原始管轄權。

Overcharging

過度指控：檢察官在指控刑事被告過程中，為了從辯方律師獲得更有利的認罪協商，因而指控被告比事實更為嚴重的罪行。

Per curiam

法庭共同決議：一項未經簽署的法庭意見，通常是摘要。

Peremptory challenge

先制性反對：律師對某位陪審員人選的反對。律師可不提出公開理由就將某位陪審員從名單中刪除。法律對這類反對的刪除人數設了限制。

Petit jury (or trial jury)

小陪審團(或審判陪審團): 聽取雙方提出的證據並判定爭議事實的一群公民。

Plaintiff

原告: 在民事訴訟中提出控告的人。

Plea bargain

認罪協商: 檢察官與辯方律師之間達成的協議，以某種形式的仁慈換取認罪答辯。

Political question

政治問題: 法院根據對美國憲法的認識，判定制憲者認為應由國會或總統處理，因此拒絕裁決的事務。

Private law

私法: 私法處理私人與團體間有所關聯時所擁有的權利與義務。

Probation

緩刑: 對罪行的懲罰，只要違法者之行為符合法院規定的行為準則，就允許此人留在社群裡，不用入獄。

Pro bono publico

公益性服務: 通常是指為了慈善或公眾目的而免費執行的法律服務。

Public law

公法: 個人與作為主權實體的州之間的關係 — 例如稅法、刑法，以及社會安全法規。

Recess appointment

休會任命: 由總統在國會休會期間所作的任命。在這樣的情況下被任命的人可任職到重新召開國會為止。

Reversible error

可逆轉的錯誤：初審法院層級所犯的錯誤，由於情節嚴重，上訴法院必須推翻初審法官的判決。

Rule of four

四的規定：在最高法院考慮審理一個案件之前，至少需要四名大法官同意受理該案。

Rule of 80

80 的規定：當法官的年齡與擔任法官年資的總合為 **80** 時，國會允許個別法官於退休時領得全薪並享有優待。

Self-restraint (judicial)

自製(司法)：法官不願將個人對於公共政策好壞之看法投入到案件中。又見積極主義(司法)。

Senatorial courtesy

參議員禮遇：根據這項作法，與總統同政黨的參議員反對總統欲指派成為家鄉州之地方法官的候選人，參議員對於被提名人有實際否決權。

Sequestration (of jury)

隔離(陪審團)：在重大或惡名昭彰案件中，法官可能會將陪審團隔離人群以遠離外界眼光，這通常意味著陪審團過著群體生活，並且吃住費用都來自納稅人。

Socialization (judicial)

社會化(司法)：新法官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被訓練執行特別的法官職務的過程。

Standing

適格：希望提出法律訴訟的人的資格。如要適格，就必須受過(或即將遭受)直接且重大的傷害。

Stare decisis, the doctrine of

遵循先例原則：實際上接受並遵循法院先前判決和既有之法律要點的傳統。

Statutory law

成文法：由立法組織，例如國會、州議會，或市議會，所制訂的法律。

Three-judge panels (of appellate courts)

(上訴法院的)三人法官小組：美國上訴法院大部分的判決並非由全體法官共同決定的，而是由隨機挑選的三名法官審理任一案件。

Three-judge district court

地方法院三人法官小組：國會規定某些重大案件不能只由一名美國初審法官審理，必須交由三人法官小組決定，而其中一名必須是上訴法院法官。

Tort

侵權行為：民事上對他人的不法行為或失職。

Trial de novo

重新審理：如同不曾被審理般重新審理的新審判。

Venue

審判地點：進行案件審理的地理位置。

Voir dire

陪審團資格審查：對方律師為了判定陪審員是否對個別案件持有偏見而詢問陪審員人選的過程。

Warrant

逮捕令：治安官在收到並檢視過(某人針對另一人提出的)控訴書並發現有充分理由進行逮捕時所發出的命令。

Writ of certiorari

移審令：由美國最高法院發佈的命令，指示下級法院轉交該院將受理之上訴案件的紀錄。

Writ of mandamus

執行令：強迫公職人員必須履行其職務的法院命令。

參考書目

BIBLIOGRAPHY

BOOKS

Administrative Off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Courts. *United States Courts: Their Jurisdiction and Work*. Washington, DC: 1989.

Fallon, Richard H., Hart, Henry Melvin, and Wechsler, Herbert. *Hart and Wechsler's the Federal Courts and the Federal System*, 5th ed. New York, NY: Foundation Press, 2003.

Baum, Lawrence. *American Courts: Process and Policy*. 5th ed. Boston, MA: Houghton Mifflin, 2001.

Chemerinsky, Erwin. *Federal Jurisdiction*, 4th ed. New York, NY: Aspen Publishers, 2003.

Feinman, Jay M. *Law 101: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American Legal System*.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2000.

Franklin, Carl J. *Constitutional Law for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fessional*.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1999.

Friedman, Lawrence Meir. *Law in America: A Short History*.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2002.

Mullenix, Linda S., Martin Redish, and Georgene Vairo. *Understanding Federal Courts and Jurisdiction*. New York, NY: Matthew Bender, 1998.

Posner, Richard A., *The Federal Courts: Challenge and Refor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Stumpf, Harry P. *American Judicial Politics*, 2nd e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1998.

WEB SITES

Facts About the American Judicial System

<http://www.abanet.org/media/factbooks/judifact.pdf>

Federal Courts and What They Do

[http://www.fjc.gov/public/pdf.nsf/lookup/FCtsWhat.pdf/\\$file/FCtsWhat.pdf](http://www.fjc.gov/public/pdf.nsf/lookup/FCtsWhat.pdf/$file/FCtsWhat.pdf)

The Federal Court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roduction for Judges and Judicial Administrators in Other Countries

<http://www.uscourts.gov/library/internationalbook-fedcts2.pdf>

InfoUSA -- Judicial Branch

<http://usinfo.state.gov/usa/infousa/politics/judbranc.htm>

Introduction to the Legal System

http://www.cec.org/pubs_info_resources/law_treat_agree/

summary_enviro_law/publication/usdoc.cfm?varlan=english&topic=1

JURIST: The Legal Education Network

http://www.jurist.law.pitt.edu/

Law Library Resource Exchange

http://www.llrx.com/

Legal Encyclopedia

http://www.nolo.com/lawcenter/ency/index.cfm

Library of Congress: Guide to Law Online

http://www.loc.gov/law/guide/us.html

National Center for State Courts -- Court Information Database

http://www.ncsconline.org/WCDS/index.htm

Prosecutors in State Courts, 2001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psc01.pdf

State Court Organization, 1998

http://www.ojp.usdoj.gov/bjs/pub/pdf/sco98.pdf

The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

http://www.supremecourtus.gov

Understanding the Federal Courts

http://www.uscourts.gov/understand02/

此电子书内容来源：美国国务院 电子书由禁书网热心网友制作。

[大陆直连看禁书禁闻禁文禁网禁片禁歌禁曲](#)

[禁书网](#) 提供禁书下载阅读, 禁书目录, 禁书网
<http://www.bannedbook.org/>是最大最全的禁书下载基地,
中国禁书, 大陆禁书应有尽有。

禁书禁闻禁片大陆直连: <http://bannedbook.s3-website-us-east-1.amazonaws.com/>